

目录

获取权力第一步是人思想上的毁灭	1
获取权力第二步是为赤裸欲望穿一件外衣	9
获取权力第一步是弱化解体敌人组织	19
最残暴的帝王术是用杀不杀	36
控制小人如碾死蚂蚁	55
斗争的本质是合理运用对手	64
能在斗争中晋升必须具备条件	72
与控制人才为己所用	78
如何让智者为你卖命	93
使用切记因人而异	100
在起步阶段的施展很重要	106
施展政治谎言高手	121
奸诈与虚伪	131
统一手段	153
卓越的政治家路线	157
当领导不懂必备这几招王术	176
连环除对手	192
强干弱枝”下的打压手段	227
王权力控制与发展	238
精通放权、分权与集权	250
反间分化瓦解排除异己	265

左右牟利与毁誉	285
看透搞阴谋人的伎俩	300
4 大要点历史帝王无一不精 任用、敛财背后的目的	324
获取权力引开注意力	348
不同时期用不同人做事	351
夺权第一步是击倒政敌	357
最高境界“阳斥阴纳”	368
心术俎上冻鱼	384
只有利益无亲情	393

V: 357607890

获取权力第一步是人思想上的毁灭

《资治通鉴卷七》

原文：（公元前 213 年）丞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

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制曰：“可。”

译文：丞相李斯上书说：“过去诸侯国纷争，以高官厚禄招徕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已定，法令统一出自朝廷，百姓理家就要致力于耕田做工，读书人就要学习法令规章。但今日的儒生却不学习现代事务，只知一味地效法古代，并借此非议现实，蛊惑、扰乱民众，相互非难指

责现行制度，并以此教导百姓；闻听命令颁下，就纷纷根据自己的学说、主张妄加评议，入朝时口是心非，出朝后便街谈巷议，夸饰君主以提高自己的声望，标新立异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煽动、引导一些人攻击诽谤国家法令。这种情况如不禁止，就势必造成君主的权势下降，臣下结党纳派活动蔓延民间。唯有禁止这些才有利于国家！因此我建议史官将除秦国史记之外的所有史书全部烧毁；除博士官按职责收藏书外，天下凡有私藏《诗》、《书》、诸子百家著作的人，一律按期将所藏交到郡守、郡尉处，一并焚毁；有敢于相对私语谈论《诗》、《书》的处死；借古非今的诛杀九族；官吏发

现这种事情而不举报的与以上人同罪；此令颁布三十天后仍不将私藏书籍烧毁的，判处黥刑，并罚处修筑长城劳役的城旦刑。不予焚烧的，是医药、占卜、种植的书。如果想要学习法令，应以官吏为师。”始皇下制令说：“可以。”

帝王术讲解：

一、不让议政。不让人有思想，有异见。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实行诸多暴政统治的重要体现，而嬴政也因此成为了历史上为数不多

的暴君代表。其实不然，焚书坑儒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在思想文化上形成一统的局面，采取愚民的政策，进而使秦朝能够长期的统治下去。结合当时的局势而言，这种想法无可厚非，也是必要的。嬴政刚刚兼并六国，统一中国，秦始皇所面对的是一个从春秋到战国，诸子百家争鸣 500 余年的文化思想盛世也是思想文化乱世，而众多思想的存在无疑是对秦王朝进行中央集权统治的一中潜在威胁。从这里也不难看出，“焚书坑儒”的实质并非仅有统一思想、愚民这样的简单，其背后隐藏着的是法家思想和其他诸子百家思想在权力上和统治地位的争夺，是主张实行新政的秦王朝对提

倡“尊古制”的儒家思想的一次压迫。

二、以官吏为师。

“以吏为师”的算盘大致是这样打的：吏是层层挑选任命的，吃着皇粮，拿着俸禄，毕生的富贵前程都在上司手里攥着，应当能够唯上之命是从；吏的利益是与政权兴替拴在一处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应该不会做出损害政权的事情来；吏所受的训练是熟悉法律条文或政府的诏令，然后照章办事，不越雷池，因此应该不会想入非非，弄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

把思想的传授权和裁决权交由吏来执行，为的就是在思李斯的“以吏为师”究竟如何实行，还需要细加考证，粗略说来，大致有三：

一是烧书。除了医药、种树、卜筮之类实用之书，统统烧掉。“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那时没有“破四旧”这样的术语，但指责读百家语的诸生“不师今而学古”、“道古以害今”的意思，同指责帝王将相古人死人统治舞台之类取向是一样的。天下只烧剩皇家的指令，自然不见异端，使心不乱。

二是镇压。那时还没有发明“群众专政”和“大批判”一类花样，所以采取的是赤裸裸的镇压

手段——“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
“以古非今者族”

三是思想传授，只准以吏为师，学着做忠于上、勤于事、习于法的官吏。至于百姓，只要当会说话的工具就成。

三种办法归于一，即运用政权的力量禁绝皇家思想以外的一切思想领域杜绝“异端”。

获取权力第二步是为赤裸欲望穿一件外衣

原文：

《资治通鉴》卷十七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二江二~~都相。会稽庄助亦以贤良对策，天子擢为中*大夫。丞相卫

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者*皆师尊之。及为二江二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匡正，王敬重焉。

翻译：

“《春秋》推崇的天下一统，这是天地之间的永久原则，是古往今来的一致道义。现在，每个经师传授的道不同，每个人的论点各异，百家学说旨趣不同，因此，君主没有办法实现统一，法令制度多次变化，臣下不知应该遵守什

么。我认为，方向不同，所有不属于儒家‘六艺’范围之内，不符合孔子学说的学派，都禁绝其理论，不许它们与儒学并进，使邪恶不正的学说归于灭绝，这样做了就能政令统一，法度明确，臣民就知道该遵循什么了！”

武帝很赞赏董仲舒的对答，任命他做江都国的相。会稽人庄助也以贤良的身分参加了考试对答，武帝擢拔他担任中大夫。丞相卫绾向武帝上奏：“举荐来的贤良，有研究申不害、韩非、苏秦、张仪的学说，扰乱国家政治的，请都予以遣返。”武帝批准了奏请。董仲舒从小研究《春秋》。孝景帝时做了博士官，进退举止，

不做任何不合乎礼法的事，学者们都用尊师的礼节尊敬他。等到董仲舒做了江都国的相，侍奉江二 都易王刘非。易王刘非，是武帝的哥哥，历来骄横，好逞勇力。董仲舒用礼义来辅佐纠正他，易王也很敬重董仲舒。

帝王术讲解：

景帝刘启死前的一个遗憾，就是没有解决匈奴问题；汉朝虽然国力蒸蒸日上，但面对匈奴，仍然只能被动防御，靠和亲与“岁贡”安抚对手——长此下去，那就不能说实现了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十六岁的武帝血气方刚，决意继承父亲的遗志。但他举目四望，却感觉有

劲没处使，不知该如何下手——因为他发现，此时的朝中大臣，个个都是老油条，自己虽是皇帝，却被处处掣肘。其实，这些人未必是故意与皇帝作对，但长期的“无为而治”已经造就了一个以贵戚豪强为主的既得利益团体，他们小日子过得滋润着呢，才不愿改弦更张呢！

那么，武帝首先要做的，就是让整个国家再一次动起来。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年轻的武帝自己没什么经验，于是向爷爷文帝刘恒学习，在即位后八个月，即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也就是招贤纳士、群策群力。当年通过举贤良这招，爷爷招

到了贾谊，爸爸招到了晁错，那朕的又在哪里呢？

——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

广川人董仲舒，在景帝时期担任博士，教授《公羊春秋》，为儒学一派。见武帝诏问国策，董仲舒就上了一篇《举贤良对策》；这篇策论很长，有两三千言，但却被司马光全文收录——原因无它，此策实是奠定了后世以儒学为尊之根基。司马光亦是孔门弟子，对此重视自是不足为奇。

董仲舒看出来了，当时的贵戚豪强们，已有失去制约的危险，那么怎样重新治住他们呢？严

刑峻法自是一种方法，但董仲舒身为儒家弟子，对法家那套是嗤之以鼻的——你看秦二世而亡，就是教训。董仲舒开的药方，是加强礼乐教化，使人们知道上下尊卑，自然能“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也就是行王道！虽然老董是出于门派之见贬低法家，但其实也道出一个事实——此时的中国太大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全盘法治，技术上已无法实现。盖法乃是规定了社会活动的下限——下限越低，需要法出面处理的事情就越多，行政效率就会越来越低；而儒家的“王道”，则是强调道德的作用，努力提高这个下限，最后达到一种平衡，社会就和谐了。

为了实现“王道”，董仲舒使出了三招：

一是行察举制，即由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官员等，每岁推举治下二人为候补官员。这是为了使官僚体系正规化，避免官职成为世袭，否则就又回到封建时代的老路上了。后来，直到魏文帝行“九品中正制”为止，察举制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官吏选拔制度。当然，与隋以后的科举制相比，察举制仍不够公平，所以科举大兴后就逐渐让贤，但这毕竟是向官僚社会转型的重要尝试，饭总要一口一口吃嘛！而且，科举时代也不是说就完全废除了察举制，举贤良、举孝廉，仍然长期存在。

二是建太学。太学者，用以养士。儒家本就有重视教育之传统，这也成为后世公办学校之滥觞。

第三，就是大名鼎鼎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过嘛，其实董仲舒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当然，以他的本意，这样干自然最妙；但武帝在思想上，并不会这么激进，他只是出于统一思想的政治需要，逐渐提高儒学的地位，那么渐渐地大家自然会放弃研究别家学说了。实际治理国家中，武帝仍是“儒法并用”的。

董仲舒的对策，为武帝打开了思路，他终于明白该干些什么了。不过，董仲舒却并未得到重

用，而是被任命为江都国相。这原因吗，一方面是董仲舒本身不喜做官，另一方面，倒与当年的贾谊有些类似。

获取权力第三步弱化解体敌人组织

汉武帝独尊儒术统一思想服务于消灭旧贵族
独尊王权。

夏朝是个传说，商朝周朝是成熟王朝。商周一
千多年，奠定了中国文化基因，塑造了中国帝
王术基因。

商周都有共同点，天下是造反夺来的。打天下
坐天下，王权化国为家，化天下为私产。王权
关心的是不要再丢天下。丢天下不仅丢财，也
要丢命。坐稳天下，不仅是保财，也是保命。

身家性命，全搭进去，就得死保王权。王权的存在，就是王权存在的目的。

要保王权，就得把一切有助于王权巩固的力量都抓在手里，就得把一切可能挑战王权的力量予以摧毁。这就是君王之大事，这是帝王术的指向。在中国精深的帝王术面前，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只是小儿科。

《左传》上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军事，王权两大支柱，两手得抓两手得硬，这是商周两朝统治经验的总结。商周甲骨文、周代金文，周代文献，多有祭祀与军事记载。

国之大事之一的宗教祭祀是什么？商朝祭祀上帝——自然神——祖先。周朝承袭商朝，敬天法祖为主，兼祭自然神。周王权军教一体，以宗教优势和军事优势维持统治。

公元前 771 年，申侯犬戎灭西周。后起的东周无军事优势，靠着宗教祭祀传统，仍维系东周王权五百余年。

“祀”是宗教凝聚力，“戎”是军事暴力。维护王室特权统治，祭权与军权为本，控制意识形态，垄断军事暴力。

春秋战国，是诸侯国卿大夫僭越、挑战和剥夺周王室祭权和军权的时代。秦始皇统一中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君王垄断上天祭权和唯一军权的中央集权格局得以形成，以后二千多年格局未变。

祭权分层。王权垄断上天上帝祭祀，民众有宗教需要，怎么解决？对有集体性宗教，实行家国分离。朝廷支持民间以祖先崇拜为中心，以家族祠堂为组织系统的民间宗教存在。祖先崇拜非普世宗教，家族祠堂组织力限于家族范围，这对朝廷不会构成跨家族的大的组织性威

胁。你不可能用你家的祖先祭祀去动员别家的人与你共同奋斗。

上天、上帝不限于一家一族，上天、上帝的祭祀权，具有超越家族的凝聚力，由皇家独家垄断。

儒家礼教以孝为基，服从父亲，由孝及忠，顺从君主，君亲一体，忠孝一体。家族精神归祠堂，皇家精神归天坛。家族祠堂遍布天下，皇家天坛天下唯一。皇家天坛主祭，即天子自己。敬天法祖，中国几千年皇家宗教。民间法祖，以家庭和家族祠堂为中心。皇家敬天法祖，以

天坛和太庙为中心。

中国农村不也有“天地君亲师”牌位吗？这不是敬天吗？不是。“天地君亲师”的“天”是自然之天，不是皇家祭祀的那个至上神皇天上帝。民间可设祭坛祭祀皇天上帝吗？不可以。中国有几个天坛？只要国家统一，就只会有一个。

在农村的家族祠堂中

仍可看到“天地君亲师”牌位

佛教、道教呢？不也发展起来了么？历史上规模也不小，这与帝王术有什么关系吗？有，关系很深。

请注意，佛教修佛，道教修仙，成佛成仙，皆指向个人，属个人化宗教。没听说佛教徒约起来为修佛成佛而共同奋斗，没听说道教徒约起来为修仙成仙而团结牺牲。成佛成仙的目标指向个人而非集体，指向彼岸而非现世，指向个人生命修炼而非理想社会实现。

佛道宗教哲学，深深把人个人化、原子化和分散化。佛寺里满是佛菩萨罗汉，且佛经称一粒沙中有千万个佛国。一切因缘而生因缘而灭，万物无自性，现世如梦如幻，全无恒定之依靠。修佛之目的，在于超越生死轮回现世苦难，抵达彼岸之宁静佛国。从哲学意义上，这解构了

一切人间凝聚力和集体行动可能性。这特别符合帝王术垄断凝聚力和组织力的专权需要。

精神凝聚力，是集体组织的基础。王族祭祀上天上帝以获得凝聚力、组织力，同时支持民间佛道发展以造成民间社会精神原子化，消除民间精神凝聚力及组织力。

佛道之中，并非没有一些试图从个体化宗教向集体性宗教位移的派系。它们有集体行动，且关注现实世界改善，如东汉末年道教太平道，但类似集体性宗教无一例外遭到朝廷镇压，这使得不问世事，完全回到个人修炼成为佛道主

流。

宗教信仰，是个人修炼，与社会无关，这样的观点在今天仍然流行，这样的观点，其实是恐惧的产物，恐惧变成了“真理”。

古代道观大多建在山中，道士为方外之人，不属于世俗世界，意味着以逃避来换取安全。

数千年帝王术威胁之下，形成中国特有政教关系。君王朝廷有敬奉上天、上帝的国家宗教，全面垄断指向具有集体性、凝聚力并指向现实世界的宗教。天命在手=政权在己。同时朝廷

支持民间出世的、不问世事的、解构凝聚力的、使人原子化、个人化、分散化的宗教的发展。

一句话，强化王权精神上的集体组织力量，破坏民间精神上的集体组织力量，民众只要离开王权官府，只有家人可依靠，越出家人范围就散沙一盘。精神上散沙一盘的民众，难以形成对王权的组织性挑战。

用特定的个人化宗教的内容和形式，来破坏民间的团结精神，来弱化民众的社会组织能力，这是中国古代君王高强度专权统治的一大奥秘。

在君王垄断集体性宗教的传统中，中国人只要离开家庭、家族和王权官府，精神上就趋向个体化、自私化、散沙化，缺少跨家人的组织互信，形成了民众散沙化、不会横向组织的传统。

理解了古代帝王术玩弄之下的政教关系，也许我们会明白，如果你信的是一种共同信仰下具有集体组织力量的宗教，如果你信的是一种追求世界公义的宗教，你就准备承受苦难，你就得坚韧起来，你与君主朝廷就没有多少妥协余地，因为你信仰的宗教就可能被朝廷盯上，朝廷或是想灭除这宗教，或是要逼这宗教走向

佛道个人修炼之路，即回避现实，不关心正义，只管个人修炼，在自我神圣的自摸感觉中，闭眼不看世界公正不公正，在现实世界中全然个人化散沙化脆弱化。

这帝王统治术精深吗？极其精深的自私自利，极其邪恶的自私自利！它通过弱化大众来强化王权，通过弱化整个民族来强化君主官吏。这是毁灭万众灵性的统治，阻断了民众与上帝的直接沟通，破坏了民族的共同信仰，毁坏了国民正义的能力，弄残了亿万民众的自组织能力，使民众的心灵胆怯溃烂，对特权和邪恶充满畏惧。

帝王术道衍化而为德，德再衍化而为权术
其实，老子虽然说的是天地间因果循环往复的大原则，但很不幸的，被聪明狡诈者用作欺世盗国的大阴谋，实在和老子毫不相干，老子实在不应负此责难的。

总之，历史上这些代代相仿的阴谋或大谋略的哲学内涵，早已由庄子的笔下揭穿。庄子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故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其次，在唐代诗人们的词章哲学中，也可见其梗概。如唐彦谦的《过长陵》：“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杯。于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残日重回头。”章碣的《焚书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又有《毗陵登高》：“尘土十分归举子，乾坤大半属偷儿。长扬羽猎须留本，开济重为阙下期。”

好的诗词文学，都富于哲学的启示，所以孔子要儿子孔鲤学诗，并非是要他钻牛角尖去做个诗人而已。了解了这些道理，当然也读通了《庄子·杂篇》中的《盗跖》篇，并非讽刺。同时

也可知石达开的“起自匹夫方见异，遇非天子不为隆”的思想，同样都是“乾坤大半属偷儿”的偷儿哲学所演变出来的。

此外在西方如罗马的凯撒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屋大维大帝、拿破仑等，也都不出此例。虽然他们不知道东方有道家的老子，但东方有凡人，西方有几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出一辙。如果说这些都是人类历史的荣耀，或者认为是人文文化的悲哀，也都无可无不可。但总不能叫老子背此黑锅，加以欺世盗名的罪过吧！（一笑）

其实，由道的衍化而为德，德再衍化而为仁、义、礼、乐，再由仁义礼乐衍化而为权术，正表示人类的心路历程，每下愈况，陷溺愈深。但所谓“术化”的妙用，亦是“有无相生”，“同出而异名”。

谭峭的《化书》论“术化”，便是很好的说明。如云：水窞可以下溺，杵糠可以疗噎。斯物也，始制‘于人，又复用于人。法本无祖，术本无状，师之于心，得之于象。阳为阴所伏，男为女所制，刚为柔所克，智为愚所得。以是用之则钟鼓可使之哑，车毂可使之斗，妻子可

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离合。万物本虚，万法
本无，得虚无之窍者，知法术之要乎！

最残暴的帝王术是用杀不杀

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

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卬均属被俘。然

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酈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轡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余列传》

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

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入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

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簿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

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卬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卬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卬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隐而微，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去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卬虽然不是最厉害的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

邦心存忌讳。而司马卬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卬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讨伐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

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等于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如果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敖。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敖。共敖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

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

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

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噲将兵攻代”。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此年正月的劝进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情理上不通。应该考虑汉欲加之罪的情况。代地的情况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

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而汉定天下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而从张苍事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有点乱。《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扶佐也未可知。《樊哙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

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就让樊哙定代地，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都死于战事，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被汉诛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余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汉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

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

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

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齐就有吕泽、陈豨等人的功劳，基本上都划归了韩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

总而言之，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刘邦的杀降

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

帝王术控制小人如碾死蚂蚁

说起特务政治，大家都会想到明朝的东厂西厂。其实啊，早在三国时期，曹操就已经建立起一套非常成熟的特务政治体系了。咱们都知道，那时候的特务都是些什么人啊，不是人渣，就是流氓。雄才大略的曹操，为什么要喜欢用这些人呢？军事史专家赵楚，就在一篇文章中为我们解释了原因。

大家都知道，三国时代是个乱世，在那个时代，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都是一团糟，有武器就是草头王。当时在曹操的阵营里，人才来自各个方面，既有投降过去的，也有各种背景的社会

势力的代表。

怎样才能充分发挥阵营里各路人马的能量，同时又能对他们进行有力的约束呢？曹操用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建立起一套独特的监察制度，以特务政治的方式达到全面控制局面的目的。

曹操的监察制度主要分军、民两个方面：

在军事方面，除了在出征时精心选择将领，曹操还用了其他的手段确保万无一失：一是对将领和官兵的家属名为照顾，实际上是作为人质

的扣押；再就是同时派出自己身边近臣侍从随军进行监督。

在民政方面，除了之前就存在的体制传统之外，曹操还建立了一套秘密监察体系，把人事权和考察权集中在自己手里。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这种监察体制延续到曹丕称帝的时候还一直存在，俨然成为皇帝进行统治的日常手段。就在曹丕登上皇位短短的几年内，通过这种秘密监察系统查办的案件就多达上万件。

那么这种秘密监察系统是怎么运转的呢？根据《三国志》的记载，可以确定的有这么几个

方面：

第一，他们只有秘密监视和接受检举的权力，可不具体执行法律程序。也就是说，他们不对罪犯进行审判和定罪执行。

第二，他们只向皇帝做秘密报告，然后由皇帝转给相关官员进行系统审判和执行惩罚。说白了，这就是一帮只对皇帝负责的秘密警察，跟正常的官僚体系没有交叉关系。

第三，这帮秘密警察有固定的办公地点，全国军民，不管是谁，要是想告密，都知道去哪里

找他们。

一般出身名门的人，都希望自己光明正大的在正常的官僚体系里当官，没人愿意进入到这种不能见光的系统里去当秘密警察。所以当时担任这些秘密警察的，都是些出身不咋地的人。虽说是出身不好和人品不咋地不能画上等号，可是你想啊，这些人，平时那些名门望族都不拿他们当回事，一下子有了最高统治者直接赋予的权力，还没有任何监督。更要命的是，这些人做的事，还不能在阳光下进行。不管是谁，进了这种系统，想不为所欲为都难。事实上，这些人也确实做了很多坏事。比如说过去被

谁拿白眼看过，这时候随便找个罪名，就把这人给办了。

这么一来，正常的行政运作就没法玩了，曹操手下有个叫做高柔的，发现了这个情况，就向曹操做了汇报。

面对高柔的汇报，曹操说了这么几点：

第一，他很清楚这些人是小人，滥用职权的可能性非常大。可是这种事，你们这些要做大事的君子谁愿意做呢？用这些小人也是没办法的事。

第二，要是没有这些秘密警察，正常官僚体系里的官员只会报喜不报忧，秦朝的时候天下都已经大乱了，可官员们还和秦二世说没人造反，只是些小毛贼闹事。那样的情况，可不能在咱们这里出现。

第三，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曹操没说，因为不能说。为什么不能说呢？咱们知道，曹操是个做大事的人，他想的是重建国家和社会。不管什么时候，这样的抱负，都少不了士大夫也就是君子们的合作。曹操用这些小人，其实也是给这些精英们一个警告：我干大事少不了

你们，可是你们也要明白，我也能治得了你们。

所以你看，曹操在明知道那些秘密警察都是小人的情况下，还对他们加以重用，不过是为了在当时的局势下保持系统的平衡，以便可以达到全面控制。

后来随着曹操事业的做大，再加上那批秘密警察实在不像话，曹操为了网罗士人君子，就把几个恶名最大的秘密警察杀掉了。

你看，秘密警察虽然从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但真正把它发扬光大并形成制度的，还是

曹操，而且也是在曹操之后，才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套路：那就是，在局势混乱尤其是格局还不成熟的时候，任用小人来担任秘密警察、充当政治打手的角色，等到局势稳定和格局形成之后，再把这些小人杀掉，来平定人心。

斗争的本质是合理运用对手

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里有个特别出名的故事：空城计。之前咱们看这个故事，会觉得诸葛亮实在是神机妙算、足智多谋。总之吧，恨不得把所有能表现有计谋的词安在诸葛亮身上。可是，要是仔细想想，司马懿也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他怎么就那么容易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难道他真那么傻？

其实，要是咱们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来看，这件事就特别合理了。

咱们看当时的情况，按照《三国演义》的叙述，

司马懿当时带领的是 15 万大兵，诸葛亮呢，只有 2500 人马。就算司马懿不知道情况，他可以先派一支队伍去试探一下啊，或者，干脆先把诸葛亮的那座城给包围起来，反正那座城也不大，当时蜀国又处在惨败的情况下，强能强到哪里去呢？

这些咱们轻而易举就想到的办法，司马懿竟然全没有想到，这要是别人也就算了，可他是司马懿啊，多年领兵征战，连诸葛亮都不得不承认他老谋深算，说曹魏政权是他一个人撑着，一点都不过分。咱们看魏国和蜀国打仗，魏国基本上都是司马懿领兵。可就这么一个人，在

诸葛亮的空城面前，直接就退兵了。这里面真的就没有别的原因吗？

要说清这个问题，咱们就得从司马懿的处境说起。原来，就是因为司马懿太能干了。这太能干的人，就容易遭人嫉妒，你这么能干，别人怎么办啊。所以，在魏国内部，司马懿的政敌可是不少，那些人别的不行，没事在皇帝曹睿那里给司马懿上点眼药，做的还是挺到位。

这个情况，和司马懿多次交手的诸葛亮是了解的，他一看这是个机会啊，就派人到魏国去散布司马懿要造反的消息。你别说，这招还真管

用，差点要了司马懿的命，幸亏有人给司马懿求情，司马懿的命算是保住了，但职位也没了。

这一转眼就到了诸葛亮六出祁山讨伐魏国，没有了司马懿的魏国军队哪里是诸葛亮的对手啊，眼看着曹魏的江山就要被诸葛亮给灭了。这时候魏国皇帝曹睿想起司马懿来了。本来打算老死在家乡的司马懿，竟然因为诸葛亮的讨伐，时来运转的复出重掌军权了。

这就是司马懿带领 15 万大兵，兵临诸葛亮城下时的处境。

要是过去，这肯定是司马懿立功的大好机会，可是现在，司马懿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就不能不掂量一下了。

一是杀进去，把老对手灭掉。可灭掉诸葛亮之后会怎样呢？魏国从此高枕无忧，那些政敌又会时不时在皇帝面前给他上上眼药，要是哪天皇帝又想杀他，到时候他去哪里再找一个诸葛亮来讨伐魏国呢？

二是退兵，只要诸葛亮还在，魏国就需要他，那些政敌就不能拿他怎么样。反过来说，魏国只要有他司马懿一天，诸葛亮对魏国也无可奈何。

何。退兵对魏国来说，没有好处，也没有什么坏处。

这么一说，咱们就明白司马懿为什么选择退兵了吧。

不过，要告诉大家的是，空城计的故事，在历史上其实没有发生过。街亭之战发生的时候，跟诸葛亮打对手仗，根本就不是司马懿，而是魏国另外一名大将。空城计，不过是罗贯中杜撰出来的故事。听到这你得说了，说了半天都是假的，你分析的再头头是道又有什么用呢？这咱们就不得不佩服罗贯中了，这些细节虽然

是假的，可从大脉络和司马懿的处境上来说，却都是真实的。并且啊，这样的事，在过了快两千年后，还真发生了一件一模一样的事。那是在辛亥革命后，清政府不得已请之前被罢黜的袁世凯出山对付南方的革命党。要是从实力上说，袁世凯拿下革命党根本不成问题，可是袁世凯当时的处境，和空城计里的司马懿一模一样，之前就因为势力太大遭到清廷怀疑，差点丢了命。这时候，他哪里还敢用全力对付革命党呢。结果最后清廷只能和革命党进行和谈，让袁世凯渔翁得利当上了大总统。要说巧也是真巧，曹家天下，最后也是被司马家的人代替的。

咱们在今天听了这个故事，就会明白，要是
一个系统不能给身处其中的个体安全感，那么个
体就不敢用全力去为系统效力，最后遭受损失
的会是谁呢，估计不用说，你也猜到了。

能在斗争中晋升必须具备条件

首先介绍一下曹操的四个有希望争夺王位的儿子，他们分别是：

1. 二公子曹丕（继承了曹操的政治才能，善于勾心斗角，笼络人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2. 三公子曹彰（继承了曹操的样貌体格特征，跟老爸长的一样帅，并且身体健硕，武艺高强）
3. 四公子曹植（继承了曹操的文学才能，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与老爸一起入选三国时期的七大才子，建安七子）
4. 小公子曹冲（继承了曹操的谋略与智慧，被称为神童，曾经用妙法称量大象，被传为佳话）

这四个儿子还真是有意思，各自占了他们老爸身上一部分的优点，但是有都有明显的缺点，所以曹操肯定会纠结了，到底要把家业传给哪一个。其实这个也不能怪曹操，如果有一个儿子能够多多少少把

他各方面才能都继承一些，哪怕没有他本人那么出色，我相信他也就不会这么纠结了。但是事实就是，他的这四个儿子都只占了其中一方面，特点还特别鲜明，所以也就没有了所谓的众望所归的人选。

看到这里，各位朋友，如果你是曹操，你会选择哪一个作为继承人？

曹大梟雄，其实一开始心理面是有答案的，他选的是小公子曹冲，因为小公子曹冲从小就智慧过人，深得曹操的喜爱，曹操讨论一些计谋，也只有跟这个年仅 10 岁的小朋友才能找到共鸣，其他三个儿子

基本上都没办法跟老爸在一个层面上讨论。

但是曹操这么一选择，一有倾向问题就来了，曹冲越是聪明，越是得到曹操的喜爱，就越是高调行事，毕竟他还是个小孩子，情商方面还比较低，基本上就是自己比别人聪明一定要表现出来，

这样就引起了其他三个候选人的不满与敌意。

政治型的曹丕行动了，他暗地里放毒蛇咬死了曹冲，在曹操怀疑是他所为的时候，曹丕又让毒蛇咬伤了自己（有一定的风险），来洗脱嫌疑，并且把这件事

嫁祸到了毫发无损的曹彰和曹植身上。最后终于抢到了继承人的位置。

故事结束了，最后政治型的曹丕通过一个卑鄙，外加一些风险的计策，赢得了这场继承人之争的胜利。

曹操

应该说，曹丕的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在曹冲还以为自己能够通过一次次证明自己的能力比

他哥哥强来获得继承权的时候，曹丕早已经制订了精密的谋杀他弟弟的计划

其实在我们现实中的职场中也经常会碰到这些不同类型的人，并且在这些不同类型的人之间发生的事情也出奇地相似。我们暂且将曹丕这一类型的人定义为政治型，而曹冲则定位为智慧型的人，最终一

般总是政治型的人在职场中更胜一筹。在公司里经常会听到有这样的抱怨：“我的能力比他强的多，但是公司竟然让他做了领导的位置”亦或是“我给公司做的方案，比他的方案要出色的多，怎么会采

用了他的方案”之类的。其实有这样一些抱怨的人，可以自我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像曹冲这样的，智慧型的人才，但是不太会搞政治。换句话说就是会做事，但是做人方面相对欠缺一些。

政治型的人才和智慧型的人才一个公司里都是必要的，就是都必须有，但是如果是这两种类型的人才之间相争的话，最后基本上都是政治型的人才胜出。因为当智慧型的人才正为自己可以靠智慧取胜而

沾沾自喜的时候，政治型的人才早已经在想如何去改变这个游戏规则的问题了。我想这个就

是曹操选世子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启示

帝王术与控制人才为己所用

人才是第一资源，现代社会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在古代，君王们对此更有深刻的体会。在战乱频仍的三国时代，人才的数量和质量甚至决定了国家的存亡。曹、刘、吴之所以能三足鼎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善于发现人才，吸纳人才，使用人才。纵观三国，曹魏最强，正是由于它拥有最大量、最优质的人才。魏国之所以能聚集起如此众多的人才，这与曹操独特的用人观是分不开的。

曹操在用人手段上有他独到的地方。司马懿从政的经历就很具有代表性。这个未来魏国重要的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在还未出仕的时候，就非常聪明通达，有雄才大略，为世人所知闻。当时一个名士崔琰曾经用八个字评价司马懿：聪亮明允，刚断英特。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曹操当然不会放过，决定任用他担任文学掾。司马懿那时思想很正统，他感到汉室衰微，不想屈节在曹操手下干活，借口得了风痹之症想推辞掉。曹操听了大怒，放出风声：不当官，就下狱。司马懿十分恐惧，只好接受召辟，就职上任。在汉朝末年，有一些士人确实存有很浓重的正统观念，虽然曹操控制着皇

帝，但不少士人忠于皇帝，却耻于为曹操效力。因此，曹操对他控制区域的人才，只要是有名望，不管你的政治态度如何，他一定会拔擢使用，甚至为此不惜使用暴力，刘备三顾茅庐的作派，曹操似乎是不屑的，他喜欢用更为直接的手段。如果谁不愿意入仕，那就得倒大霉，那些入仕而又不效忠曹操的，曹操一定会想方设法除掉他。所以，曹操发现了很多人才，使用了很多人才，但与刘备、孙权相比，杀的人才也是最多的，比较著名的就有孔融、弥衡、杨修等人。

曹操用人的气量是非常罕见的。曹操手下一个

大臣魏种的经历就很具有传奇色彩。曹操在兖州的时候，势单力薄，因此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他发现了一个叫魏种的人，认为很有才，就举为孝廉，刻意加以培养。兴平元年，曹操出师攻击陶谦、刘备，留守后方的陈留太守张邈乘虚发生叛乱，并联合吕布，占领了兖州。曹操听说这一消息，立即回军平叛，并对身边的人说：“兖州发生叛乱，只有魏种一定不会背叛我。”在曹操看来，魏种一定会尽忠死节的。然而，前方很快就传来了魏种逃离兖州的消息。曹操非常忿怒，说：“只要魏种你不是向南逃到越人荒蛮之地，或者向北逃到胡人塞外荒漠，我就一定要抓到你，决不放过

你。”五年后，曹操攻克袁绍部将眭固困守的射犬城，意外地在城内抓到了魏种，军士们把魏种五花大绑带到曹操面前。出乎众人的意料，曹操居然亲自把魏种的绳索解开，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唯其才也！”在我看来，曹操说这句话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对身边的人说的：当初魏种逃离职守，是因为魏种有才，不愿意没价值地死在兖州吧，当年魏种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二是对魏种说的：现在我放了你，不是因为你没罪，而是因为你有才，希望能继续为我效力。于是，曹操不但放了魏种，还任命他担任河内太守，全面负责黄河以北的事务。可以想象，魏种肯定感激涕零，终身不

貳。象这种曾经背叛曹操，后来又臣服曹操的将领还真的不少，比如张绣曾经发动叛乱，杀死了曹操的长子、侄儿和亲随大将典韦，但后来在贾诩劝说下重降曹操，仍然受到厚待。曹操这种用人的气量，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罕见的。

曹操是一个非常惜才的人。我们看看他对待俘虏沮授的态度。沮授这个人物，在《后汉书》、《三国志》中都没有他的传记，但此人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里，记载了沮授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沮授在兴平二年，向袁绍建议：“挟天子而令诸侯，

畜士马以讨不庭”。这个建议可不得了，要知道，曹操手下头号谋士荀彧是在第二年，也就是建安元年才向曹操提出类似的战略建议的。如果袁绍当时采纳了沮授的建议，先把汉献帝控制在手中，那中国后面的历史就没曹操什么事了。第二件事，沮授曾经向袁绍献破曹之策，就是根据袁强曹弱的特点，连年分兵袭扰曹操，打持久战，损耗曹操的实力，使之逐渐衰亡。可惜袁绍是个持速胜论的乐观主义者，拒绝了沮授的建议。第三件事，官渡之战前，袁绍势力上下认为此战必胜，洋溢看乐观情绪。而沮授呢？他在随军出征前，大会宗族，进行诀别，并把所有资产全部分掉，他跟弟弟沮宗

说：“主骄将怵，军之破败，在此举矣”。第四件事，在官渡之战打响后，沮授多次建议“坚壁持久”、“分军护粮”等正确的建议，但均未被袁绍采纳。由此看来，沮授不但是个战略家，而且也是战术家，实在是个难以多得的人才，如果遭逢明主，那一定可以经天纬地、安邦定国。这样的人才，曹操是绝对不会放过的。官渡之战后，沮授在乱军中被俘，曹操与沮授有旧，亲自去见了，两人留下了六句精彩的对话：沮授首先说，我不是投降的，而是被你们抓住的；曹操说，咱们处在不同的地区，一直被隔开不能相见，想不到今天你我会这样见面；沮授回答，袁绍失策，自取失败，我的才

智和能力全都无法施展，该当被擒；曹操说，袁绍无谋，不能采用你的计策，如今，天下战乱未定，我要与你一同创立功业；沮授说，我叔父与弟弟的性命，都控制在袁绍手中，如果蒙您看重，就请快些杀我，这才是我的福气；曹操叹息说，我如果早就得到你，天下大事都不值得担忧了。于是，赦免沮授，并给予他优厚待遇。不久，沮授策划逃回袁绍军中，曹操这才将他杀死。至于关羽降曹的故事，大家更耳熟能详了，曹操明知关羽不能久留，但只要关羽能够暂时在麾下效力，就予以封侯拜将的厚待。可以看出，曹操是非常惜才的，只要是人才，并且不对自己的事业构成威胁，哪怕

象徐庶入曹营一样，一言不发，一策不献，也会白白养着你。当然，一旦构成威胁，就只好痛下决心，尽显枭雄本色了。

曹操创造了一个新的人才评价标准。古代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尤以德为重。而曹操却搞了一个“唯才是举”，在他看来，德是用来教化万民的，才是用来安邦定国的。乱世之中，要以才为先。曹操更是下了一道《唯才是举令》来广征天下士人为他效力。他的观点，彻底颠覆了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识才用人之道。在用许攸这个问题上就很具有典型性。许攸是个贪财好利的小人，袁绍不能满足他，于是来

投奔曹操。此时正处官渡之战的最紧要关头，曹操没有粮食了，眼看就要退出战斗，自动败北。许攸劝曹操奇袭袁绍囤粮地乌巢，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一举赢得官渡之战的胜利。

曹操微时，汝南许劭对他有一句著名的评语：“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在用人这个问题上，曹操既有英雄慧眼识才的一面，也有枭雄手段血腥的一面，曹操的识才眼光，用才气量，选才手段，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帝王术拉拢人才必要手段

大家都知道曹操和刘备手下都有很多人才。刘备的，比如：诸葛亮、关羽，张飞等。曹操的，比如：郭嘉、张辽，夏侯惇等。我今天要说的
问题，就是他俩在拉拢人才的手段方面有何不同。

先说曹操，他在这方面的手段有两种。一：礼贤下士，猥自枉屈。就像他对关羽那样，三天一小宴，五天一大宴来款待关羽。在宴会上说关羽的功德。对关羽封官、赏银，赐宅。不过关羽最后还是没有归顺他，这是遇到了关羽这样对刘备“死忠”的人，要是一般人肯定投效曹操。二：威逼利诱，拿别人的家人作威胁。

就像他对徐庶，先礼后兵，一边先写信给徐庶劝他归降另一边拿他母亲做要挟。如果徐庶不投降，就杀了他的母亲。虽然徐庶最后投降曹操，但终身未为曹操出过一计。这个手段他运用失败了。

再说刘备，他也是两种手段。一：礼贤下士。对诸葛亮三顾茅庐，每次去还准备的特好，发现诸葛亮正在睡觉时，不让小童叫醒他，自己带着两兄弟静静地站在门外等候。直到诸葛亮醒来，没有一点烦躁。与他交谈语言十分谦虚，一点没有目中无人的样子。恳求诸葛亮出山时都快哭了。最后答应出山。这是刘备十分惯用的手段，而且相当有效。二：假意舍亲取臣。

在长坂坡大战时，赵云救阿斗于千军万马之中，九死一生。刘备怀抱阿斗说道：“为这小子，几乎损我一员大将！”说罢，当着赵云的面将阿斗扔在地上。他算准了赵云会去接他，所以才敢这么做。换回了一句“臣万死难报主公知遇之恩”，这也算值了。这就是将礼贤下士升级，有多了一个儿子没大臣重要。

那么曹操和刘备同样是礼贤下士，为什么刘备的部下对他更忠诚呢？我认为，一：刘备被人们一直认为和善，而曹操被人们骂为奸雄，奸贼。名声两人就截然不同，那人们肯定是投效名声好的。二：刘备更注重心理，他喜欢在别人心里下功夫，从内心去征服部下。曹操在

内心下的功夫不够，他注意物质享受，但不是
每个人只要功名利禄的，关羽就是一个例子。

帝王术如何让智者为你卖命

刘备在三国演义中最受人瞧不起，无论是曹操评价的“沛郡小辈，妄称‘皇叔’，全无信义，所谓外君子而内小人也……”还是“织席贩履小儿”的“大耳贼”，就可以看得到刘备先生在三国诸雄的人望如何了！刘备能从“织席贩履”的一介布衣，最终成为蜀国的皇帝，不能说是一无是处，细读三国，不难看出刘备立足，多靠的就是他的用人之道和领导艺术。

刘备的请人艺术，最著名的当数“三顾茅庐”这一节了。说实在的，刘备先生确实没有什么识人之才，从对庞统的态度，以及对马超的态

度不难看出这一点。但是在“三顾茅庐”请孔明出山的问题上，却显示对人才的另一面。

其一，从态度上来看，刘备先生能够三顾茅庐，而且一次比一次态度恭谨，甚至恭谨到那种有点做作的地步，尤其对诸葛亮身边的家人、朋友、亲属、仆童等的态度，让人看到甚至有点肉麻的感觉，就连他三弟张飞同志都有点看不下去了，觉得他做的有点过了，而不时地出言不逊，倒是读过《春秋》的关老爷似乎看出点猫腻来，一改那种瞧不起知识分子的态度，反而劝起张飞来。实实在在体现出“请人首在恭，态度必须敬”的请人前提。

其二，从行动上来看，刘备先生也充分显现出来“一谦，二拍，三高帽”的请人技巧。首先说“谦”，也就是谦虚。通过司马徽、徐庶的推荐和介绍，刘备已充分了解到诸葛亮的习惯和性格，知道诸葛亮是个自命清高，狂妄自大的年轻知识分子，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往往好为人师，喜欢高人一头，所以在请诸葛亮出山的问题上，先把自己的地位摆正，而不再张嘴比先言“汉室宗室”自抬身份，而是持弟子礼来博取诸葛亮的好感。其实刘备心里也给明镜似的，知道诸葛亮不会不知道他的，也是非常了解这种知识分子的心态的。第二说“拍”，就是拍马屁。刘备通过了解诸葛亮常自比管仲、

乐毅，当然会通过那方面来有针对性的进行溜须拍马。刘备心里会说，你诸葛先生不是才自比管仲、乐毅这两个治国之能臣吗，我干脆拍马拍到家，直接称呼你具有姜子牙、张子房两位开国能臣，一下子就拍得诸葛亮晕晕乎乎的，于是不光很快在家里等着了，而且认真准备了“隆中对”这样好的面试答卷，与刘备先生一拍即合，迅速成交。第三说“高帽”，自然就是“戴高帽子”了。刘备最会给诸葛亮戴高帽子了，先不说“白帝城托孤”一顶高帽子直接把诸葛亮一家子都用死算完，就说在请诸葛亮出山的这几句话吧，就可见这顶帽子的高度。例如在二顾茅庐时给诸葛亮写的那封信

中，提到“仰望先生仁慈忠义，慨然展吕望之大才，施子房之鸿略，天下幸甚！社稷幸甚！”不光给诸葛亮戴上姜子牙、张良这样的大帽子，而且直接上升到天下、社稷的高度！在诸葛亮谦虚自己“亮乃一耕夫耳，安敢谈天下事？二公谬举矣。将军奈何舍美玉而求顽石乎？”的时候，刘备又直接给诸葛亮戴上“抱经世奇才”、“以天下苍生为念”等大帽子，直接把诸葛亮这样聪明的人拍的忘记了矜持，主动地提出自己“三分天下”的想法，更有甚者生怕刘备听不懂，连准备好的地图都拿出来，不能不说刘备先生的高明之处了。

其三，从当事人身上来看，不难看出“稳、准、狠”的特点来。稳，主要是说像刘备这样请人的主，心态要稳，任凭什么考验和意外的发生，丝毫不能干扰他的心态，尤其是要讲明的一点就是脸皮厚是心态好的关键。准，就是说看人、看事要准，最起码要一样看清对方的特点，尤其是弱点，只有抓住对方的弱点，才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直接拿下。狠，不是对人发狠，而是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的意思。就像人家刘备一看诸葛亮被忽悠动了，根本不会给诸葛亮再思考得失的机会，根本不留什么反悔的余地，直接把人带走，这才是真正的“短平快”、高效率呢！

刘备请人的这一套，并不能算高明，因为有些话对司马徽、崔州平等人也讲过，可是最终只有诸葛亮入彀，也就说明了请人艺术的针对性和特异性，只有活学活用，才会成为真正的艺术，而不是简单的“吹捧、拍马”。

帝王术使用切记因人而异

刘备在人际关系中不同方式或者叫手段吧，刘备开始起家的本钱，也是刘备唯一的本钱，就是桃园结义，刘备对关张二人，用了一个义字，义，这里不是道义，而是义气！什么是义气，我有事情，你得帮我，你有啥事情，我也帮你，这就算义气了，而关张二人，勇武冠绝天下，对刘备来说，绝对是最好的帮手，所以这个义字，对刘备来说就最适用不过了。而这个时候的张飞，是个不小的老板，既然大家已经结义，要讲义气了，你张飞的家产，就是我们三兄弟大家的家产了，唯一的处理办法，就是张飞把家产卖掉大家一起花！后来的历史上，有忠义

堂，聚义厅什么的，就是学习刘备好榜样的结果。而对于关张这样只一根筋的人来讲，义是最好的办法，就像一条绳子，把关张二人牢牢的缠住了。关羽投了曹操后，曹操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对关羽，送黄金美女赤兔马，最后没有留住关羽，因为曹操对待关羽的，是恩和利，而不是义，曹操用错了方法，所以关羽还是跑了。

刘备对赵云，就换了方法，不是用义字诀了，而是一个仁字，血战长坂坡，赵云在曹军千军万马中找回阿斗，当赵云把阿斗递给刘备的时候，刘备把阿斗摔在了地上，而且说了句：“为

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刘备的这个举动很有看点，意思是赵云比他的儿子还重要。而实际上，这个时候的赵云，就是保安队长，他的职责就是保护刘备的家眷，而赵云回来的时候，把夫人丢了，只带回阿斗，是应该要被军法的，但刘备没这样做，而是演了摔子慰大将的高明之举，换做一般的人，肯定问赵云：“小赵，我儿子你带回来了，我老婆呢？她在哪里？”当得知夫人已死，肯定会责怪赵云，但刘备没有，这是刘备对手下战将的仁，不要说赵云，刘备的这个举动，换了谁，都会感动。如果换做关羽张飞搞出这样的结局，估计最少也要被刘备一顿臭骂的。因为关羽张飞刘备可

以骂，他们三人的关系是义，帮刘备做任何事情，变得理所当然了！

对于诸葛亮这样的人物，刘备用义和仁，用眼泪，都是没用的了，人家明察秋毫，真情假意的东西，在诸葛亮面前就已经失去了表现和表示的必要，这个时候，刘备需要的是表露自己的志！也就是自己的大目标大计划，只有刘备告诉诸葛亮自己真实的大目标，对于策划高手诸葛亮才能按照刘备的目标来拟定计划，所以隆中对的前提，是刘备的志向，如果刘备想当个县令什么的，估计诸葛亮一听就跑掉了，而刘备也没再使用什么隆中结义这样的老手段。

作为诸葛亮这样的谋略家来说，他需要一个大舞台，需要一个能展现自己定国安天下这等才华的雄主，仁义道德这些草民所以忌惮的东西，对诸葛亮来说，不具备任何的约束力。所以当刘备一说“欲伸大义于天下”时，两人便一拍即合，连夜作战，一个三分天下的计划就立马出炉了！

对于西川的张松，刘备就又有了解办法。张松，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自命清高的知识分子，去了许昌，没有得到曹操的礼遇，还被羞辱一通，正在觉得自己颜面扫地的时候，被刘备接了去，刘备对付知识分子，很有办法，先

是近乎国礼迎接张松，然后让荆州集团的高级将领高级参谋作陪。知识分子最需要的，不是金钱，不是美女，他们最需要的是颜面，谁给的面子大，就向着谁，就跟定谁了。经过刘备一番高级别的招待，张松终于感觉了一会自我的尊严，所以一激动，就把西川的地图给献出去了！新中国开国之初，郭沫若，柳亚子等先生，就因为“雄鸡一唱天下白”纷纷效命，我觉得道理上差不多吧。

上述，只是刘备对待自己的手下或者将来的手下的态度和手段，由此看，刘备的成功绝非偶然！

帝王术在起步阶段的施展很重要

刘备从一介平民，经过个人奋斗，成为九五之尊，认真探究起来，必有其成功之道。常言说，乱世出英雄。社会大动乱的大环境，给每个有志气有才能的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不过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中，有如刘邦、刘秀、朱元璋，等等，就是从社会最底层经过奋斗成功的范例；而陈胜、吴广，陈友谅等，就是奋斗未获成功的例子。刘备从平民到皇帝，经过了几十年的奋斗，最终获得成功，排除环境和客观因素，就刘备主观上而言，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八大因素。

一、立志。立志是刘备成功的根本因素。刘备屡败屡战，斗志不减，根本在于志存高远，不因一时之得失而心灰意懒。刘备少有大志。就像陈胜曾经与一起劳作的人聊天时说的，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三国演义》在刘备出场时有一段话，表明了刘备不是社会底层碌碌无为的一般百姓。当时黄巾军前来犯幽州境界，刘焉招募义兵相抗，引出了一位英雄：“那人不甚好读书，性宽和，寡言语，喜怒不形于色，素有大志，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家住本县楼桑村，其家之东南，有一大桑树，高五丈余，遥望之，童童如车盖。相者云：此家必出贵人。玄德幼时，与乡中小儿戏于树下，曰：我为天

子，当乘此车盖。叔父刘元起奇其言，曰：此儿非常人也”。这段话，表明了刘备从小就蓄大志，这个大志不是别的，而是当皇帝。刘备与张飞、关羽相识，结为异姓兄弟时，表明要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也可看出其志向。曹操煮酒论英雄，当说到“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时，刘备惊得筷子掉在地上，说明曹操说中了刘备的心事。刘备三请诸葛亮，诸葛亮前两次避而不见，我看主要是不明刘备志向，常言道，良禽择木而栖，诸葛亮作为一代良相，自当要寻英主。刘备三顾茅庐时，诸葛亮明说了：“愿闻将军之志”，刘备屏退旁人后说：“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备不

量力，欲伸大义于天下，”通俗地说，就是要取天下而治理之。刘备立志可见一斑。

二、用贤。用贤是刘备成功的关键因素。刘备用贤，最重要的是用了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请到诸葛亮后，成了刘备事业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刘备东奔西逐，遑遑似丧家之犬，没有立身之地，虽有大志，但不得伸。得到诸葛亮后，取荆州，定益州，终成帝业。刘备一生，对诸葛亮非常信任，大事都委任于他，让诸葛亮放手去做，从不生疑。诸葛亮也竭尽心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因如此，刘备才能取得成功。在用贤方面，刘备还用了庞统、马良

等人，但终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出之处。特别是庞统，经孔明推荐，刘备并不识其才，几乎错过。而其他贤才，在诸葛亮的光芒掩映之下，也未能得以充分发挥。因此，在刘备集团，不像曹操集团那么人才济济，倒像是诸葛亮一人之外，有点人才凋零的样子。这也是刘备的事业很快消亡的重要原因。

三、结义。结义是刘备成功的重要因素。桃园三结义，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人关于义的最高境界。但刘备结义，乃是深谋远虑，主要是从事业考虑。在刘备的过程中，关张二人多次救了刘备的命。到后来，成

为刘备事业的柱梁。刘备入西川后，关羽镇守荆州，与曹军和东吴对峙；刘备夺取益州后，张飞任巴西太守，与新占汉中的曹军在第一线对峙。关张二人，是刘备集团的核心骨干成员，刘备集团的凝聚力、战斗力由此二人支撑。关张一生，从未与刘备离心离德，而是团结一心，浑如一体。在刘备的一生中，用义气笼络人体现最充分的另一个例子是赵云，赵云被刘备用义气打动，跟随刘备一生不悔，为刘备的事业立下大功。

四、借势。刘备善于借势，这也是刘备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刘备本是一介平民，不像曹操

有曹家和夏侯家两大家族的势力可供倚赖，也没有孙权那样有父兄创下的宏大基业。刘备完全是白手起家。在那个时代，要做出一番伟业，必须有人跟随，组成一个势力集团。一介平民百姓，要得到别人的信任，做到一呼百应，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刘备有办法，他充分利用了他的姓氏，也就是当时的皇姓。说他是什么中山靖王之后，一下子成了皇族血统。不仅如此，他还攀上了皇帝的叔叔的尊位，被尊为皇叔。刘姓本是中国大姓，是不是皇室血统，在当年那个乱世，想来也没有什么人去认真追究，即使追究，也不一定弄得清楚。刘备与人交往，口必称备乃中山靖王之后，打着维护汉

室的旗号，以后登上皇帝宝坐时又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确实蒙住了一些人。中国历来有名正言顺的说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刘备深谙此道。刘备打着中山靖王之后的旗号，也增强了其事业的正义性，自己理直气壮，跟随他的人也理直气壮了。

五、装衰。刘备有装衰的本事，是一个表演天才。历史上有一种说法，说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江山，此话大致不假。综观《三国演义》通篇，写刘备哭泣、下泪的不下几十处，刘备真是一个哭才。刘备三请诸葛亮时，见其不肯出，即哭，孔明见刘备哭，就同意了。在刘表

府上，在刘表墓前，刘备都曾哭过。为不还荆州给孙权，刘备哭过。娶孙尚香时，刘备在吴国太前哭过。在与刘璋相见时，刘备哭过。赵云当初离开刘备回公孙瓒处，刘备泣别。在襄阳携民渡江时，刘备大恸。在长坂坡，赵云救回了阿斗，刘备哭了。关羽、张飞死后，刘备终日哭泣，以致泣出血来。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刘备作为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为什么动不动就哭鼻子流眼泪呢？难道是真正到了伤心处吗？我看不一定。哭，只是刘备的一种处事待人的方式，是为了感动别人，打动别人，使别人被感动，引起别人同情。有时是为了表明诚心。但有时又是惺惺作态，作给别人看的。

比如在襄阳渡江时，面对百姓大恸，就主要是做给别人看的，作出一种爱民如子的样子。在长坂坡赵云救回阿半后的哭泣，既有伤心的成份，也有做样子的成份。看来，即使是想当皇帝的人，装衰也是一种可用且有效的手段。

六、傍款。这里说的傍款，是借用当今傍大款的说法。傍款，其实也是借势的一种做法。但刘备的傍款，不只是借势，自己势力弱小时，去依傍某个强大的势力，保存自己的实力，慢慢发展壮大自己。而是夺势，喧宾夺主，以客代主。三国时期的绝大多数强大的势力，刘备几乎都去傍过。最早是傍公孙瓒、田楷，然后

是傍吕布、陶廉，再是傍曹操、袁绍，然后是傍刘表、孙权，再后是傍刘璋。刘备傍大款，不只是勉从虎穴暂栖身，而是处心积虑，暗中抢夺地盘实力，准备独树一帜，反客为主。在与公孙瓒打交道时，曾向公孙瓒借兵，暗地拉拢赵云，挖公孙瓒的墙脚，由于公孙瓒警惕性高，逼着刘备还人，才未得逞。与陶谦打交道时，实际上抢夺了徐州。在与袁绍和曹操打交道时，没有占到便宜。后来，只好打同宗的主意。打刘表的主意时，被蔡瑁识破，才有马跃檀溪，但刘表死后，还是抢到了江夏作为根本。与孙权打交道时，占到了荆州的一大块地盘。最后，算盘打到了宗兄刘璋的头上，抢到了益

州，终成帝业。刘备的地盘、人才，基本来自于荆州、益州。刘备从白手起家，傍款，借用已有的势力，是他的一种重要策略，这也是他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

七、联姻。刘备最早的夫人是谁，看过《三国演义》之后摸不着头脑，最早见到的刘备的夫人，是糜夫人和甘夫人。糜夫人是徐州豪富糜竺的妹妹。甘夫人是在小沛时娶的，不知来源如何。刘备娶糜夫人，据说是糜竺见刘备身边没有女人，没人照顾，而把妹子嫁于他的。但实际上，糜竺在徐州算一个大财主，且有影响力。刘备娶其妹，不乏政治上的考虑。糜夫人

死于当阳长坂坡。甘夫人生了阿斗，因长期战乱，死于赤壁之战前后。由此，有人说刘备命硬克妻。赤壁战后，孙权把其妹孙尚香嫁好刘备为妻。这个婚姻，应该更多政治成份，是为了巩固孙刘联盟。因为刘备时年已经49岁，孙尚香还是二八佳人。刘备入成都后，孙尚香回了东吴。刘备又娶了一个寡妇——刘焉之子刘瑁的妻子——吴夫人。刘备娶吴夫人，一则可能是因为她漂亮，二则可能是为了笼络益州人，巩固他在益州的地位。由此看来，刘备的婚姻，殊少爱情因素，更多政治因素，这也是政治人物的悲哀。

八、逃命。刘备一生，逃命之时颇多。把逃命也列为刘备成功的法宝之一，是因为逃命在刘备事业成功中的重要作用。刘备深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材烧”的道理，正由于他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才使得他最终能成就大业。值得一提的是，刘备逃跑有术，每每大难不死，又死灰复燃。著名的逃跑，有从徐州逃到袁绍处，有从袁绍处逃到荆州刘表处，有从新野、樊城经长坂坡逃到江夏，最后的一次逃跑，送了老命。也就是夷陵一战大败，逃回白帝城，抑郁成疾，又羞于见人，不敢回成都，终至不起。综观《三国演义》，刘备基本不会打胜仗。正如陆逊在夷陵之战中所论：寻备前

后行军，多败少成，推此论之，不足为戚。还有一段，谈及刘备会逃跑、会打败仗：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惫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陆逊之论确实精到，对刘备的分析精辟入微，正是其看透了刘备，所以才定下掎角此寇之大计，一举击溃刘备，使之一蹶不起。

帝王术施展政治谎言高手

诸葛亮“天下三分”的论断最初见诸于他和刘备畅谈天下大势的“隆中对”上。路卫兵在反复研读这段对话后，发现这不过是刘备用障眼法上演的政治谎言，是老谋深算的刘备亲手导演的一场政治阴谋。

陈寿在《三国志》中这样记载的这段著名的对话：刘备问计诸葛亮问计，“君谓计将安出？”。诸葛亮回答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

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从诸葛亮的这段对答中我们不难看出以下几个问题：

一，诸葛亮“三分天下”的言论很合乎刘备的心思。曹操实力雄厚，自不必说，孙权占据江东天险，也是不可动摇了。这不是只有 27 岁的诸葛亮能看出来的问题，历经“军阀混战”、年纪将近 50 岁的政治老手刘备焉能不知？刘备当然想成就为第三方势力，诸葛亮这话是说到他心里去了。

二，刘备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刘备前期一直不顺，徐州被吕布攻取之后，就投奔了曹操，然后又与董承合谋想推翻曹操，结果被曹操发觉，只得逃奔袁绍，曹操灭袁绍后，刘备又投靠荆州的刘表，荆州降曹后，刘备又被曹兵追

的逃往夏口，到刘表的儿子刘琦处安身，可谓颠沛流离，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三，诸葛亮的战略很幼稚。请看：“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说的何其轻松，却并没有实质上的战略战术。要搁现在，就是个标准的大忽悠。“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就更是天真的想象了，刘备是“帝室之胄”老百姓就一定热烈欢迎？就不敢不欢迎？即是这样，又何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黄巾军起义呢？理由站不住脚。而且诸葛亮一直想当官。他“躬耕陇亩”，却“每自比于管仲、

乐毅”，对刘备很是吹捧：“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完全不是让刘备在草庐外坐等的姿态了。

路卫兵之所以认为“隆中对”是刘备用障眼法上演的政治谎言，是刘备导演的一出政治阴谋，有以下五个理由：

一，刘备所谓的“兴复汉室”本身就是一句门面话。刘备起兵反曹，政治口号是兴复汉室，然而汉室本身就存在着，曹操虽“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也没敢废掉汉皇自己称帝。曹操是“汉贼”，刘备执政就是兴复汉室？就是正义的了？其实这不过是刘备自己的政治野心，自

己想掌权而已。再说兴复汉室一定得用你刘备？刘备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镇压黄巾军起义后以县令起家，只能勉强还算是汉室的皇亲，但绝非宗亲，刘表刘璋可是正儿八经的汉室宗亲，要兴复汉室，怎么也轮不到刘备。

二，诸葛亮在刘备面前是个小儿科。刘备是什么人物？是经历过镇压黄巾军起义，做过地方官吏，几次历经生死一线的人，是政治上的老手，城府深得很。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早就把他当做一个强敌了，那时刘备还是羽翼未丰呢。诸葛亮博学多才自是不假，但是学问和睿智代替不了经验，当时诸葛亮只有 27 岁，每日“躬耕陇亩”，只是志向远大，“每自比于

管仲、乐毅”，然而他连南阳都没走出去过，更没有政治经验和实践磨砺，这与老道的刘备相比简直是小儿科。诸葛亮再能耐也毕竟不是神仙，隆中对不过是他自己想象中的一种政治见解而已，也不见得有多高明。毛泽东就曾这样评价隆中对：“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能不败”。对诸葛亮的战略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刘备喜欢，因为诸葛亮的策略很对自己的心思，诸葛亮说出了他想要的。

三，刘备急于寻找政治上的出路。刘备为什么三顾茅庐，你说他求贤若渴也对，说他是在寻找政治上的代言人会更恰当。刘备想称雄自不

必说，然而天下之大却没有他的立锥之地，被曹操追的惶惶不可终日，只能寄人篱下。他何尝不会有夺荆州取益州的心思？这也是明摆着的事，北方都是曹操控制，东南是孙权，他要想称霸，除了荆益二州也没别的地方可选了。然而他不能做，那样就会落下不仁不义的罪名。这下好了，诸葛亮当了替罪羊，“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智能之士思得明君”，这是上天的安排，理所应当的事，他们即是这样的不中用，你不去占领替代他们，天下智能之士都会觉得遗憾，刘备焉能不“有意乎”？

四，刘备在政治策略上需要舆论的支持。刘备想夺荆益二州，势必背上同室操戈的罪名，落得个伪道义的嘴脸。况且人家在他受难时收留他，没理由下手。诸葛亮正好为刘备找到了政治上的借口，并且替刘备做了舆论上的宣传。刘备把诸葛亮捧得极高，“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不如说他是想利用诸葛亮的声名替他造势，利用诸葛亮之口为自己的政治图谋寻找借口。来实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话从诸葛亮口中说出来，与刘备自己做出来毕竟不一样。所以他不顾“关羽、张飞等不悦”，“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刘备并不是很信任诸葛亮，

他是有头脑的，这在后来刘备临死托孤之际交代给诸葛亮的话中，就能窥其一斑。

五，刘备自己一直想做皇帝。刘备的口号是兴复汉室，然而曹丕称帝后，刘备便迫不及待的称帝，这能说是“欲信大义于天下”吗？既要为天下讨公道，为汉室讨公道，何以不扶持一个汉室宗亲为帝呢？整天嚷着“汉室倾颓，奸臣窃命”，而刘备自己又什么时候把汉皇帝放在眼里放在心里了呢？其原因恐怕就是他自己想做皇帝罢了。也对，谁愿意编一辈子的草鞋呀。

帝王术的奸诈与虚伪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在内容倾向上，历来被人说成是“拥刘反曹”的，作者罗贯中把刘备塑造成了道德信义的化身。理所当然的，刘备也就成了理想明君的典范，既仁厚爱民，礼贤下士；又诚实忠义，贵义尚情。果真如此吗？笔者不敢苟同，其形象塑造实在是违作者的创作意图，给人以“画虎不成反类犬”之感。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论《三国志演义》的人物描写：“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至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鲁迅先生对刘备形象作如此阐述，真可谓一语中的。这里鲁迅所说的“近

伪”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人物形象有违作者的初衷，与作者心目中想塑造的仁厚爱民、礼贤下士、诚实忠义、贵义尚情的理想的明君形象相去甚远；二是说人物的性格特征虚伪，是一个表面道德信义，实则假仁假义、残酷无情、不思进取而又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刘备的这种艺术形象的成型，不仅有真实的社会历史土壤，而且也是中国历代文化的浓重沉淀的结果，铸造了这个人物形象，树立了仁君的典范。虽然作者为塑造这个人物而涂上了一层光亮的色彩，甚至不惜用了曲笔，以体现作者的主观理想和历代人民群众的愿望，但是刘备毕竟只是一个封建军阀，不可能反映那

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更何况他是一个由封建社会下层逐步挤进上层的政治家，还不可避免的带上了小农意识的味道。他同样与董卓、曹操一样有政治野心，只是刘备掩藏得更深罢了！正是这些缺陷，才会把刘备塑造成了一个“近伪”的艺术形象，其虚伪

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残酷无情

刘备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全不为大局着想，又残酷无情，无半点怜悯之心。在第十五回中，他借古人之言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兄

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破，尚可缝；手足断，安可续？”对待至亲之人妻子儿女尚且如此，更何况他人呢？与其高祖刘邦可以不分伯仲啊！拉拢关、张，又何尝不是“惜其勇而用之”，为打拼自己的江山做准备。更可以作为印证的是第三十四回刘备一听说蔡瑁要设计害他，“急解‘的卢’马，开后园门牵出，飞身上马，不顾从者，匹马望西门而走”，半点没有想起赵云等三百将士，好一个“不顾从者”！看来他自家性命才是最重要的，其利害的取舍也可以窥见一斑了。

为关、张复仇之事，好像义之极至，纵然赵云、诸葛亮等人劝阻，也无济于事。但当东

吴把所有的仇人都送来的时候，并再次表示要送还夫人，返还荆州，以求和好时，刘备仍然不听，继续坚持“削平江南，杀尽吴狗”，可见刘备名义上是为“义”字复仇，实际上是为消灭东吴而战！其卧榻之旁又岂容他人酣睡！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设计，是图美名而争天下者也。

而其最残忍和无情的是，刘备为了自己的霸业，动辄便抛妻弃子，而且饥饿的时候竟然食同宗之人妻子之肉，真令人发指。第十九回有，“玄德见势已急，到家不及，只得弃了妻小，穿城而过，走出西门，匹马逃难”，还没有到生死关头，却把妻小都给抛弃了，深得上

祖刘邦之遗风，这品质也够可以的了。

更严重的是：“(刘备)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少年出拜，问其姓名，乃猎户刘安也。当下刘安闻豫州牧至，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刘备)遂饱食了一顿……方知昨夜食者，乃其妻之肉也。玄德不甚伤感，洒泪上马。”刘安固是残忍、无耻，但罪魁是刘备。而饱食了一顿之后，刘备只是伤感而已，并没有大惊失色，更没有深疚自己，更没有给别人以适当的安慰和补偿，更别提囑而埋之了。倒是曹操闻后，“乃令孙乾以金百两往赐之”，曹操真奸雄，也没有食人妻子的事情，也还知道补偿点什么给别人，相对比较，

刘备也够残忍和无情的了。

二、欺世盗名

刘备又是一个欺世盗名者。表面上他也打着“保国安民”的旗号，声称“灭曹操，共扶汉室”，利用自己占有汉家姓氏的一点便宜，便到处夸耀，显示自己的身份，时时刻刻以“汉室宗亲”自居，打着刘皇叔的金字招牌，口口声声表示“欲伸大义于天下”，“匡扶汉室”，以维护汉帝的正统地位相标榜。[2]实则不然，南朝人裴松之和元人胡三省在注《三国志》和《资治通鉴》时均已明确指出：刘备

“虽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3]可见，刘备出身于破产的贵族家庭，其上几代早已属社会下层，到他时已沦落为平民。自己声称对帝位是万不可以动其心的，可最终他却还是登上了宝位，仍不忘惺惺作态说：“备无才德，请择有才德者受之。”几番退让，甚至还“勃然变色”，但也未见当时孔明他们“逼”他为帝的态度有多坚决，倒是他自己说出了心里话“吾非推阻，恐天下人议论耳”，只是担心别人的议论，与曹丕登位所费周折的意图是何其的相似啊！这就是刘备经常装腔作势、欺人耳目的奸诈之处。

在当时群雄竞起的战争环境中，刘备攫取帝王的野心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在小时候便云“我为天子，当乘此车盖”，看来他是自小“立志”啊，就凭这点他可以算是从小便处心积虑的想登上大统了。之所以没有实现，只不过是限于当时他势单力薄，一时无力和别人抗衡而达不到目的罢了，就象在刘表面前夸口一样“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第三十一回蔡瑁劝刘表不要引狼入室时说：“刘备先从吕布，后事曹操，近投袁绍，皆不克终，足可见其为人。”一语道破了刘备有狼子野心。否则，他就不会在战乱之时投军，其心思无非是想浑水摸鱼，捞上一把，他还是

知道乱世出英雄的道理的。还好当时以他的“才智”还可以对付黄巾之类乌合之众，消灭了一部分黄巾军，多多少少还算是捞到了一点政治资本，立了所谓一点军功，不然他就真的没有机会实现儿时的梦想了。

可实际上，他除了与董承等六人书名带血诏并常在阵前宣读以示正义以外，终其一生，并没有为朝廷设为一谋出过一份力，倒是处心积虑的经营自己的蜀汉天下，时时刻刻想摆脱别人的控制去谋划自己的天下。刚与董承等人书带血诏，都还没有行动，一见有机会逃走去经营自己的天下，便什么也不顾了。还亏他走之前对董承等人说“某此行必有以报命”，可

最后董承等人都死了，也未见他报什么命，倒是把自己的事业打理的有条不紊。

最可以突出他全然不顾“汉室”而只顾自己恩怨的是伐吴前诸人劝其勿战所说的一番话，连他自己也说“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还亏赵云劝说“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不知道此时他把“匡扶汉室”忘到哪里去了，而把自己的事情看的比什么都贵重，可见他平日里那些豪言壮语只不过是方便行事的幌子罢了。

而最能揭示刘备早有野心的是：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封，一个名禅，合即为“封

禅”——天子祭天地之礼，这样明确的政治野心及强烈的功利进取心，时时隐含着取而代之的图谋。至于他一再标榜自己是什么“汉室宗亲”，只不过是取“正统”之名罢了。

三、假仁假义

他的假仁假义更是让人作呕，且不说先摔阿斗以笼络赵云，终至让赵云感其知遇，几救阿斗，诚心辅佐，后又白帝托孤，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把诸葛亮感动得终身为其江山操劳而卒。虽他说的好听：“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成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

其无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明是支持诸葛亮自己来主政，实际上是让诸葛亮辅佐刘禅，而让其开口不得也只好甘心辅佐了，单看刘备这临终遗言的意蕴，李贽就一针见血的评道：“只此一语，便得孔明之魄，玄德真奸雄哉！”

在第十九回中，吕布被擒，求刘备为之讲情，“公为座上客，布为阶下囚，何不发一言而相宽乎？”刘备点头答应，但一转眼又劝曹操杀吕布，一点不念其辕门射戟之情，此等忘恩负义之人又岂能称得上仁义呢？所以作者仍不免跳出来借吕布的口骂道：“是儿最无信者！”同样的，当他被曹操打败，只身投奔冀州，答应表示招关羽来归，可结果是他使奸计

欺骗了袁绍，[4]杀了别人的大将，之后又巧言遮掩，挑拨别人君臣关系，都是为了自己的如意算盘。当刘备装作无可奈何之状而取得刘璋之地后，却又乐不可支，“设宴于公厅”，“顾庞统曰：今日之会，可为乐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可见之前说不可夺同宗之地，不可行不义之事，皆是伪作，是“外君子则内小人”，既然反复说不能夺同室之地，不能行不义之事，然而一旦夺了人城邑之后，即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足见其伪诈到何种程度！

当献帝被废后，曹丕称帝时，他的臣子劝其“即皇帝位”，他又以“恐天下人议论”为由，竟勃然变色说：“孤岂效逆贼所为！卿等

欲陷孤为不忠不义之人耶？”说的多么冠冕堂皇，正义凛然，对比其儿时的“豪言壮语”和此前他自信“备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辈，诚不足虑也”是多么绝妙的讽刺啊！。只是刘备做的很隐秘罢了。他一再请诸葛亮“展吕望之才，施子房之宏略”，俨然以周文王、武王、汉高祖自居，可又在前面称帝惺惺作态。犹如在甘露寺前以剑劈石，对人说是“破曹兴汉”，而心里想的是“成王霸之业”，其虚伪之貌昭然若揭。

在第五十一回中，诸葛亮与刘备的一番对话，更是让刘备的假仁假义的面目无所遁形。

“玄德问孔明曰：‘却才先生教备如此回答，

虽一时说了，展转寻思，于理未然。我今孤穷一身，无置足之地，欲得南郡，权且容身。若先教周瑜取了，城池已属东吴矣，却如何得住？’孔明大笑曰：‘当初亮劝主公取荆州，主公不听，今日却想耶？’”一个“笑”字，把刘备的虚伪之情刻画得淋漓尽致，诸葛亮的潜台词不言而喻。

刘备对人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是讲义的，但一旦危及自己的利益就什么也不顾了，连自己的儿子也是如此。其义子刘封听信谗言不救关羽以至于失去一员大将，贻误军机，确实有罪，但也不至死。再说死与不死自有法律断定，可刘备不但使用了郑庄公不教而诛的手段，而且

在刘封拒绝投降，扯书斩使之后，已经完全证明忠于自己了，还是杀了他。直接原因就是刘封不应该强于阿斗，亏他当初收刘封为义子说的那些话，什么只要诚心待人必不相负，而此时对于危及自身利益的人的处理还管什么之前说的什么话，虚伪之貌令人恶心。

四、贪图享受

刘备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更是让人鄙其为人。在第三十九回中，刘备自己以为有了诸葛亮便可以万事无忧了，纵然已经知道曹操会时刻南下，他却以牯牛尾“结帽”，还辩解说：

“吾聊假此以忘忧耳。”而当诸葛亮问及将何以迎曹兵时，他却又说：“吾正愁此事，未得良策。”一说这一说那，前言不搭后语，彼此矛盾，正是说明了他无多大志向，不愧为阿斗之父，还巧言掩饰，亏他之前说“备若有基本，何虑天下碌碌之辈耳”。就算是有了基本，如果这个样子也是败家子，又一个刘阿斗。就象后来自衿才智被陆逊火烧得片甲不留，终至身亡白帝城。

更为经典的是他差点因女而轻天下。在第五十五回中说刘备与孙夫人成亲后“自此连日饮酒”，这时候倒是会借酒忘忧啊！还是张昭了解其为人，“刘备起身微末，奔走天下，

未尝享受富贵。今若以华堂大厦，子女金帛，令彼享用，自然疏远孔明、关、张等”，“玄德果然被声色所迷，全不想回荆州”，与其子看来是一样的啊，“此间乐不思蜀”，不愧是阿斗之父。若不是诸葛亮设计在先，让赵云依计行事，刘备又怎么会突然想回荆州呢？看来，孔明也知道其为人，要不怎么会考虑得如此周全呢？只是不便直说罢了。刘备一口一声要成就大事，连这点关口都过不了，还说什么“天下碌碌之辈不足虑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还是书中评论的好：谁知一女轻天下，欲易刘郎鼎峙心！

到了最后阶段，作为最终鼎立一方的霸

主，刘备的后期已经完全没有了曹操那样始终是曹魏方面的主心骨和最高决策者的支配地位，他没有了用武之地，似乎在成功地完成了“三顾茅庐”的任务之后便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时刘备实则已经成为真正的刘阿斗之父了，不过徒具一个象征意义上的符号而已。[5]夷陵之战中，连不甚精通兵法的曹丕也知道“岂有七百里营帐而可拒敌乎？包原隰险屯兵者，此兵法之大忌也”。刘备却还是那样的自以为是：“朕令吴班引万余弱兵……擒此竖子，江南一鼓而下矣。”

然而时代不同了，对手也不同了，与当年伏击黄巾军这般乌合之众大不一样了，却仍那

样自诩，以抱残守缺为不凡，怎么不会被吴将“营烧七百里”，“蜀营一应粮草器仗，尺寸不寸”，“蜀将川兵，降者无数”，留了个兵败身亡的下场，亏他还自诩“朕用兵老矣”。

但之前当马良谏阻不了刘备移营之后，建议“将各营移居之地，画成图本，问于丞相”之时，刘备便猛地爆发了久蓄的不满：“朕素知兵法，又何问之？”这倒好，被陆逊火烧七百里，只落得个惨败的下场。回顾刘备的生平经历，若没有诸葛亮便一事无成，此处就是印证。其不思进取也就罢了，却又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焉能不败！

此上事实一一摆明在我们面前，是作者有

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无从得之。既然罗贯中是“拥刘反曹”，也应为贤者讳，隐去才是；也许是为了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有血有肉；到底是何目的，恐怕是无法说清的，从这一点看来似乎是艺术败笔所致，也可以说是无心之失了。作品客观的描写告诉我们：刘备用虚伪做作掩盖了其真实的意图，貌似忠厚，内藏奸诈。《三国演义》第六十回引正史曰：“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谄，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刘备的这番自白，无意中撕破了他的假仁假义，他之所以以宽、仁、忠，其实不过是一种反曹操的策略。

帝王术统一手段

司马炎统一的影响：司马炎统一中国是中国古代最仁义的统一，能优待孙刘曹皇族，是最和谐的统一。封建专制伦理严重时，皇帝只关心自己统治时间的长短和权势，不像现代人重视社会进步、国家统一、民族生存这些内容。司马炎统一在历史上发挥了有益作用，对后世的影响也是进步的，并不是误解的黑暗腐朽统治。司马炎结束了汉末以来的长期战乱和分裂，用习凿齿评价：除三国之大害，静汉末之交争，分裂割据混战对人民来说就是大害，是阻碍历史进步的，统一的历史功绩不论怎样都是巨大的。只有实现统一才有可能推动社会进

一步发展，才能开疆，让人民生活安宁幸福。司马炎统一后也实现了开疆，这也是对中国的历史贡献。司马炎统一也促进了中国对外交往，促进了中国科技、文化、教育的发展，晋朝有众多的发明创造和制度建设都是在中国首创的，其中包括：三省制、门下省、国子学、书博士、占田制等等。科技发明有瓷器、制图术、指南舟、楼船、凸镜聚光、脉经等等，这些成就都是在司马炎统一前后的成果，有的就是为统一战争服务的创造，只是在实现统一后，才增强了汉民族的团结，也巩固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增加汉族人口，改变了汉末中原人口锐减，汉族人口比例劣势的困局。司

司马炎统一用了十年时间，在几个大一统开疆的朝代中，也是最快的，秦朝从始皇帝即位到统一用了二十年；汉朝从汉高祖称帝到汉武帝恢复秦朝旧疆也用了九十年；唐朝从唐高祖称帝到唐太宗恢复西域也用了三十年；元朝从成吉思汗称可汗到统一也有七十年，能统一是对中国基本贡献，要是恢复前朝旧疆是对中国的突出贡献，能开疆算是杰出贡献，在这方面，晋朝也不次于其他朝代。司马炎在统一方面能重用众多贤臣，增强国力，能抓住机会用很小的代价和短暂的进攻实现统一，这是值得尊敬的，连唐太宗都称赞司马炎是庙堂神算，这样的统一对人民自然最有利，没有严重的负担。

司马炎统一后的中国才成为与西方罗马帝国并列的大国，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才有可能在对外交往中有更加广泛的外事活动和经济贸易，中国在晋朝才能实现天下无穷人的太康盛世。现代中国更应该重视晋朝对社会进步的贡献；实现了国家统一；增强了民族生存能力这些影响。

帝王术卓越的政治家路线

李渊(566—635)，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一说狄道(今甘肃临挑)，一说赵郡(治今河北赵县)，唐朝的建立者，史称唐高祖，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统帅。

李渊7岁时袭封唐国公，历任隋千牛备身，谯、陇、歧州刺史，荣阳、楼烦二郡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弘化留守兼知关右诸军事，有晓卫将军，太原留守等职。大业十三年(617年)，起兵反隋(参见李渊太原起兵)。成功地指挥了攻取霍邑(今山西霍州)之战和长安(今陕西西安)之战(参见霍邑之战、李渊攻取长安之战)。义宁二年(618年)五月

称帝，立国号唐，建元武德。先后派兵击灭割据陇西的薛仁杲(参见唐击灭薛举父子之战)、南犯河东的刘武周(参见唐灭刘武周之战)、据洛阳称帝的王世充和前来援救王世充的河北起义军首领窦建德(参见洛阳、虎牢之战)、据江陵(今属湖北)称梁帝的萧铣(参见唐平萧铣之战)、据河北反唐的刘黑闥(参见唐灭刘黑闥之战)和丹阳(今江苏南京)的辅公祐(参见唐灭辅公祐之战)等，从而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参见唐统一战争)。武德九年(626年)八月传位于太子李世民，为太上皇。卒于贞观九年，庙号高祖。

李渊是唐朝开国创业的军事统帅，沉谋多算、善于决断、既富远见、又善施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旧史书把大唐创业之功多归于李世民，将李渊描写成一位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从有关史料看，李渊的军事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因势借力、先取关中、后图天下的兴兵起事思想

李渊早就有起兵代隋以取天下的思想。

《大唐创业起居注》说他“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

李靖和刘文静也早就察觉他有“四方之志”（《旧唐书》卷六十七《李靖传》、卷五十七《刘文静传》），他自己也认为，他们家是“继膺符命”者。当隋炀帝要将其执送江都时，他曾单独对李世民说：“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今遭羗里之厄，尔昆季须会盟律之师。”（《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将自已比作周文王，要李世民等像周武王会盟诸侯伐殷一样推翻隋朝，夺取全国政权。他认为，刘武周等称帝是“陈涉狐鸣，为沛公驱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又将自已比作刘邦。为准备起事，他派李建成、李世民等“潜结英俊”、“密招豪友”；以防

御突服为名，招募士兵；用急而示之不急的策略廉价购买突胶的马匹。为隐蔽企图，他“纵酒纳赂以自晦”（《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等。这些都说明，他早有起兵之意，并极富政治和军事才能。晋阳起兵的决策也是他最后决定并付诸实施的。在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时机成熟之后，他以“通突厥”的罪名将反对起兵的副留守虎贲郎将王威、虎牙郎将高君雅斩首，从而正式起兵反隋。从酝酿到起兵，体现了李渊周密计划、积极准备、韬光养晦、乘机起事的思想。

李渊起兵的战略是：因势惜力，发展自己，先取关中，号令天下，进而统一全国。所谓

“因势”，就是因天下大乱之势；“借力”，是借突厥、李密等外部势力为己所用。当时突厥的力量相当强大，“中国人归之者甚众”；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是当时实力最强的起义军。另外割据朔方(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的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武威(今属甘肃)的李轨等，均对李渊构成直接威胁，比较之下，李渊的势力还比较孤弱，他要兴兵起事，必须取得某些外部势力的支援。为了将成为后顾之忧的突厥转化为可以借用的力量，他卑辞厚礼以结交之，甚至许诺：“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战所得子女玉帛可汗有之”；

给突厥可汗的信不署“书”，而署“启”，大有“心大能作小”之意。使始毕可汗转而积极主张李渊取隋而代之。他派刘文静去突厥时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当粟，聊欲借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六月）可知派刘文静去的任务名为借兵，实是联络突厥，防止其与刘武周联合南侵。对李密，他则“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得入关，据蒲津而屯水丰，阻崤函而临伊洛，东看群贼鹬蚌之势，吾然后为秦人之渔夫矣”（《大

唐创业起居注》卷中)。于是他写信称李密为“当今司牧”，希望他“早膺图篆，以宁兆庶”，讲到自己，则称“老夫年逾知命，愿不及此”（《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极尽谦恭吹捧之能事，使李密得意忘形，从而心甘情愿地为李渊充当“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的角色，李渊得以乘虚入关，夺取长安。入长安后，他推戴代王杨侑为帝，倡言“废昏立明”，扛着拥隋的旗号，欲行挟天子令诸侯之故事，达代隋之目的，将“弑逆”的罪名留给他人，而把自己竭力塑造成“应天顺人”的新主形象。这些，均体现他因势借力、以屈求伸、发展壮大自己、成就大业

的思想，较当时群雄过早地争相称帝高出一筹。

李渊在取得长安后，不但占据了地理上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更是得天独厚，他出身关陇集团贵族，在关中有很大影响，入长安后，可以取得当地人士的广泛支持；同时，占据京城，挟持隋帝，号令天下，有高屋建瓴之势，为统一天下建立了最为理想的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军政兼施、各个歼灭群雄、统一全国的战略指导思想

夺取长安是李渊统一全国战略的第一步；歼灭群雄、消除割据则是其第二步。第二步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和好突厥，经略西北，巩固根本；第二阶段是消灭关东、江南等群雄，统一全国。基本方略是各个击灭，先北后南。

李渊入据长安后，曾“以书谕诸郡县，于是东自商洛，南尽巴蜀，郡县长吏及盗贼渠帅，氏、羌酋长，争遣子弟入见请降”（《资治通鉴》卷一八五《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正月），用政治招抚手段达到了不战而胜、拓土徕民的目的。在此后征服群雄中，他也多采用军事进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手段，

如在派李世民征薛举父子之前，他用认亲和封官的手段相抚了李轨，从而对薛举形成战略牵制；后又派人深入李轨内部，得以不战而降其地。在平萧铣后，他命李靖为岭南道抚慰大使，招抚岭南 96 州等，都体现了军政并用以制胜的策略思想。

当时关东李密与宇文化及、王世充等杀得难解难分。因此，李渊对他们仍采取坐观虎斗、以敌制敌的策略，专力对付西北群雄。他采取各个歼灭、先急后缓的战略，派李世民先消灭对长安威胁较大的薛仁杲；在刘武周南犯时，又“悉发关中兵”，派李世民击灭之。在解除了这些后顾之忧后，才派李世

民东出攻打王世充，夺占洛阳。为平定萧铣，他于武德二年(619年)就派李靖入蜀协助赵郡王李孝恭做水战准备，因准备充分，用人得当，指挥得法，此役亦迅速告捷。而后又平定了刘黑闥和辅公祐，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很明显，李渊在战略上运筹周密，决策正确，用得其人，是取得这些作战胜利、从而统一全国的首要条件。

三、正确料敌、集智用长、先胜后战的作战指导思想

李渊在作战指导上善于正确料敌，在此基础上作出决策。如大业十二年(616年)，李渊

以不足 5000 人迎击占优势的突厥南侵之兵。他分析说：“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矢为爪牙，以甲育为长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苔夜巡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被知无利，自然不来……若不决战，难以图存。”可见他对突厥情况了解甚深。李渊采取这一对策后，突厥兵果然不敢来战。“如此再三，众心乃安，咸思奋击”，李渊乘机“纵兵击而大破之”（《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上）。他用“空城计”败突服兵，亦是建立在正确料

敌基础上作出的决策。霍邑之战，根据他对末老生的了解，采取了诱敌出城、断其退路、前后夹击的打法，取得了胜利。南下攻长安时，他派王长谐等从梁山渡河，营于河西以待大军。他对王长谐说：“屈突通精兵不少，相去五十余里，不敢来战，足明其众不为之用。然通畏罪，不敢不出。若自济河击卿等，则我进攻河东，必不能守；若全军守城，则卿等绝其河梁，前扼其喉，后柑其背，彼不走必为擒矣。”（《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八月）他根据屈突通“野战非其所长，婴城善为捍御”（《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中）的特点，采取了避攻坚城、野战

歼敌的方略。这些都体现了他正确料敌、因势定策的作战指导思想。

另外，李渊善于听取大家的意见，集众人之智为智，合众人之长为长，从而作出正确决策。如在南下攻霍邑途中，传来突厥联合刘武周进犯太原的消息，他召集众将商议对策，然后择善而从，决定继续南下。大军受阻河东（治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众将或言先克河东，然后西进；或言避开河东，直取长安。李渊吸取了两种意见的合理部分，留部分军队围河东，自引军西趋长安，亦是得策。汾阳人薛大鼎、河东县户曹任瑰提出早日渡河以取关中的建议，李渊都虚心听取。倾听

各种意见并择善而从，做到多谋善断，先胜后战，正是优秀的军事统帅所必备的素质。

四、因势定制、严明赏罚、用人所长的建军思想

李渊重视军队制度建设，其基本做法是因势定制，有沿有革。起事初期，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他建立大将军府，下设左、中、右三军，由三个儿子分别统领，形成了有力的统一指挥体制；为扩充兵源，实行募兵政策。武德二年(619年)，他提出，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必须“各因部校，序其统属”(《唐大诏令集》卷一〇七《备御》)，恢复府兵制，分

关中为 12 道，置 12 军。三年，12 军各立军号，分道治军，耕战结合。建立 12 卫和东宫 6 率，完善了中央军事体制和府兵的编制，沿用了隋朝的一些做法，又有所发展。在治军上，为适应兴兵起事的需要，他注重广施恩惠，不惜重赏；同时又强调严肃军纪，禁止侵暴百姓。积极争取起义军的支持，收编其队伍，以不断壮大自己的力量。对归顺者封以高官，如对关中起义军首领孙华；对抗逆者，在将其打败后，一般只诛敌首，对其余人采取赦“诖误者”和善待俘虏的政策。强调赏罚公平，不分贵贱。霍邑之战后论功行赏，有人主张应募之奴不能与良人同，李渊

坚持按功行赏，因而较大地调动了军队作战的积极性。在用将上，注重用其所长，如对李世民、李靖、李建成、李世勣等人的使用，都体现了这一思想，使他们在唐初几次重大作战中都较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

王夫之认为：“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未苏，故能折箠以御裒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唐高祖》）这一看法是比较中肯的。李渊作为开创唐朝大业的统

帅，提出并实行了许多高明的战略，其军事思想理应受到重视。

当领导不懂必备这几招帝王术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伟大的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集团管理的顶尖高手，他的一些成功经验值得学习和借鉴。

怎么树立理念？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轻徭薄赋、以民为本；广开言路、虚怀纳谏；重用人才、唯才是任；铁面无私、依法办事。

怎么以人为本？李世民说：“执政 23 年的经验告诉我，尊重人、依靠人、发展人、为了人。就是以人为本的主旨。”唐朝集团在李世民的精心管理下，不断发展经济，出现了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百姓安康的良好局面。

怎么团结一致？一个人一分钟可以挖一个洞，六十个人一秒种却挖不了一个洞。合作是一个问题，如何合作也是一个问题。合作就是互相配合做某事或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简单地说就是团结一致。

怎么三剂合一？坚强的领导集体必须具有凝聚力，当然，人格魅力也不可少。什么是三剂合一？即领头人要成为领导班子高效运转的“润滑剂”，齐心协力的“粘合剂”，创新发展的“催化剂”。

李世民十分重视吏治的清明，曾命房玄龄省并冗员，派李靖等 13 名黜陟大使巡察全国，考察风评；又亲自选派都督、刺史等地方官，

并将其功过写在宫内屏风上，作为升降奖惩的依据。另又规定五品以上的京官轮流值宿中书省，以便随时廷见，垂询民间疾苦和施政得失，百官遂自励廉能，直接提高政府效率。成吉思汗说：“欲安邦定国者，必悉唐宗兵法。”

怎么避免犯错？人无完人，金无赤金。人在冲动的时候，最容易犯错误。权力过大，说了算数，容易形成“家长制”、“一言堂”的短板。所以，必须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道理就在于此。

怎么提高修养？有一天，唐太宗得到一只雄健俊逸的鹞子，正玩得高兴，魏征来了。李世民怕魏征看到又要提意见，赶紧把鹞子藏到怀里。这一切早被魏征看到，他禀报公事时，故意喋喋不休，拖延时间。结果鹞子被憋死在李世民怀里。由此可见，李世民的气度胸怀。领导能否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对班子成员能否成为团结战斗的集体至关重要。

“耕夫碌碌，少有隔夜之粮；织女波波，少有御寒之衣。日食三餐，当识农夫之苦；身穿一缕，每念织女之劳。寸丝千命，匙饭百鞭；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交有德之朋，绝无益之友。常怀克己之心，闭却是非之口。若能依朕

所言，富贵功名可久。”李世民这则近百字的短文，提醒为官者不忘劳动本色，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同时做到慎言、慎友、克己、清廉。这段话从表面上来看，是李世民教导领导班子如何才能保持功名富贵？但仔细推敲，实质上是告诫为官者修身克己的做人之道。

怎么居安思危？李世民知道，居安思危是预控性的关键。他把隋朝灭亡的教训当教科书，避免重蹈覆辙。关心百姓的疾苦，组织人员走南闯北进行调研，掌握第一手资料，进行科学决策。他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其目的就是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

子。李世民认为，只有把危险消灭在萌芽中，才能实现国泰民安的大好局面。

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剑桥中国隋唐史》：“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

怎么解决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李世民通过不断探索实践，制定了行之有效的集团规矩和规划，依据标准，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发现偏差，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诊断病因，对症下药。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解决了，那就不成问题了。

在李世民时代，唐朝集团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前列。由于唐太宗在位时年号为贞观，所以，人们把他管理的这一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司马光称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盖三代以还，中国之盛未之有也。

和谐统一之权——内外有别，恩威并重

作为唐朝的第二任皇帝，唐太宗在“权”的方面，主要面临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得到皇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二是开拓疆土，成为全天下的君主。对于内部的争权者，杀之，无话可说；对于外部的争权者，盟之，不服则打。但在整个用“权”的过程中，均采用了恩威并重的方法。

•玄武门之变

众所周知，历朝历代皇位斗争都是最激烈、最残酷的，特别是在嫡长子或者皇太子实力不济之时。唐太宗李世民排行第二，恰好也有这么一个大哥，是其皇位的最强竞争者。而其父亲唐高祖李渊呢，又是一个特别保守的人，一直认为嫡长子应该继承自己的位置。

李世民是个很有心计的人，他知道嫡长子的位置是没法争了，但可以另辟蹊径，从能力、业绩、威望等方面全面超越。于是，李世民私下里学习刻苦，注意自身修为，而且还广交朋友，培植自己的势力。另外，他牢牢掌握了军权，善待手下将领和士兵，对老百姓也很好，在军队和百姓中有很高的威望。特别是在唐朝

定国后，为稳定局势而进行的六次大规模的征讨活动中，李世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把六次战争的胜利比作足球场上的六个进球，那么，李世民一个人就完成了四个进球，另外还助攻两次。最重要的是，他在最关键的决赛（唐军 VS 王世充加窦建德联军）当中，打入了制胜一球。在这一仗之后，李世民的威望和势力达到了极致。据说，他回到长安时，受到军民以及皇帝的礼仪招待。

这种情况，让大哥李建成很是担心。当然，李建成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这些年更注重把持朝政，而且和一些权臣搞好关系。另外，他给四弟李元吉很多许诺，二人关系很好。关键时

刻，确保这个弟弟站在自己这边。基本上，宫里宫外都是李建成的人。之前，李建成考虑到李世民在领军打仗方面的作用，一直隐忍其实力的发展。但现如今，天下基本太平，该解决内部矛盾了。于是，他向老爸李渊建议由四弟李元吉做统帅出征突厥，借此要夺取李世民的军权。

李世民虽然连年在外打仗，但并不是对朝内情况一无所知。其实，他早在李建成周围安排了很多“卧底”，对李建成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他没有沉迷于当时的成绩，更觉得有必要解决自己权力路上的障碍。当了解到李建成的最新动态后，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但到底如

何处置这个皇太子呢？李世民手下将士们都很顾虑，这毕竟是“老板”的亲大哥啊！李世民这时表了态：“有什么计策，你们尽管说，由我来决定是否执行。”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将皇太子及主要同党囚禁起来，不让他们再干预政事。李世民当即反对：“李建成已经鬼迷心窍，囚禁起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众将士都明白了“老板”的意思，提出迫使李建成等进宫，但在途中进行截杀的办法。李世民这才同意，但由谁去负责做这个事情，他都不是很放心。于是，他决定由自己亲自来完成这一任务，并带上了对自己最为忠心耿耿的尉迟恭。

事情的进展依计进行。而李世民最担心的一幕也确实出现了。公元 626 年 7 月 2 日晚，玄武门前，大哥李建成和四弟李元吉在逃跑时，手下将士都不敢下手，包括这个尉迟恭。“不能让大哥跑掉，否则这么多年的苦心经营就全部白费了”，李世民射出了致命的一箭，正中李建成要害，当场毙命。而尉迟恭也立即解冻，射死了李元吉。

唐高祖李渊知道此事后，震怒！但也没有任何办法，眼下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了，而且兵权还在其手里。因此，不得不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两个月后，自责和无奈中的李渊，将皇位让给了次子李世民。

点评：李世民亲手弑兄之举，常被后人诟病。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李世民对权力的向往。夺权路上，无论谁来阻挡，都将被除去。但李世民并没有大面积捕杀”，反而重用了很多能臣，最有名的就是魏徵。

•收服突厥

虽然内部已经没有对手，但外部仍不太平。刚即位不久，突厥首领颉利可汗听说唐朝政局发生动荡，认为有机可乘。亲率大军一路南下，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来到了与长安城隔河对峙的渭水北岸。而此时呢，长安城内并没有多少兵力，大队人马哪儿去了呢？原来，李世民

是想在半路拦截突厥部队。但颉利可汗并没有和唐军硬碰硬，而是加快行军速度，绕过防线，直扑长安城。

正在整个朝野上下惊慌失措时，李世民异常冷静，一方面调其他部队来支援，另一方面让去拦截的部队赶紧回援。自己则要亲自出城去会会颉利可汗，为援军多赢得一些时间。众大臣纷纷相劝：“这可使不得，这样太危险。”李世民很冷静地说：“我们大唐给突厥供奉已经快十年了，但突厥仍不满足，迟早我要和他们开战，但不是今天。今天，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我们不怕他们。”说完，找了五个和突厥人比较熟悉的大臣出城，直奔突厥大军。

颉利可汗看到李世民就带了这么几个人来，很奇怪，心里犯嘀咕：“都说这小子能打仗，没想到这么狂，莫非有什么陷阱，先看看无妨。”没想到，李世民一个人径直来到桥上，大呼其名。突厥将士的目光齐刷刷转向了“大汗”：“老板，叫你呢。”颉利可汗犹豫了一下：“直接射死这小子，传出去了不好听。过去看看吧，不能装，要不这以后怎么在弟兄们面前混啊。”为示威严，颉利可汗也打马直接上桥，没有显示出丝毫停顿。突厥将士均暗自赞叹：“老板真给力啊！”

帝王术连环除对手

武则天的父亲武世曩，原本是一个木材商人，因参加了李渊反隋的起义，唐王朝建立后曾官至工部尚书。武则天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从小就受到比较好的教育。但她9岁时，父亲就过早地去世了。武则天容颜姣美，天生丽质，举手投足，楚楚动人。其性格刚厉，好猜忌，有权略，聪慧过人。14岁时，唐太宗召她入宫，封为才人，赐号武媚，人称媚娘。帝王的后宫等级森严，皇后之下，有四妃、九嫔，然后才是才人。皇宫中有不少才人，终其一生，皇帝都没有召见过，老死宫中，无人过问。武则天的性格和禀赋，决定了她不可能甘居才人

的卑下地位而无所作为。她进宫以后，不仅为唐太宗所赏识，而且与太子李治暗通情愫，深得李治的喜爱。公元 649 年，唐太宗驾崩，武媚娘与一些宫女一道依旧制被送到感业寺，削发做了尼姑，时年 26 岁。

即位的唐高宗也深深怀念武媚娘，一天他驾临感业寺进香，与武则天相会，牵动旧情，于是让她重蓄乌发，入宫侍寝。这时的媚娘已在感业寺中度过了五年孤灯清影的生活，这一经历肯定对武则天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重返后宫的武则天把权术和地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从此，她便凭借着自己的才智，开始了争

夺最高统治权力和地位的艰难历程。她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打倒萧淑妃。当时萧淑妃深得高宗宠爱，而王皇后则倍感凄凉。萧淑妃生了儿子以后，母以子贵，更加得意忘形。备受冷落的王皇后想利用初进宫的武则天牵制萧淑妃，这正好为武则天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一方面，她使出浑身解数，利用女人特有的魅力，充分满足高宗的欲望，使高宗一刻也离不开她；另一方面，她又极力讨好王皇后，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骗取王皇后的信任，王皇后多次在高宗面前称赞武则天。不久，唐高宗册封武则天为昭仪。武则天与王皇后联合起来，百般诋毁萧淑妃，唐高宗贪于新欢，很快就对萧

淑妃厌倦了，萧淑妃最终被废为庶人。

武则天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打倒王皇后，自己当皇后。因此萧淑妃被废以后，她立即又把矛头对准了王皇后。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武则天充分展现了她的权谋和刚厉阴毒的性格。她与王皇后不接近的后宫之人倾心交结，广施恩惠，使她们与自己一道共同反对王皇后；同时，通过她们及时了解高宗和王皇后的动静，掌握宫中动态。在做了充分准备以后，她就开始向王皇后发动进攻。首先，她向高宗诬告王皇后同母亲一道在宫中搞魇胜之术，使高宗对王皇后产生厌恨之心。萧淑妃被废，王皇后还

自鸣得意，以为武则天是自己的贴心人。但她很快就发现，武则天是一个比萧淑妃更加厉害的新对手。武则天日益受到高宗的专宠，不久便身怀六甲。王皇后最大的心病就是没有身孕。皇后之子即为太子，母以子贵，皇后的地位才能稳固。面对武昭仪的威胁，王皇后与舅父中书令柳奭商议，决定劝高宗立地位低贱的刘氏之子燕王李忠为太子，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同时也杀一杀武昭仪的锐气。

\

武则天有了身孕后，更得高宗宠爱。她得知燕王李忠立为太子的阴谋后，决定采取非常步骤，促使高宗废后。为了达到废后的目的，武

则天不惜采用残忍的手段，活活掐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然后嫁祸于王皇后。王皇后有口难辩，含冤失宠。唐高宗决定废黜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但是围绕着废后和立后的问题，朝廷内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武后生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三子李显，四子李旦。李弘为太子，高宗打算传帝位给他。武则天并不是一个按传统办事的女人，她虽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但还想拥有与实际权力一致的名位，也就是说她还想称帝，当一个女皇帝。为达到这一目的，她用药酒毒死了李弘。李弘死后，高宗又立李贤为太子，并令他监国。李贤容貌端正，富于文才，更为武后嫉恨，不久，

她又找借口废李贤为平民，将他流放到四川巴中地区。后来听说李贤不满，又令人逼其自尽。李贤被废后，高宗又立李显为太子，立李显的儿子李重照为皇太孙。

公元 683 年，高宗去世，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尊武后为皇太后，朝中政事仍由太后裁决。中宗不甘受制于太后，打算以韦玄贞为侍中，宰相裴炎认为不可。中宗大怒，说：“朕就是把天下交与韦玄贞又有何不可，何况侍中！”裴炎密告太后，于是武则天召集百官于乾元殿，勒兵入宫，废中宗为庐陵王。其子重照也被武后杖杀。就这样，武则天的四个儿子，三个被

她除掉了。俗话说“虎毒不食子”，可是武则天为了当皇帝，却不惜一再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可见其决心是何等的坚决，其手段又是何等的残忍！

武后生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三子李显，四子李旦。李弘为太子，高宗打算传帝位给他。武则天并不是一个按传统办事的女人，她虽掌握了国家的最高权力，但还想拥有与实际权力一致的名位，也就是说她还想称帝，当一个女皇帝。为达到这一目的，她用药酒毒死了李弘。李弘死后，高宗又立李贤为太子，并令他监国。李贤容貌端正，富于文才，

更为武后嫉恨，不久，她又找借口废李贤为平民，将他流放到四川巴中地区。后来听说李贤不满，又令人逼其自尽。李贤被废后，高宗又立李显为太子，立李显的儿子李重照为皇太孙。

帝王术与当今管理驭人兼用

管理是什么，个人认为，一个是管一个是理，管是什么，当然是管人，那理呢，理事，也就

是经营。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怎么有能力的人也不可能凭一个人的力量做成所有事，所以就要靠其他人，靠朋友，靠下属，甚至靠上级靠领导，古代的高祖刘邦，水浒里的宋江，他们都没什么大本事，武功不行，打仗不行，文化不行，可他们都成了霸主，就是因为他们会利用人，也就是驭人术，驭人术包含了管理学，心理学，人际学，厚黑学等，是一门涉及很广的学问。

首先我觉得不管是管理还是驭人，目的只有一个，就只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怕用完就丢掉。要知人善用。

人得类型

我觉得人大概分为几类，你身边的所有人都能从这里找到，现在介绍他们的特点与怎样驾驭。

高傲型：

高傲大家都明白，这种人往往都有一定的能力，他们高傲自然是有高傲的资本，对付这种人有两种方法，一是分化型，所谓分化就是分化他的能力，例如他的业务很好，但是人很高傲，那怎么办，就是分化他高傲的资本，怎么分化呢？可以再培养一个人或是自己提高业

务水平来和他抗衡，这样就让他知道，不光是他一个人有能力，所以不要太傲。

另一种方法就是让他失败一次，而且要很重要的失败，让他刻骨铭心。当年诸葛亮就是用这种方法收复的关羽，关羽够傲吧，相信在也找不出比关二哥更傲的人了，可孔明是怎么收复二爷的呢，他让二爷去守华容道，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让曹**，当时刘备的力量并未成型，全部兵马两万，将不过关 张 赵三员，如果曹操一死，东吴很可能反咬一口把刘备吃了，然后和魏国二分天下。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出现，所以曹操不能死，看遍刘备阵营，只有关

羽有可能放曹操一马，因为曹操曾对关羽有恩。所以让关羽去守华容道，而这就恰恰的体现出了诸葛亮的管理能力，反正曹操是要放的，那么放也不能白放，关羽你不是不听我的吗，你不是傲吗，我让你签军令状，先将你一军，然后在让你去放曹操，果然，关羽放了曹操，回来后诸葛亮就以军令状为由要砍了关羽，其实他知道自己砍不了关羽，有人家大哥刘备在呢怎么可能，而且关羽一死刘备可就没有大将了，所以他就买了关羽一个人情，没有杀他，而关羽由于自己的失败，再也不敢不听诸葛亮的了，所以诸葛亮的目的达到了，收复了关羽。试想一下，那么高傲的一个人，之前

信誓旦旦的保证，结果却没办成，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自然会收敛很多。

暴躁型：

脾气急，不听劝告，动不动就大嗓门使劲喊，实在是让人讨厌。这种人我一般用激将法，告诉他这件事他办不了，他肯定急，我怎么就办不了，因为这件事需要一个冷静镇定的人才能办，你要暴躁了，所以你不行，当然了，这件事还是要他去办的，他为了自己面子也好，为了体现自己的能力也好，自然会让自己尽量去办成这件事，然后让他看到镇定和冷静的好处，慢慢的改变他的脾气。

自卑型：

这种人比较好对付，就是给他自信，安排去做一些事情，然后暗地里帮帮他，一点一点他就知道自己也是有能力的，自信慢慢也就有了

老实型：

最喜欢这种人，好管理，肯干活。我觉得这种人不需要改变，但是要留住他，我对这种人一般是小恩小惠，多夸夸他，给他一个稳定的工作环境。

小孩型：

这种人也挺烦人的，尤其是刚出社会的年轻人，还是小孩子思想，对他说道理他们不理解。对于这种我是尽量与他们交朋友，我曾在一个饭店做管理，店里的服务员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外地小孩，他们不服管，我就经常带他们一起出去喝酒吃饭，与一个人拉近的最好方法就是一起吃顿饭，不信你试试，经常把他们聚在一起，慢慢的他们就形成了一个集体，有一种归宿感，他们就不在和我作对了，但是出现了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他们都听我的而不听经理和老板的话，弄的好像是我指使他们似的。好在老板是个精明人，他知道只要管好我就能管好下面的人，老板的驭人术比我精湛....汗

~~!

利益性：

这种人最好对付了，只要给他一定的个人好处就能管住他，做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好处要讲给他听，例如可以给老板好印象，或者奖金会多一点，只要他有利益，他就会去做。

总结：防失联V：357607890其实所谓的驭人术都是表面的东西，只

要你有仁有义，真心对待所有人，他们自然会真心对待你，其实很多人都是只要你不差我事，我就不差你事。

哪些帝王术可以逆袭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中，刘邦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他出身微贱，不喜欢读书，开始“创业”时年岁也偏大，与他的劲敌、对手和其他天下豪杰相比，实在没有太多的优势，甚至还有很多缺点，如 好酒及色、慢而侮人 、不修文学等，但他最终却战胜群雄，荡平天下，南面称尊，书写了中国历史上“屌丝逆袭”的绝美传奇。刘邦的成功“逆袭”，可从他过人的用人智慧上窥见端倪。

把最优秀的人才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汉五年（公元前 202 年）二月初三，55 岁的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拉开大汉四百年基业的大幕。这年五月，刘邦在洛阳的南宫开庆功宴，宴席上，他和众人总结楚汉战争胜败的经验教训。王陵等人说，刘邦之所以能战胜项羽，就是因为刘邦能与大家同甘苦，共患难，而项羽却自私自利。刘邦说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说”，没有说到点子上。他总结了自己取胜的原因：

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

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
此吾所以取天下也。（《汉书•高帝纪》）

刘邦的总结是深刻的，见识是高明的。战争的
胜败，人的因素总是最重要的。老子说：“知
人者智，自知者明。”刘邦不仅“自知”，而且“知
人”。

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知人善任。张良、萧何、
韩信，都堪称人中龙凤，每一个人都各有所长，
且其特殊才能都远在刘邦之上，刘邦均将他们
罗致麾下，而且不嫉贤妒能，不弹压掣肘，能
用其所长，把每一个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为每个人淋漓发挥自己所长创造了条件。张良定国策谋大计，萧何理国事抓经济，韩信统大军略城地，三人均有出色表现。试想，如果让张良理国事抓经济，让萧何统兵冲锋陷阵，让韩信定国策谋大计，那结果就只能令人扼腕叹息了。

刘邦不仅善用人，而且善驭人。韩信出身贫穷，为人所不齿，后来参加了项梁的起义军，但一直不为项梁、项羽叔侄所重用，韩信因此背楚投奔了汉军。经过汉将夏侯婴的推荐，刘邦任命韩信为治粟都尉。萧何通过几次谈话看中了韩信，认为应当重用。汉元年（公元前 206

年)六月,韩信认为自己在刘邦麾下还没有得到完全施展才能的机会,觉得屈才,于是又从汉营逃亡。萧何知道了这件事,觉得这是个大疏忽,所以来不及与刘邦商量,就亲自去追赶韩信。这时有人在刘邦面前说丞相萧何逃跑了。刘邦听了又急又气,如同失掉了左右手。等萧何回来时,刘邦又喜又恼,责备他不该逃跑。萧何告诉他是为了追赶韩信,刘邦不太相信,认为追赶这么一员小官吏不值得。萧何对刘邦语重心长地说:“一般的将官容易得到,韩信却是不可多得的国家至宝,挑不出第二个。如果想争夺天下,就必须有韩信这样的人才共谋大计。”刘邦听取了萧何的意见,拜韩

信为大将，让他统率三军。而且在任命韩信为大将那一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设置了高坛、广场，让韩信到高台上受命，给了韩信足够的尊崇和面子，树立了韩信在众人面前的威信和号召力。拜礼完毕后，刘邦把韩信召到跟前咨询平定天下方针，韩信的答覆，同样语出惊人，这就是几乎与诸葛亮的《隆中对》齐名的《汉中对》（详见《史记·淮阴侯列传》）。只可惜，刘邦身边的能人太多，而后来的韩信也居功骄恣，加之品德名声不好，才不为后人称道，否则的话，他一定会和诸葛亮一样齐名。刘邦听完后大喜过望，发现他的确找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韩信想要一个“桃子”，刘邦给了他“一篮水果”

韩信军事才华出类拔萃，很快成为刘（邦）、项（羽）争雄中影响战局胜败的关键性人物。汉四年（公元前 203 年），刘、项鏖战正酣。十一月，刘邦被楚军围困在荥阳（今河南荥阳），难以脱身。而韩信大军却凯歌高奏，大破楚军，斩杀楚大将龙且，占领齐地，锐不可挡。此时韩信不仅没有加急进攻楚军，解刘邦之围，而是派人给刘邦送信，请刘邦封自己为齐王。尽管韩信骄恣之态毕显，但信的措辞用语还是比较委婉，信中说：“齐伪诈多变，反

复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愿为假王使。”“假王”就是代理诸侯王的意思。热盼韩信解围的刘邦看到韩信的这封信时，勃然大怒，大骂韩信：“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在张良、陈平劝说下，刘邦压住了胸中的怒火，不但满足了韩信想当代理齐王的愿望，而且更为慷慨大度，说：“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派遣张良为使者赶赴韩信驻地传达旨意，不用当代理，一步到位，直接封韩信为齐王。

韩信挟功请封假王，虽然极不合理，刘邦虽然心里极为不爽、愤懑不已，但是，洞悉时局的他却能随机应变，作出最正确的选择，直接封了韩信为真王。韩信本来想要一个“桃子”，刘邦却给了他“一篮水果”，这显示了刘邦高超的驭人之术。可以想象，获封齐王后的韩信，心情之激动、脚步之轻盈，怀着对刘邦的感恩心情，加快了攻楚的步伐，与彭越等人分进合击，很快改变了楚强汉弱的战场局势，导演了兵陈垓下十面埋伏的历史活剧。假若，刘邦当时未满足韩信的请封，势必与韩信生隙，埋下取败祸因；假若刘邦比较小气，虽满足了韩信心愿，仅封了个“假王”（代理），也会让韩信感觉出

刘邦的勉强之情和心胸狭窄，也就不会换来韩信满腔的“忠汉”之心。

韩信后来军功累累，居功自傲，成为刘邦的心腹大患，后被刘邦用计擒拿后囚在洛阳，降为淮阴侯。有一天，刘邦与韩信评论起将领们各自的才能高下。这是一场坦诚相待、十分有趣的谈话。刘邦问韩信：“依将军看，如果我带兵杀敌的话，大概能带多少兵啊？”韩信回答说：“陛下最多能带十万，不能再多了，再多了就要出问题。”“那么你最多能带多少兵呢？”刘邦问。“让我带兵嘛，多多益善。”韩信回答说。其言外之意，是说自己统兵百万，也实属

平常，不足为怪。刘邦笑着又问：“好一个多多益善，那怎么会被我所擒呢？”韩信回答说：“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这就是韩信为什么会被陛下所擒的原因。”韩信的总结是深刻的，见识也是高明的，只不过有点为时已晚。

通过封赏大臣传递政治信号

楚汉战争胜利后，封赏大臣是摆在刘邦面前一项复杂而重大的政治任务，处理不好，就会产生矛盾。《汉书·萧何传》记载，汉五年，刘邦“即皇帝位，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不决”。刘邦认为，应当将萧何推为第一。然而

其他曾追随刘邦东征西讨的大将们不服，认为自己“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浴血奋战，而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怎能反而功劳居首呢？

这时，刘邦说出了一番惊人的话。他反问诸将：“知道打猎是怎么回事吗？知道猎人和猎狗的区别吗？”他说：“夫猎，追杀兽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走得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意思为，猎狗只有追擒野兽的功能，而猎人却能指挥猎狗去追猎物。诸将只不过是擒杀野兽的猎狗，只有萧何，才能称得上是猎人。

这话说的太伤众将官的心了。众将官心内不服，但谁也不说话，选择了沉默。后来，在论定功臣的位次时，场面又陷入了尴尬。众列侯一致认为，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理应排第一。刘邦显然是想让萧何位列群臣之首。正在为难之时，洞明上意的关内侯鄂千秋站出来说话了，他说：诸将皆为一时之得失。而楚汉相拒五年，汉王失军亡众，只身逃遁数次，皆靠着萧何从关中遣军补其亡失，数万兵众召之即来。汉与楚在荥阳对峙多年，军无见粮，也是萧何及时转漕关中，以给不足。这样才能使汉军立于不败之地，这

是万世不朽之功。这一公平的评论，终于说服了诸将，大家都公推萧何功劳位居第一。

刘邦公然驳了众将官的面子，力排众议，推封萧何为天下第一功臣，这样做的“成本”似乎太大。而这也恰恰反映出刘邦的过人之处，他是要通过尊崇萧何来向天下释放一个个信号：天下初定，今后国家的头等大事将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军事虽亦重要，但与民生问题比较起来，显然要往后放一下。今后，国家急需的是重生产、懂经济的人才，而不是冲锋陷阵、搏杀疆场的将士。可以认为，刘邦封萧何是传

递其战略重心由“军事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显著性标志。

史书记载，刘邦封赏诸大臣是分阶段进行的。最先封赏的是最亲近、最重要的二十几位大臣。其余的大臣因对军功多寡的认定有异议，“日夜争功而不决，未得行封”。有一次，刘邦在洛阳南宫时，看见众将坐在沙地上不知在说什么，问身边的张良是怎么回事，张良说他们在谋反。刘邦问为什么，张良说怕刘邦以后不会封他们高官，怕刘邦会找机会诛杀他们。刘邦问计于张良。张良问刘邦最恨的人是谁，刘邦说是雍齿，因为他虽然功劳多，但太张狂，

“多次折辱我，令我难堪，我曾经想将他杀掉”。

张良听后，就建议刘邦封雍齿为侯，这样，大家就觉得被刘邦记恨的雍齿都能受封，其他人更不用说了，封官加爵是迟早的事，就不会乱着急了。于是，刘邦大摆庆功宴，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催促丞相和御史抓紧时间草拟论功行赏分封的名单。刘邦封雍齿这一举措，看似平淡，却富有深意，他向大臣传递出一个信号，所有对建汉有功者都会按照功劳大小受到封赏，刘邦不会给大家穿小鞋，也不会暗地里使绊子。

季布和丁公都是项羽手下的大将。在刘邦和项羽争天下时，季布领兵几次将刘邦打败，丁公也领兵追击过刘邦，但最后放过了他。刘邦做了皇帝后，记恨季布打败过自己，曾悬赏千金、缉拿季布，后来终于如愿以偿。但他想到自己也需要季布这样的忠臣来辅佐，就不再记仇，不但放了他，还封他为郎中。丁公听说了，就觉得连季布这样给过刘邦难堪的人都能释放做官，他这个曾偷偷放走刘邦的救命恩人就更不用说了。于是前去拜见刘邦，没想到却被刘邦抓了起来。刘邦对众人说：“丁公做项羽的将领时不忠，就是他这种人使项王丧失了天下。”刘邦下令处死了丁公，还在军中示众，

警示大家要做忠臣，不要学丁公。刘邦杀丁公封季布传递出的信号是，朝廷需要的永远是衷心耿耿的臣子，而不是左右逢源的贰臣。

帝王术“强干弱枝”下的打压手段

担任过的职务，从此不再设置。由石守信接替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起初太祖以石守信等人都是自己的故友，并不介意，赵普就向他数次进言说：“臣也不担心他们会背叛陛下，但是如果他们的部下贪图富贵，万一有作孽之人拥戴他们，他们能够自主吗”？这些话实际上是提醒宋太祖，要他记住陈桥兵变的事件，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果然宋太祖采取措施要解除禁军高级将领的兵权。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日晚朝时，宋太祖把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留下来喝酒，当酒

兴正浓的时候，宋太祖突然屏退侍从叹了一口气，给他们讲了一番自己的苦衷，说：“我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是到不了这个地位的，为此我从内心念及你们的功德。但做皇帝也太艰难了，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个夜晚都不敢安枕而卧啊！”石守信等人惊骇地忙问其故，宋太祖继续说“这不难知道，我这个皇帝位谁不想要呢”？石守信等人听了知道这话中有话，连忙叩头说：“陛下何出此言，现在天命已定，谁还敢有异心呢”？宋太祖说：“不然，你们虽然无异心，然而你们部下想要富贵，一旦把黄袍加在你的身上，你即使不想当皇帝，到时也身不由己了。”一席话，软中带硬，使

这些将领知道已经受到猜疑，弄不好还会引来杀身之祸，一时都惊恐地哭了起来，恳请宋太祖给他们指明一条“可生之途”。宋太祖缓缓说道：“人生在世，像白驹过隙那样短促，所以要得到富贵的人，不过是想多聚金钱，多多娱乐，使子孙后代免于贫乏而已。你们不如释去兵权，到地方去，多置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的产业。同时多买些歌儿舞女，日夜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同你们再结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石守信等人见宋太祖已把话讲得很明白，再无回旋余地，当时宋太祖已牢牢控制着中央禁军，几个将领别无他法，只得俯首听命，

表示感谢太祖恩德。第二天，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上表声称自己有病，纷纷要求解除兵权，宋太祖欣然同意，让他们罢去禁军职务，到地方任节度使，并废除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在解除石守信等宿将的兵权后，太祖另选一些资历浅，个人威望不高，容易控制的人担任禁军将领。禁军领兵权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这就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以后宋太祖还兑现了与禁军高级将领联姻的诺言，把守寡的妹妹嫁给高怀德，后来又把女儿嫁给

石守信和王审琦的儿子。张令铎的女儿则嫁给太祖三弟赵光美。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在军事制度方面的改革主要有三项。

第一，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

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第二，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

第三，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

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就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

对地方藩镇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项：

第一，削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

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第二，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留少量应付日常经费外，其余的钱帛都要送到京城上交中央政府，不得占留，这样地方的财权就完全收归中央

了。

第三，收其精兵。乾德三年（965年）八月，宋太祖下令各州长官把藩镇所辖军队中骁勇的人，都选送到京城补入禁军。又选强壮的士卒定为“兵样”送到各路。召募符合“兵样”标准的人加以训练，然后送到京城当禁军。这样中央禁军集中了全国精兵，而地方军队只剩下一些老弱病残，编成厢军，只供杂役，地方再也没有军事力量可以同中央抗衡了。

通过这些措施，唐末五代的那种专制一方的藩镇，在宋初就逐渐消失了。

在官僚制度方面，侧重削弱宰相权力。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手，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的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此外，宋初还在设官分职、科举制度等方面，也进行了有利于加强皇权的政策。

赵匡胤的“强干弱枝”、“重文轻武”政策，虽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权力，大大加强了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使宋朝国祚延长。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官”、“冗兵”和“冗费”与日俱增，造成了两宋的积贫积弱，使财政拮据、外患深重。终两宋之世，这种局面一直没有大改变。

帝王权力控制与发展

中国古代政治自秦汉而至清朝，其发展演变的一大趋势就是，皇帝越来越集权专制，一方面是中央收地方之权，把权力都集中到中央政府，另一方面是皇帝收中央政府之权，把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上，最终就是全国的军政权力都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上。

中央集地方之权

在地方政府上，首先是战国及其之前的分封制，把地方土地包括治理权力，分给诸侯功臣。这种分封的封国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治性，

甚至都有自己的征税和征兵权，在这种情况下中央肯定是无法集权专制的，此时的地方权力处于顶峰，而后的朝代，地方上的权力不断的被中央政府削弱。

分封制之后就是郡县制。郡县制虽创立于秦朝，但却是在汉代开始得到确立和巩固的。郡县制实行之后，取消了封国这种国中之国，全国划分郡县两级行政单位，全部受中央政府的管理。地方上也没有了征税权和征兵权。但是汉代的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还是很大的，地位也很高。汉代郡的行政长官叫太守，其地位与中央政府的九卿平等，都是二千石俸禄的官，

因此郡太守可以调到中央任九卿，再进一级就可以位列三公了，而九卿也可调到地方上做太守，而且地方的郡太守和县令长可以自行任用自己的部署，不受中央的支配。因此，当时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还算比较平等。汉代的地方政府组织也被公认为是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因为它既能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又能保持地方的自主性，集中而不失灵活。

而后到了唐代，地方的行政划分虽然也是两级，分为县和州，但县却分上中下三等，州也分上中下三等，州县的等级是按照所管辖的户口多少来划分的，管辖的户口越多，等级就越

高，地方官员的等级与中央政府官员的等级开始拉开了距离，地方官员要经过县的下中上、州的下中上六级的升迁才有可能到中央任官，而且到唐代也已经把地方行政长官的部署任用权都集中到中央的吏部，全国的官员都要由中央吏部来任免。此外，唐代在地方上还设有监察使和节度使。监察使原本只是中央派到地方监察政绩和民情的，这在汉代叫刺史，只是一个很小的官。而到了唐代，监察使却逐渐演变成了地方行政单位的最高一级，把原来的州县压在了下面，一下子使地方行政单位由二级变为三级。节度使则是派到边疆的监察使，它可以全权处理边疆的事物，最后节度使形成了

“藩镇”，应发“安史之乱”。

到了元明清朝代，地方上就有了省一级的行政单位。省最初出现于唐代，唐代废宰相，设三省来执行宰相的职能，分别是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这三省都是中央政府部门。到元朝，由于蒙古人对汉人的极端歧视和不信任，不敢给地方政府分权，要把地方的权力全部集中到中央，于是就由中央的中书省分出一个机关驻扎在地方，总领地方政务，这就像西方列强派总督到殖民地管理殖民地的一切事物一样，这一分出去的中书省就叫行中书省。因此元代的地方政权不再地方，而被集中到中央，由中央

派出的行中书省掌握。到了明朝，它也怕地方造反，就延续了元朝的行省制度，只是因为明朝把宰相废了，中央三省也没有了，所以在地方上就不叫行中书省，而叫承宣布政使司，行省长官也就改为承宣布政使，但实际上它的本质还是和行省一样的，就是把地方政权集中到中央。到了清朝，就继承了明朝的承宣布政使，但满人对汉人更不放心，于是又在地方上常设了巡抚和总督。

这样从分封到郡县，到监察使（节度使）州县，到行省制度的设立，再到巡抚和总督的设立，地方的行政层级越来越多，权力越来越小，最

后都被集中到了重要政府。

皇帝集中央之权

皇帝集中央之权，主要体现在皇帝与宰相之间的权力变化，就是宰相的权力逐步削减，直至消亡，而削减的宰相权力则都集中到皇帝手上了。

在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相丞相职，当时的丞相权力相当大，可以开府治国，总领政务，除了军事上的事，其他的丞相几乎可以说了算，君主最终就是表个态，同意还是不同意。因此，

战国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强力变法大臣，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思想去变革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因此当时丞相与君主的关系，颇有点像现在君主立宪制国家里首相和元首的关系。正是因为当时的丞相比较独立，权力很大，所以当时的吕不韦才能被封为“仲父”，这要放以后的朝代，那是绝对的大逆不道，除非你表明了要造反，否则谁也不敢称皇帝的“父”。

在汉代，宰相的权力依然很大。当时皇帝和宰相各有一个“秘书处”，有各自的财政来源和财政大臣。皇帝的“秘书处”是六尚（尚是掌

管的意思)：尚衣、尚食、尚冠、尚席、尚浴和尚书，前五尚是管皇帝的饮食起居的，尚书就相当于皇帝的文员。而宰相的“秘书处”就很大了，有十三曹，负责政府的一切事务。政府的财政来源是田税，皇帝的资金来源是山矿盐商，当时田税是大宗，山矿盐商的收入只占一小部分。掌管政府财政的是大司农，而掌管皇帝财政的是少府，皇帝不能用大司农的钱。大司农和少府都是九卿之一，也都归宰相管。也就是说政府皇帝的财政都要归宰相管。而实际上，皇帝的所有事物都由宰相管，因为当时皇室的所有事物都归御史中丞管，而御史中丞也是归宰相管的。

而到了唐代，就没有宰相了，宰相一分为三，变成了“委员会制”，宰相的职务分给了三省，即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拟定政府的一切命令，包括皇帝的最高命令——“敕”；门下省负责复核审查命令；尚书省则负责执行。凡属皇帝的命令都需要在政事堂会议中正式通过，在敕字下加盖“中书门下之印”，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被认为违法的。当然唐代也有皇帝不经中书省而直接下命令的，但这种被当时人看作很不寻常的事，于是就被记录了下来。当时的唐

中宗就干过这样的事，但做这种事皇帝自己也心怯，所书“敕”字不敢用朱笔，而改用墨笔，装敕令的封袋也要改为斜封，因此被称为“斜封墨敕”，而唐中宗私下封的官也被称为“斜封官”，为一般人看不起。

在汉朝政府和皇室的事都归宰相管，皇帝不能随便干涉；而唐代皇帝发出的命令必须要经过政府批准，因此当时的皇帝是很难说是专制的。

但到了后来皇权在逐渐加强，相逐渐的削弱，最终在明朝废除了宰相，政府的事皇帝一人办

了，而到了清朝，在政治上就没有像样的制度，所有的事情是皇帝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皇帝通过军机处直接对下面的官员下命令，根本不需要什么制度、中央政府，由此皇帝的集权专制在清朝达到了顶峰。

学习帝王术精通放权、分权与集权足够
历朝的开国皇帝都拥有强大的野心与领导力，
仔细研究开来，这些宝贵经验，对于在市场经济中创业的人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本文仅以北宋为例，看看宋太祖在治国时候所体现出的高超领导力。

宋朝政治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体现在职官制度上的五大特点，即中央集权、皇帝集权、百官权力分散、重文轻武和军事上内重外轻。这个可以具体到文武两条线的举措。

先看武的方面，赵匡胤在周世宗在世的时候，可谓韬光养晦，得到了皇帝的信任与下属的拥戴。在五朝十三帝的动乱年代，自然拥有很大的夺权机会。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在周世宗尸骨未寒的时候，利用契丹与北汉联军进犯的消息，发动陈桥兵变，就是赵匡胤极大的进取心之表现，兵不血刃地把后周的天下整个端了过来。

赵匡胤以国之重臣与皇亲的双重身份窃取了后周的天下之后，又极力避免有后人效法自己的做法，被下属“黄袍加身”代替自己当皇帝，

所以做了皇帝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传说中的“杯酒释兵权”削掉高级将领的兵权，其中包括当初称兄道弟的“义社十兄弟”。

赵匡胤首先动员拥有兵权的高级将领解甲归田，然后选拔新人接替其空缺出来的职位。他不仅把元老们的功绩归零，或者转化成为可以及时兑付的东西。同时，选择那些资历浅而听话，易于管理的人做左膀右臂，会让人有“受宠若惊”的感觉。这一点就使赵匡胤清除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

北宋在军事上设置枢密院（相当于当代的国防

部），将掌兵权与调兵权分开，枢密院大体是文官政治，虽然负责调兵，却不懂军事，也不负责管兵。枢密院负责军令、调动和高级军官的任免；“三衙”统率禁军；兵部负责后勤事务和管理地方的厢军；吏部负责武官铨选。

宋太祖赵匡胤“惩藩镇之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城，立更戍法，使（士兵）往来道路，以习勤苦，均劳逸。故将不得专其兵，兵不至于骄堕”。这种办法可收到“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效果，免去将官专权的威胁，当然，负面结果是对作战十分不利，这也是导致宋朝对外用兵的时候显得“肌无力”的重要原因。

宋朝在兵源上实行募兵制，其中一种，就是每逢有饥荒，从饥民中招募士兵，补本城。宋朝政府对从饥民中招募士兵的办法是“天下犷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也就是说把社会上的可能反抗者变为镇压者，一举两得。这种“以暴制暴”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北宋在社会治安中的矛盾。

宋朝还有个从后周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就是从地方厢军中选拔出强壮者充实到中央禁军。战略要地与边疆的派兵，注重中央与地方的对抗性。这种被称作“强干弱枝”的做法也是宋

朝军事制度的一个特点，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在对外抵抗入侵的时候，没有任何战斗力。

北宋在军事结构设置上，把两司变成三衙，让更多的人做领导，却又让谁都做不了最大的领导，这是分权，放权的同时分权，就是在集权。把调兵与战争的决策权，甚至具体战役所使用的具体部署，都要由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来指挥，因此就会时常出现贻误战机的情况。

文官调兵与强干弱枝，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之类的特色，本身就是在削弱诸如子弟兵那样的情感基础与默契程度，也起到了弱化团队战斗力

与向心力的效果。

北宋的军事管理机制把士兵当作棋子，而不会被感情所左右，这本身保证了朝廷的安全，同时也极大地弱化了军事管理中的人性化成分。同时也让带兵打仗成为单纯的技术工种，而负责训练与带兵打仗的都是武将，武将以无条件“服从命令”为天职，成为单纯的战争机器。

在文的方面，开科考试方面，赵匡胤“发明”殿试，把所有来参加考试的举人都变成“天子门生”，从根本上杜绝朝堂上的政治利益集团对皇权的威胁，而且为随后的宋太宗通过科举

录用的文人形成井喷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基本治国方略方面，赵匡胤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的祖训。在重文轻武的宋朝，诞生了很多名垂青史的文人骚客、词曲画家。让宋朝拥有理学与儒家学派深厚的社会土壤，并使得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宋朝的读书人拥有比较高的社会地位。

再看赵匡胤留下的政治遗产在现代管理方面的价值与启发。

在平台机制的设定上，做领导需要多创造针对

下属破格提拔的机会，领导者需要尊重每个人向上爬的内心需求，注重协调前朝旧臣、自己的功臣以及潜在贤人之间的关系。

赵匡胤把权利细分，并建立调配与制衡机制，在动态之中保持平衡，这个是符合时代发展的总趋势的。所谓制衡机制，并不单纯是御人之术，更多的是领导提供形象展示平台，所谓御人之术更多的是从被管理者的角度提出来的。

在现代机构的管理上，要想保持稳定，首要的是数量上的匹配，总部的市场人员必须相对强势于分支市场的规模，这是固本之法。其次是

要经常换防。就是经常在区域市场之间进行管理人员挑换，虽然动态的换防会形成官僚作风，但官僚制度恰恰是长治久安的基础。

我们不主张在管理的时候勾心斗角，而更多的需要上下齐心，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人都有进取心。既然陈桥兵变是赵匡胤进取心的表现，那么因何就要阻碍别人同样的进取心呢？毕竟总不能说进取心是不对的，所以对领导而言，下属的进取心是需要被限制的。

对领导而言，面对权利的分配，首先是看对人，对自己的忠诚是最基本的，其次是有制度约

束，让他们从理性上难以做出不好的表现，再次是要讲究策略，基于心理层面的研究与利用。在御人之术方面需要有制度性的保障。

作为领导，要清醒地认识到：只要是授权，中层就必然会争权夺利、弄权、滥用职权，因为他们分享的是高层的权，分食的是基层的利。所以既然授权很有可能被分权，领导被架空，最终要承担全部责任，这对老板而言是很不公平的事情，所以最终还是要集权。

领导需要时刻保持清醒的是：部署很厉害，一经授权，迟早会弄权。所谓弄权的核心就是趋

利避害的人性本能所支配的行为，即使下属可以很好地控制私欲的膨胀，也会很难完全驾驭他们自己的下属的思想与行为。当中层领导都是一些权臣，自然会对高层老板构成威胁，授权与分权的同时注重集权，收放自如的领导才是安全的。

授权的基础是信任。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在职场与商场之中，不会有与生俱来的信任，怀疑心重等于警觉性高，警惕性高一部分是由于大环境本就如此，另一部分是自己曾经受到过伤害。

关键是要有安全感，彼此之间增加信任的核心。

老板必须学会自我保护，用制度的方式，用尊重并满足其心理需求的方式来进行企业管理，领导对下属的知情权是管理的基础，对中层领导而言，即使得到信任与授权，先斩后奏也必须要及时奏，这是对中层最基本的要求。

作为领导与老板，需要大小事情都知道，但什么都不管。这就需要在授权之后不定期检查，因为授权不等于放弃知情权，一旦你的知情权被剥夺，就意味着你被架空了。

老板一旦被架空，你这个老板就会从有权无责变得有责无权，让自己变得很无辜，虽然把权利授予了值得信任的人，但依然难以抵挡人之本能的侵蚀，自己却非常不放心。

任何一个级别的人，不管是不是领导，都需要拥有清醒的意识与成熟的判断，耳听为虚，眼见也未必是实的。毕竟眼睛与耳朵是有高度选择性的，甚至记忆都是有选择性的，所以要想在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就需要审时度势，依托心理研究而制订应对之策。

对领导而言，授权要得到授权的好处，是高难度的；授权给员工，最终的结局大体都是不欢而散，不是被得势的下属干掉，就是要把他干掉。

对中层而言，只有让自己尊重高层的权利，有所忌惮；具有战略高度地为基层争取利益，这才是值得托付的中层。离领导越近，就越会危险。在《易经》中讲“三多凶四多惧”。因为距离领导近了，不仅会跟基层隔离，连领导都要对自己严加防范。作为现代企业的领导与老板，还是多学习一些历史吧。

帝王术反间计分化瓦解排除异己

《资治通鉴》提到的“反间”事件，没有具体统计，少不了二十件左右。我捡几件重要的有影响的学习，以加强对反间计的了解。

什么是反间计？“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¹意思是在疑中再布疑阵，使敌内部自生矛盾，我方就可万无一失。说得更通俗一些，就是巧妙地利用敌人的间谍为我所用。

一般说到反间计都会用田单赶走乐毅的事件，《资治通鉴》提到的第一个例子也是它。

公元前 284 年，乐毅率联军攻占齐国的首都临淄，尔后率燕军几乎占领了齐国全境。只有莒、即墨没有拿下。原因是在攻打安平县时，临淄的管市场的官员田单在安平，他的车因在车轴头上包了铁皮，出城逃亡时车没有坏而顺利逃出。安平人认为田单聪明，守即墨时就推荐他为首领。乐毅用了一年的时间包围即墨也没有攻下。后来，燕军后退九里，使用怀柔政策以瓦解敌人，三年后还是没有攻下。这时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乐毅会打仗，“六月之间，下齐七十余城，皆为郡县。”² 可即墨打了三、四年还打不下，其中原因就是不愿打下而想当齐王。笔者也认为，一个小小的即墨打不下，恐

怕不是燕军不行，而是另有原因。

听到这番话后，燕昭王召开酒会，斥责了告状的人，并且大力表彰了乐毅的功劳，说他帮我们报了先王被齐国害死的国仇，齐国也是他打下的，他当齐王也是应该的。并立即封他为齐王，他妻子封为王后，立即送她到乐毅那儿，儿子封为王子。还立即将告状者处斩。乐毅听到这个消息后“惶恐不受，拜书，以死自誓。由是齐人服其义，诸侯畏其信，莫敢复有谋者。”³ 乐毅不接受封赏，誓死效忠燕王，他的信义连齐国人、诸侯都佩服和惧怕，也就没有人再敢谋害他了。

公元前 279 年，上述事情发生不久，燕昭王去世，燕惠王继位。回望从当太子时，就与乐毅有矛盾，田单听说了。便派人去燕国用反间计，散布说：“齐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乐毅与燕新王有隙，畏诛而不敢归，以伐齐为名，实欲连兵南面王齐。齐人未附，故且缓攻即墨以待其事。齐人所惧，唯恐他将之来，即墨残矣。”⁴ 田单的反间计使用得很高明，抓住了新老班子交替之际的时机，利用新王与乐毅的矛盾，渲染即墨等两城未攻下的莫须有原因，迎合燕新王仇恨乐毅又怕他自立齐王的心理。最终按照田单的安排更换将领，“乐毅知王不

善代之，遂奔赵。燕将士由是愤惋不和。”⁵
这就为田单继续使用反间计，用火牛阵打破燕军的封锁，很快收复齐国领土创造了条件。

从以上反间计可以看出：只要内部团结，反间计就无法成功，燕昭王相信乐毅，外人再怎么挑拨都没用；相反，燕惠王一上台，人家就利用他与乐毅的矛盾使用反间计，很快解救了齐国。

如果说田单的反间计是针对某一个人，那么，下面的例子则是针对整个军队的某个战役。

田单反间计解救齐国后的九年，也就是公元前270年。秦国进攻赵国，围困阨与城。赵王召见廉颇、乐乘问道，可以援救吗？两人都说，道路遥远，更兼险峻，难救。再问赵奢，赵奢回答说，道路遥远险峻，就好比两只老鼠在洞穴中咬斗，勇敢者取胜。赵王于是令赵奢率领军队前去援救。赵奢刚离开邯郸三十里就停止不前，下令军中说，如有人谈及军事的，一律处死！

秦军驻扎在武安西，列阵大喊大擂，武安城内的屋瓦都为之震动。“赵军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赵奢立斩之。”⁶这是赵奢实施反间

计第一大措施：严格保密，不让下属谈及军事，不惜杀人以立威。

第二个措施就是麻痹敌人，赵奢军坚守二十天不动，反倒增修营垒，看似做长期准备，使敌人看到赵军惧怕，不敢正面与秦军交锋。第三就是让秦军相信赵军不敢救阨与城的情况是真实的。恰好秦国一个间谍潜入赵军，赵奢佯装不知，用好吃好喝招待他。间谍回去报告秦军大将，秦军大将大喜说阨与城不是赵国的了，就确定赵奢不敢救援，防备措施就松懈了。至此，赵奢的反间计就已实施成功。

这一段写得很精彩：“赵奢既已遣间，卷甲而趋，一日一夜而至，去阨与五十里而军，军垒成，秦师闻之，悉甲而往。”⁷ 赵奢等间谍一走，令部队席卷而走，一天一夜急行军，如天兵天将一样，离阨与城 50 里驻扎，并且修建好了营垒工事，秦军知道后，全部迎上来准备决战。后来，采用军士许历的计策，一举打败秦军，很快解了阨与城之围，赵奢被封为马服君，许历被任命为国尉。

世界上的事情有时可谓一报还一报，赵奢大败秦军 10 年后，也就是公元前 260 年，秦国应侯范雎使用反间计，将赵奢的儿子赵括打败，

这就是著名的长平之战，赵军被杀近 40 万人，赵国成年人几乎消灭殆尽。

赵兵屡次被秦军打败，廉颇便下令坚守营垒，拒不出战。赵王以为廉颇损兵折将后更加胆怯，不敢迎敌，气愤得多次斥责他。看到这种情况，应侯范雎马上派人用千金去赵国施行反间计，散布说，秦国所怕的，只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做大将。廉颇好对付，而且他也快投降了。赵王中计，便用赵括代替廉颇为大将。

赵括如何被打败，大家都知道，在此不必赘述。这次反间计之所以成功，主要是赵国有一个笨

蛋国王。他不但看不出范雎的反间计，也不听蔺相如、赵括的母亲劝阻，也没有听信赵奢生前的预言：“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赵不将括则已；若必将之，破赵军者必括也。”⁸也就是说赵括是使赵军败亡的将军。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自从赵国“胡服骑射”改革之后，也是当时三大强国之一，对秦国强大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有些尾大不掉。

还有一种情况，实施反间计的人，利用的是帝王最敏感的神经，那就是被打击的对象有篡位的嫌疑。

公元前 247 年，庄襄王为了挑拨离间信陵君与魏王的关系，遣人携带万金前往魏国，寻找到被信陵君所杀的晋鄙的门客，让他去劝说魏王道：“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复为将，诸侯皆属，天下徒闻信陵君而不闻魏王矣。”⁹ 信陵君流亡国外十年，现在重新担任了魏国的大将，各诸侯国的将领都心向着他，致使天下的人只听说有信陵君这个人，而不知道还有魏王了。庄襄王又多次派人奉送礼物给信陵君表示庆贺说，您做了魏国国君没有啊？魏王天天都听到这类诽谤信陵君的话，不能不信，于是就令人代替信陵君统领军队。信陵君明白自己第二次因别人的诋毁而被废黜了，便以生病为由

不再朝见魏王参与议事，日夜饮酒作乐，沉湎于女色中，过了四年就死去了。

其实，秦国的下三滥的手段很是小儿科，无非是造点谣言而已。但是，谣言在害怕君权旁落的君主看来，也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正如莎士比亚说的：“谣言是一支凭着推测、猜疑和臆度敲响的笛子，它是那样上口，即使那长着无数头颅的鲁莽的怪物，那永不一致的动摇的群众，也可以把它信口吹奏。”¹⁰ 曾子的母亲，本来是相信自己的儿子的，可是第三人说他儿子杀人的时候，她也相信，爬墙逃走，而何况一个君主呢。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信陵

君刚刚搬兵救了魏国，在诸侯国和魏国人民中具有较高的威信，他的地位离国君也就是一步之遥，魏王当然怀疑他了。

实施反间计除了利用君臣之间的矛盾，还有一个重要手段就是使用金钱。上面讲的反间计，范雎用了千金，庄襄王用了万金，而陈平离间项王与他手下则用了四万金。

公元前 204 年，汉王刘邦对陈平说，天下纷扰混乱，到什么时候才能安定呀？陈平说，项王身边刚直不阿的臣子，如亚父范增、钟离昧、龙且、周殷之辈，也不过几个人罢了。大王您

如果确能拿出几万斤黄金，施用反间计，离间楚国的君臣关系，使他们内心互相猜疑，而项羽的为人原就猜忌多疑，易听信谗言，这样一来，他们内部必然会自相残杀，我们即可乘机发兵去攻打他们，如此击败楚军是一定的啦。汉王说，对啊！便取出黄金四万斤交给陈平，任凭他自行活动，不过问他使用的情况。

陈平于是用许多黄金雇请间谍到楚军中去进行离间活动，扬言说，各位将领如钟离昧等人为项王领兵打仗，功劳卓著，但是却终究不能分得一块土地而称王，因此他们便想与汉军联合起来，借此灭掉项羽，瓜分楚国的土地，各

自称王。“项羽果意不信钟离昧等。”¹¹

当年四月，楚军在荥阳围攻汉王，形势紧急。汉王向项羽请求议和，将荥阳西面的地区划归汉国。但范增却劝项羽火速攻打荥阳，汉王为此忧心忡忡。这时项羽派使者前往汉王处，陈平利用这个机会，离间项羽与范增的关系。先是置备了丰富盛大的宴席，命人端去款待楚国的使者，但一见到楚使，就假装惊诧地说，我还以为是亚父的使者呢，原来竟是项王的使者啊！即将酒菜又端了出去，改换粗劣的饭菜送给楚使食用。楚使回国后，即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了项羽，项羽果然又对范增大加猜疑。

此时，范增也不知道项羽已经开始怀疑他，越是急于攻下荥阳城，项王越是不听。后来知道项羽在怀疑他，就发怒说：“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¹² 在他辞职回家路上，背上的毒疮发作而亡，项羽唯一的股肱之臣也离他而去了，他为何不败呢？可以说，陈平一箭数雕的反间计，将项羽的人才骨干系数除掉，奠定了刘邦定鼎天下的基础。

当然，历史上也有很多反间计没有成功例子，《资治通鉴》也有记载。

公元 431 年，“慧龙在郡十年，农战并修，大着声绩，归附者万余家。帝纵反间于魏，云‘慧龙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执司马楚之以叛。’”¹³ 说的是魏国大将王慧龙守卫荥阳十年，既劝民农桑，又积极备战，成绩显著，声名远播。前后赶来归附的百姓有一万余家。刘宋文帝乘机施用了反间计，说王慧龙自认为劳苦功高，却长期得不到重用，所以打算勾引宋人前来进犯，然后活捉司马楚之背叛魏国。魏国皇帝拓跋焘听到这些传言，颁赐给王慧龙一封亲笔诏书，说刘义隆害怕将军就象害怕老虎一样，打算从中陷害，我知道他的诡计。至于外面的风言风语，想你不会介意。刘义隆

一计不成，又施第二计，派刺客吕玄伯前去刺杀王慧龙。许诺说，你如果砍下王慧龙的人头，封你为食邑二百户男爵，赏绢一千匹。于是，吕玄伯假装投降，要求单独面见王慧龙，声称有话要说。王慧龙有点疑心，派人搜身，结果从腰中搜出短刀。吕玄伯叩头请求处死，王慧龙说，我们都是各自为其主行事罢了。释放了吕玄伯。王慧龙的左右亲信都劝阻他说，宋人的阴谋不会停止，不杀吕玄伯，没有办法阻止将来再发生这样的事。王慧龙却说，生死有命，他刘义隆又怎么能害得了我！我用仁义作为屏障来保护自己，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于是释放了吕玄伯。

还有一些大家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反间计，司马温公不予采信。如：所谓“蒋干中计”，《资治通鉴》只记载了蒋干去找周瑜劝降，看到周瑜的情况，蒋干连劝降的意思都没说就回去复命。

还有如赵匡胤反间南唐名将林仁肇，很多史籍都有记载，如《十国春秋·卷24》、《南唐书·卷14》、《图画见闻记》等，司马光没有记载。

公元972年，“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

中朝忌之，潜使人画仁肇像，悬之别室，引江南使者观之，问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将来降，先持此为信。”又指空馆曰：“将以此赐仁肇。”国主不知其间，鸩杀仁肇。”¹⁴ 意思是说，宋朝忌惮林仁肇的威名，派人偷偷画了林仁肇的相，挂在一间房屋中。后故意将南唐使者引入该房子里，说这是林将军的画像，他已答应投降宋朝，并以画像为信物。又指着一套空房子说，那是为他准备好的住房。使者回去报告李煜，李诗人派人将林仁肇毒死，自毁长城。

解析左右牟利与毁誉

帝王和他的左右是一个矛盾体，具有相互对立、彼此同一的矛盾属性。当然，帝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起着主导作用。不过矛盾双方是可以转化的，于是，帝王与左右之间的矛盾斗争就出现三种情况：左右利用帝王牟利被发现；没被发现牟利成功；帝王利用左右驾驭大臣。

《资治通鉴》记载：齐威王令人召来即墨的主官，对他说，自从你到即墨走马上任后，每天我都听到指责你的话传来。然而我派人去即墨

调查，看到的却是开辟整治好的肥沃田土，丰衣足食的百姓，官府不需要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我国的东方安定和谐。于是我知道“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这是你不用钱物结交我的左右内臣，以此谋求他们在我面前替你说项的缘故。齐威王于是封赐即墨大夫享用一万户的俸禄。

随后，齐威王又召见东阿的主官，对他说，自从你镇守东阿，我每天都听到称赞你的好话传来。但我派人前去调查，只见田地荒芜，杂草丛生，百姓贫困饥饿，命悬一线。当初赵国攻打鄆地，你见死不救；卫国夺取薛陵，你不知

道。于是我知道“子厚币事吾左右以求誉也”。你用重金来买通了我的左右近臣，每天在我面前替你说好话。当天，齐威王下令烹死阿地大夫及替他说好话的左右近臣。“于是群臣耸惧，莫敢饰诈，务尽其情，齐国大治，强于天下。”

《资治通鉴》齐威王杀一儆百，群臣震慑，毛骨耸然，不敢再弄虚作假，都尽力做实事，齐国因此大治，成为天下最强盛的国家。

一个地方的主官的政绩和誉毁，往往与他们的顶头上司的左右有极大关系。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齐威王不派亲信去调查，或者去调查的人

也被收买，再如果东阿大夫不仅收买齐威王左右还努力工作，和即墨与实际情况差不多，那么，得到齐威王信任的肯定是东阿大夫，倒霉的是即墨大夫。东阿大夫有人宣传，好官声远播，又得到领导信任，提拔就是早晚的事了。所以，大臣的誉毁和任用关键在于帝王的圣明。

据《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与儿子们很少在一起，连皇后也难得见上一面。一次，太子进宫谒见皇后，太阳都转过去半天了，才从宫中出来。也许是为了了解太子，汉武帝暗示过宦官们要随时向他汇报太子的情况，黄门苏文向

汉武帝打小报告说，太子调戏宫女。汉武帝没有较真，心想儿子大了，性欲肯定大了，于是汉武帝将太子宫中的宫女增加到二百人。后来太子知道了这件事，便对苏文怀恨在心。苏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看到太子母子已失宠，舅舅卫青大将军又已死，所以，这些小人经常暗中寻找太子的过失，然后再去添枝加叶地向汉武帝报告。对此，皇后恨得咬牙切齿，让太子禀明皇上杀死苏文等人。太子说：“第勿为过，何畏文等！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太子认为，只要自己没做错事，皇上是个聪明人，不会忠奸不辨，劝他母亲不要害怕。此时太子是个明白人，不像以后被江充陷害时冲

动，盲目抓人杀人。

后来，有一次汉武帝感到身体有点不舒服，派常融去召太子，常融回来后对汉武帝言道：“太子面带喜色。”汉武帝默然无语。及至太子来到，汉武帝观其神色，见他脸上有泪痕，却强装有说有笑，汉武帝感到很奇怪，再暗中查问，才得知事情真相，于是将常融处死。这时候，汉武帝还是一个明白人，没有被左右的人蒙蔽使太子蒙冤。

以上是左右利用帝王牟利未得逞的例子。可是，再圣明的帝王，如果他的左右找到了他的

软肋，也能直取其死穴，成功地致其敌于死亡。
汉武帝还是栽倒在江充的手里。

江充本不是什么好鸟。他原是赵王的门客，得罪了赵太子丹，后逃走到朝廷诬告，废掉了自己老主人儿子的太子位。由于江充善于揣摩汉武帝的心事，两人见面一谈话，汉武帝就高兴得不得了。“由是有宠，拜为直指绣衣使者，使督察贵戚、近臣逾侈者。充举劾无所避，上以为忠直，所言皆中意。”江充很快得到了汉武帝的宠信，并任命为直指绣衣使者，专门监督皇亲国戚、近臣大官。不管他官阶有多高，资历有多老，有没有真犯错误，江充都敢举报

弹劾，从不避讳。所有的举报都符合武帝的心事，汉武帝认为江充对他忠心耿耿。还有一事使江充名震京城：就是他发现太子的家人驾车行走在只有皇帝才能行走的驰道，太子知道后又派人去讲情，请求不要去上报到武帝那儿去，江充不理睬，立即去报告，武帝大加信任。至此，江充和太子结下梁子，为两人的死亡埋下了伏笔。

江充是个聪明人，他虽然得到了老皇帝的信任，老皇帝死后太子就要继位，那时，他不就是史得进的弟弟史（死）得成吗？于是，他就像一只捕捉猎物的老鹰，盯着太子，寻找机遇

猛击，一招致命。

江充明白能致太子死地只有汉武帝，也就是只有借汉武帝之手才能达到目的。于是江充反复揣摩汉武帝的心事：到处寻求不死之药，梦想长生不老，永远稳坐皇帝宝座。如果造成太子谋害武帝的假象，又得到武帝相信，太子想活都没机会了。机会终于到来了。“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上乃使充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求蛊；又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此时，汉武

帝年事已高，怀疑周围的人都在用巫蛊诅咒于他；而那些被逮捕治罪的人，知道汉武帝对巫蛊绝杀，无论真实情况如何，谁也不敢鸣冤叫屈。江充窥探出汉武帝怀疑总是有人利用巫蛊咒他的疑惧心理，便指使胡人巫师檀何扬言：宫中有蛊气，不将这蛊气除去，皇上的病就一直不会好。于是汉武帝派江充进入宫中，直至宫禁深处，毁坏皇帝的宝座，挖地找蛊；又派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协助江充。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江充扬言：“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大家都知道涉及巫蛊案件就没有活路可找，太

子十分害怕，无计可施，江充又苦苦相逼，加之手下没有沉稳之人出主意，而是叫太子杀江充，起兵造反，夺取皇位。结果，“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自经。”“皇孙二人并皆遇害”，皇后卫子夫也自杀身亡。

我曾经讲过，不要得罪小人，因为小人总是惦记着你，不将你置于死地决不罢休。可怜太子刘据不想，也没有得罪江充，只是遇到了小人江充，结果惨遭死亡。所以，我还要加上一句，千万不要得罪，也不要遇到小人，否则，你不知何时遭遇祸害。

以上所讲的是左右利用帝王，下面就讲帝王利用左右驾驭大臣，使自己的权利最大化。于是历史上就出现了宦官、酷吏、锦衣卫等皇帝的鹰犬，横行霸道、谗害忠良，造成国势沉沦，民不聊生。

张汤是中国老资格的酷吏，他办案“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经平者；以千乘宽为奏谏掾，以古法义决疑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上由是悦之。”《汉书》也相同记载：“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汉书·张汤传》，张汤总是按照皇帝的意图办事，凡是皇

帝所要加罪的，他就把案子交给执法严酷的人去办；皇帝想要宽容的案子，就交给执法轻平的人去办。

杜周“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汉书·杜周传》杜周继承了张汤的革命传统，特别会按照皇帝的意图办事，皇帝要排挤的，他就设计陷害；皇帝要宽容的，他就久拖不结案慢慢找到宽恕的理由。他的手下问他为什么不按法律办事，他狡辩说过去的法律是以前的皇帝定的，我们要与时俱进按现在皇帝的意见办事。（“当时为是，何古之法

乎！”）

杜周较之张汤有过之而无不及。到他当廷尉时，皇帝交办的案子越来越多。二千石的高官被抓者新旧相连不下百人，郡守府、丞相府、御史府的案件送到廷尉的，一年有一千多件。一个大案逮捕的证人数百人，小案也有几十人，政人远的数千里，近的数十里。会审时，证人要按照起诉书写说出证词，不这样去做就严刑拷打，直到按他们的要求提供证词为止。于是听到逮捕证人大都逃匿。久未办理的案子经过数十次大赦还会被告发，大多以“不道”为理由加以诬陷。廷尉和各府的监狱关押

的由皇帝交办的有六七万，一般官吏关押了十多万。《汉书·杜周传》

帝王术看透搞阴谋人的伎俩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那是因为人们不知暗箭是何人、何时、何方射来，所以，暗箭来时，猝不及防。或饮箭而亡，或九死一生，或死也不知何故，或把暗箭当馅饼。所以，笔者在读到这些史料时往往觉得触目惊心，汗流浹背，同时，也看出了耍弄阴谋的伎俩和门道，仔细想想，从中也许能得到一些裨益。

一、逼迫人毫无退路，非死即逃。

成侯邹忌本是齐国的美男子，古籍说他“修八尺有馀，身体昞丽。”是当时的“高富白”帅

哥，可是他的心是黑的，荀子说他是“聚敛计数”之人，也就是斤斤计较的气量宵小之徒。原来看到他用自己和徐公比美来说动齐威王接受群众意见，还觉得他是个人物。由于他的讽谏，齐威王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议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然而，在权利面前，就要起了阴谋诡计，令人不屑。

《资治通鉴》说：“成侯邹忌恶田忌，使人操十金，卜于市，曰：‘我，田忌之人也。我为将三战三胜，欲行事，可乎？’卜者出，因使人执之。田忌不能自明，率其徒攻临淄，求

成侯；不克，出奔楚。”翻译成现在的话说是，邹忌嫉恨田忌的赫赫战功，害怕取而代之当丞相，于是便派人拿着十金，去集市上向算卦人说，我是田忌手下的人，将军率军作战三战三胜，现在是不是举行登位大事的时候。待到算卦人出来，邹忌令人把他抓住，准备以此陷害田忌。这一招好生厉害，搞的是个灭族的篡逆罪，抓住了与他们串通一气的证人，《战国策》说的是抓住的算卦的，“罪证”确凿，田忌无法洗刷清楚，一气之下率亲丁攻打国都临淄，想抓住邹忌，却不能取胜，只好出逃楚国。

《战国策》记载了邹忌的部下公孙给他出主

意害田忌：“公何不为王谋伐魏？胜，则是君之谋也，君可以有功；战不胜，田忌不进，战而不死，曲挠而诛。”他们的阴谋是鼓动齐王令田忌为将攻打魏国，让田忌死在战场，或因战败而被诛杀。结果田忌大胜，才有后面逼田忌造反的毒计。

与田忌相比，晋国大臣赵盾被晋灵公和屠岸贾逼得走途无路的过程更加曲折惨烈，时间更长。

话说晋灵公做事不合为君之道，他用沉重的税收得来的人民血汗钱，将墙壁装饰得五彩缤

纷；从高台上用弹丸打人而看他们躲避弹丸的形状。有一次，厨子烧煮熊掌不熟，灵公杀死他，放在畚箕里，让女人用头顶着走过朝庭。

“赵盾、随会前数谏，不听；已又见死人手，二人前谏。随会先谏，不听。”对晋灵公的这些行径，大臣赵盾、随会多次劝谏，也没有效果。这次在朝堂上看见死人的手，二人又去劝谏，晋灵公依然故我，照样不听。不仅如此，他还想办法除掉赵盾，他与屠岸贾合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三计才将赵盾除掉。

第一计派人暗杀。“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麇（chú ni）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

朝，尚早，坐而假寐，麂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赵盾也算一个忠臣，给晋灵公提意见，搞得灵公都讨厌他、腻歪他，于是灵公就派手下的大力士鉏麂去刺杀赵盾。明·冯梦龙说得活灵活现：“岸贾侍灵公游戏。正在欢笑之际，岸贾忽然叹曰：‘此乐不可再矣！’灵公问曰：‘大夫何发此叹？’岸贾曰：‘赵相国明早必然又来聒絮，岂容主公复出耶？’灵公忿然作色曰：‘自古臣制于君，不闻君制于臣。此老在，甚不便于寡人，何计可以除之？’岸贾曰：‘臣有客鉏麂者，家贫，臣常周给之，感臣之惠，

愿效死力。若使行刺于相国，主公任意行乐，又何患哉？’灵公曰：‘此事若成，卿功非小。’”当然这些都是小说家言。

大力士清晨潜入赵盾院子，看见房门开着，赵盾已经穿好了上朝的衣服，因为天还早，坐在那儿打瞌睡。鉏麇看到这些，叹气说，不忘记恭敬，真是百姓的主人。刺杀百姓的主人，就是不忠；放弃国君的使命，就是不信。两件事情有了一件，不如死了好。于是，撞在槐树上死去了。这种记载来自左丘明之《左传》，太史公采用这种看法，钱钟书解释说：“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

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

第二计，摆“鸿门宴”刺杀赵盾。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鸿门宴”这个词汇，意思就是请人吃饭，在饭桌上将敌人杀死。晋灵公知道鉏麇没有杀死赵盾后，非常生气，并寻找机会。秋季九月，根据屠岸贾的建议，晋灵公请赵盾喝酒，埋伏了甲士，准备攻击杀死赵盾。赵盾

的车右提弥明察觉了灵公的阴谋，快步登上殿堂，对赵盾说臣下侍奉国君饮酒，超过三杯，就不合礼了。立马拉着赵盾跑下殿堂。晋灵公嗾使他的大藏獒扑过去，提弥明上前搏斗，把狗杀了。赵盾说，不用人而利用狗，虽然凶猛，又有什么用。赵盾一边搏斗一边退了出去，提弥明被伏兵杀死。

也是赵盾命不该死，阎王爷没有在生死簿上划勾，这时有一位他曾经救过一命的人帮助了他。原来，很多年前，赵盾在首山打猎时救过一人性命，此时，反过来又救了他。事情是这样的：“初，盾常田首山，见桑下有饿人。饿

人，示眯明也。盾与之食，食其半。问其故，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不，愿遗母。’盾义之，益与之饭肉。已而为晋宰夫，赵盾弗复知也。”这个人，《左传》叫灵辄。赵盾给他饭吃，并让他带回一些饭食给他母亲。他后来当了晋灵公的卫士，当其它卫士要杀死赵盾时，他帮助抵挡敌人，让赵盾逃走。古籍说他“然不知明之为阴德也”，也就是只要做好事，就会积阴德，得好报。

第三计，军队攻打赵家，将其灭门。赵盾逃到边境的时候，赵盾的弟弟赵穿将晋灵公杀死，赵盾另立新君，还是当他的丞相。但是，弑君

的责任归赵盾担当，原因是弑君时他还在晋国境内，同时，也没有惩处弑君者。“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孔夫子同时表扬了两个人：良史董狐，据法直书毫不隐瞒；良吏赵盾，为遵守法制甘愿承受坏名声。

赵盾死后，他的死敌屠岸贾利用赵盾弑君的罪名，不请示国君就擅自和将领们在下宫攻袭赵

氏，韩厥反对，但势单力薄。他就告知赵朔赶快逃跑。赵朔不肯逃跑，他说，您一定能不使赵氏的香火断绝，我死了也就没有遗恨了。韩厥答应了他的要求，他谎称有病不出门。“贾不请而擅与诸将攻赵氏于下宫，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皆灭其族。”

此后就演绎出了“搜孤救孤”荡气回肠的历史悲剧，这个故事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故事中的两位主人翁，一个是赵朔的门客，一个是朋友。他们两人都是具有大德的人物，为了朋友，不惜牺牲家人和自己的生命。可惜这种人在战国之后就少见了，现在更是难以见着。

我们可以从上面两个例子看到，搞阴谋的人一般都是以最大的罪名陷害人，这些罪名不是篡逆、叛国，就是弑君。而他们的手段就是把要陷害的对象，往这罪名的路上逼。我觉得要避免遭遇阴谋，首先就是要淡泊名利，远离小人，最好是像陶朱公范蠡、张良学习，功成身退，不要恋栈，逃离是最好的选择。否则，反误了卿卿性命而不知。

二、诱骗人上当受骗，坠入圈套。

诱骗人的伎俩，第一是装好人，他似乎是集公平正义于一身，是一个正直的人，一切为他人

着想的人。他可能是你的熟人、朋友，甚至是亲戚。第二是他在做好事，所做一切都是为了你好，第三是让你相信你会得到一个好结果。他手里拿着香喷喷的诱饵，正是你需要的那种东西，也就是投你所好。最后是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翻云覆雨之手段，使你堕入其挖好的坑，让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历史上有很多这方面的高手。

李林甫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因身体力行创造出“口蜜腹剑”成语而遗臭万年，他比狐狸精更狡猾，其骗人手段堪称范例。《资治通鉴》记载：“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

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意思是说，李林甫当丞相就是武大郎开店，能力政绩比他强的，或者皇帝喜欢，对他的相位有威胁的，就千方百计将他们除掉。对他的政敌“当面嘴巴里喊哥哥，背后手里拿家伙（棍棒刀枪）”，个个被他击倒。

李林甫文化水平有限，特别忌恨有学问的人。天宝元年（742）有一次艺术家玄宗在勤政楼工作之余也不忘记观赏歌舞，因怕有人说工作时间搞娱乐，拉下了窗帘。兵部侍郎卢绚以为

玄宗已经离开，于是就没有下马，而是提鞭按辔，从楼下穿过。卢绚风度翩翩，清新儒雅，玄宗目送其远去，感叹卢绚含蓄不露的风度。因平时李林甫常常用金钱贿赂玄宗左右的人成为他的眼线，玄宗的一举一动，李林甫都了如指掌。于是李林甫就召来卢绚的儿子说，你父亲素来有名望，现今交州、广州需要有才能的人去治理，皇上想令你父亲去，不知道愿意不愿意去。我这可是违反了组织原则私下告诉你，谁要你爹是咋哥们呢？言下之意他是学习雷锋做好人好事。接下损招就出来了，而在不知内情的人们看来这是在帮助他。李林甫说，如果害怕到边远地区工作，就应该降官，否则，

只有以太子宾客或詹事的身份在东都任官。这也算是优惠贤者的任命，不知你们的意见如何。卢绚听后，十分害怕，于是就主动奏请担任太子宾客或詹事。李林甫又恐怕违背众望，引起众怒，就任命卢绚为华州刺史。“到官未几，诬其有疾，州事不理，除詹事、员外、同正。”《资治通鉴》最后将卢绚彻底闲置在那儿，没有与他争宠的能力了。

有一次玄宗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在哪里任官，这个人可以重用。谁知道皇帝一句问话，严挺之就开始倒霉了，严当时为降州刺史。李林甫退朝后，立马召来严挺之的弟弟严损之，

告诉他说，皇上十分器重你哥哥，为何不乘此机会，上奏说得了风疾，请求回京师治病。李林甫又是装好人，表面上看他对人家的健康关怀备至，多好的组织部门的领导啊。严挺之感激涕泣，激动得马上写了治病的报告。李林甫拿着严挺之的报告对玄宗说，皇上如此器重严挺之，可他有负皇上期望，衰老中风，应该授以散官，便于治病养身，以体现皇上爱臣如子的大恩大德。玄宗听后，感叹不已。四月二十八日，任命严挺之为詹事。又任命汴州刺史、河南采访使齐澣为少詹事，二人都是员外同正，一道在东京养病。“澣亦朝廷宿望，故并忌之。”《资治通鉴》齐澣也是因为在朝中素

有名望，所以遭到李林甫的猜忌。

历史上有一个比李林甫更高明的诱骗人的高手，他就是楚国的费无忌。李林甫只诱骗一个对象，费无忌同时诱骗两个人，然后借助其中一方将他嫉恨的人铲除。

鲁昭公二十七年（前 516），楚国大将左尹郤宛与吴国打仗，因吴国国内发生政变，无心恋战，被打得大败而逃，楚国缴获了大量武器粮草，俘获了很多士兵。郤宛班师回朝，楚王给予极大奖励，将缴获的战利品一半奖给了郤宛，并特别倚重于他，费无忌和右领鄢将师十

分嫉妒恨。于是，费无忌史上第一次设计了利用“饭局”陷害人的骗局。

费无忌看中了“令尹子常贿而信谗”《左传译注》，也就是喜欢别人送东西而又听信谗言的弱点，也许平时费无忌没有捎给子常送东西，利用他作为自己害人的工具也是手到擒来。于是，他找到子常，说郤宛得到了很多奖金，非常感谢你对他工作的支持，想请你聚一聚，吃个饭乐呵乐呵。子常是楚庄王第三子的孙子，这个人长的高大威猛，心眼坏倒不坏，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以前楚灵王的时候，他是灵王的车夫，齐国的晏子出使楚国时，带头刁难

晏子的那个人就是他。对费无忌的话没加考虑就爽快地答应了。

搞掂了一头，又去找另一头。费无忌对郤宛说，令尹要到你家里去喝酒，这可是对你极大的恩宠呀。郤宛说，我是下贱的人，不足以让令尹到这里来。令尹如果真想要前来，赐给我的恩惠就太大了。我没有东西奉献，怎么办？费无极说，令尹喜欢皮甲武器，您拿出来，我来挑选。选取了五领皮甲，五种武器，说放在门口，令尹到来，一定要观看，就乘机献给他。等到举行酒宴的那一天，傻帽郤宛把皮甲武器放在门边的帐幔里，此时，恐怕他心中喜滋滋，内

心里感谢费无忌牵线，要不哪有机会向令尹大人献殷勤。正满脸笑容指挥家人，忙前忙后迎接贵客。

郤宛哪知道一场阴谋造成的灾难向他袭来，请人来吃饭变成引人来灭族。费无极对令尹说，我几乎让您遭祸，郤宛打算对您不利，皮甲和武器都放在门口了。您一定不要去！子常也是没脑子，阴着杀人的武器能放在门口吗？费无忌还另外添了把火，说这次打吴国本来可以取得更大的胜利，是郤宛受了贿赂而回来，又贻误了将领们，让他们退兵，说“乘人动乱而进攻，不吉祥”。吴国乘我们有丧事，我们乘他

们的动乱，不也是可以的吗？令尹让人到郤氏那里看动静，就看到有皮甲和武器在门口。令尹不去郤家了，便召见鄢将师并把情况告诉他，鄢将师退下，就下令攻打郤氏，并且放火烧了他的家。郤宛听到消息，就自杀了，除了儿子伯嚭逃跑外，“尽灭郤氏之族党，杀阳令终，与其弟完，及佗，与晋、陈，及其子弟。”《左传译注》郤宛、阳令终和晋陈三家被灭族，可谓惨绝人寰。

虽然，对搞阴谋诡计骗人的人防不胜防，但只要留心观察、思考，还是能看出破绽的。对找上门的“好人”为你做“好事”，要问几个为

什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到他这样做的目的，反其道而行之，不跌入他设计的坑，事情的发展就会有利于自己了。

帝王术 4 大要点历史帝王无一不精

代的智士想要扬名、立业、建功、上位，途径相当有限，“将身货与帝王家”几乎是不二的选择。如此一来，除非他们甘冒极大的风险去造反夺权，不然的话，赢得帝王的赏识才是一条相对稳妥的出路。危则能使之安，安则能使之强，强则能使之霸，许多时候，只须提供幻觉和假象就行，一旦龙颜大悦，智者何求不获？很显然，他们想美梦成真，就不仅要具备灵活机敏的头脑、三寸不烂之舌和回春妙手，而且必须将帝王学修炼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方可闪亮登场。

帝王学，更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帝王术。任何人文之“学”都讲求格物致知，悲天悯人，有定法、定则、定理、定律可供众人寻绎，多多少少总得包含些终极关怀。“帝王术”注重的却是达变通权，审时度势，扳倒对手，折损敌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没有定法、定则、定理、定律可供众人寻绎，它的工具理性冰冷彻骨。说白了，帝王术只判明得失利害，不辨别是非曲直；只在乎胜负输赢，不顾及礼义廉耻；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马基雅维利主义。

关于“帝王学”，唐浩明先生的判断值得我们参考：“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帝王如何驾驭臣

下，权臣如何挟帝王以令群僚，野心家如何窥伺方向，选择有利时机，网罗亲信，笼络人心，从帝王手中夺取最高权力，自己做九五之尊。”

帝王学的尖端技术在于“借权”，其巅峰表现是“挟天子以令诸侯”，权力久假不归，傀儡戏的牵线人便走上前台。

一、修炼帝王学的“四要”

修炼帝王学，要在“明目”。智者静观天下大势，捕捉要点和重点，透析疑点和难点。诸葛亮《隆中对》预言天下鼎足三分，充分显示了

这位青年才俊惊人的眼力。曹操将汉献帝玩弄于股掌之间，随时可以颠覆汉室，却迟迟不肯篡位，也是看出火候未到，不宜操之过急。智者师心自用，最忌走眼，若见势不明，鉴人不准，则很可能痛失好局。

修炼帝王学，要在“下心”。大头领礼遇奇材异能之士，竭诚网罗天下英雄豪杰，方能使勇者奋其力，智者竭其谋，愚者搏其命。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均发迹于卑微，他们能一统江山，成就帝业，礼贤下士的高光表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修炼帝王学，要在“利口”。“一言兴邦”、“利口覆国”这样的成语透露了个中信息。有人说：“一支笔，抵得过三千毛瑟枪；三寸之舌，重于九鼎之宝；一人之辩，强于百万之师。”智士修成利口，舌灿莲花，天衣无缝，其大忽悠就无往而不利。

修炼帝王学，要在“辣手”。开国之君登基之后，就忙着剪除功臣，用铁扫帚收拾老伙计。他们打江山时礼贤下士，坐江山时翻脸不认人，这正好体现了帝王学的诡异莫测之处，术随时变，法无定法。须知，他们打江山时成功优先，坐江山时安全第一，彼一时也，此一时

也，不可同日而语。

二、找准了对象即找准了方向

范蠡和文种都是智者中的智者，他们看准勾践是位能够成就霸业的英主，故而为之效命，即使勾践战败失国，仅存五千甲士，困居会稽，卧薪尝胆，受尽屈辱，他们仍然不离不弃。勾践采取范蠡的方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运用大夫种的“九术”，培元固本，秣马厉兵。二十年后，他胜算在握，向吴王夫差摊牌，彻底洗刷失国之耻，夷平姑苏，称霸诸侯。范蠡、文种看不起威风八面的吴王夫差，却看得起失

国忍辱的越王勾践，他们不买“大妖股”，却满仓“ST股”，最终功成名就，足见眼力不凡。

公孙鞅在魏国只是相国公叔痤的家臣，公叔痤临死前将他推荐给魏惠王，说是若不重用即杀之，以绝后患。魏惠王是个典型的草包，竟把公叔痤的遗言当成笑话。秦孝公志存霸业，重用贤才，公孙鞅闻讯后赴秦面试，先以帝道、王道试探，不进油盐，终以霸道见用。君臣相契，富国强兵，秦国遂以僻远之国一跃而为群雄之首。公孙鞅因封地在商於而被称为商君、商鞅，实堪称中国历史上的头号改革家。

苏秦、张仪是鬼谷子的得意门生。鬼谷子是纵横家的鼻祖，他的学说讲求“捭阖”“反应”“忤合”“揣摩”和“权谋”，这无疑是帝王学的标准胚胎。

苏秦、张仪学成下山，从理论到实践，举步维艰，在事业上均遭遇挫折。苏秦先去游说身价大跌的周显王，不灵；再去游说秦惠文王，还是不灵；旅费用完了，黑貂皮大衣上的毛也磨光了，苏秦踟躅于咸阳街头，就像一片秋风中惆怅的落叶；他落魄潦倒，惭愧回家，妻子不肯正眼瞧他，嫂子不肯给他做饭。

张仪在楚国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在楚国令尹家做客，却被怀疑为窃贼，一顿拳脚后，满地寻牙。如此惨状，他非但得不到妻子的同情，还受到冷嘲热讽，但张仪的幽默感超强，他让妻子看看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在不在，只要舌头安然无恙，希望就仍能茁壮成长。

失败是成功之母，苏秦以合纵策略说服了燕文侯，一旦芝麻开门，他就因势利导，相继说服赵肃侯、韩威侯、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组成六国军事联盟，对抗强大的秦国。苏秦下得最妙的一步棋是故意当面折辱师弟张仪，然

后暗地里派人将张仪护送到秦国，为他铺平道路，张仪果然没辜负苏秦的厚望，成为了秦国的丞相。

师兄合纵，师弟连横，一个“做多”六国，一个“做空”六国，双簧好戏，热闹非凡，荣华富贵都成了他们的囊中之物。两人威风八面，张仪的表现尤其出色，竟可以收到“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奇效。

儒家学说堪称广义的帝王学，然而孔子周游列国，四处碰壁，惶惶如丧家之犬；孟子游说梁惠王和齐宣王，也是对牛弹琴，以失败而告终。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王道滞销，霸道横行，儒家学说力主仁义，不被诸侯、诸王待见待听，完全合乎逻辑。汉朝初期，与民休息，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学说占据上风。

及至汉武帝，其做大做强的雄心昭然若揭，董仲舒把握时机，以天人感应酱制儒家学说，极合汉武帝的胃口，从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千余年，独沽一味。儒家学说被反复改造，理所当然地荣升为正牌的帝王学，孔子、孟子被捧为至圣、亚圣，文庙里的冷猪头肉便很少断供。

三、风险难以把控

为学不精，难以成才；持术不慎，危及性命。

帝王学是一柄见血封喉的双刃剑，操持帝王学的顶尖高手乘时而起，顺势而为，确实能够称帝封王，出将入相，但很多人无法把控其风险，往往死无葬身之地。

修炼帝王学能全身而退的人少之又少，范蠡的表现特别值得称道。功成之日，他弃官远引，泛舟五湖，嗣后成为天下首富陶朱公，以聚财散财为乐事。他曾写信提醒好友文种：“高鸟已散，良弓将藏；狡兔已尽，良犬就烹。”可

惜文种执迷不悟，殊不知，其“破吴九术”只用三术，尚剩六术，这正是文种的取死之道。待到越王勾践派遣使者送来那柄淬了剧毒的鱼肠剑，文种悔之晚矣。

司马迁在《史记·商鞅列传》的结尾评议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也。其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也。”商鞅能将秦国做大做强，可是他保命乏术，终被五马分尸。

挟持帝王学以为利器，最终却以身殉道的高

人，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位：吴起在鲁则鲁强，在魏则魏强，在楚则楚强，最终却在楚悼王的尸体旁被乱箭射死。吴起要变法图强，势必与权贵为敌，一旦谗言四起，主子断气，他就没了活路。吕不韦立主定国，其政治献金所获得的回报极其丰厚，拜为秦国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身为大臣，富贵已极。然而一招(他将嫪毐送给赵姬做男宠)不慎，满盘皆输。李斯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功勋盖世，算度无人能出其右，他设计害死师兄韩非，足见其手段狠辣。然而他贪恋富贵，竟与暴虐弱智的胡亥和阴险奸恶的赵高结盟，矫诏害死公子扶苏，风险失控之后，三族诛夷和秦朝灭亡的

悲剧就铁定上演。晁错是汉景帝信任的智囊，他的削藩主张乃是正确的国策，七国举兵，以清君侧为借口，死对头袁盎一言，晁错即沦为替罪羊和冤死鬼。景帝深惜之，尚且如此，遑论其他。

伴君如伴虎，玩火必自焚。帝王学是一柄淬毒的双刃剑，它见血封喉，既能伤人，也能伤己，风险极难把控。

四、帝王学死而未僵

晚清文豪王闾运一生修炼帝王学，欲做帝王

师，可是他费尽口舌，也没能说服曾国藩，以湘军覆清，取而代之。其弟子杨度急功近利，颇有“一舞剑器动四方”的气概，曾致书友人，大言不惭：“余诚不足为帝王师，然有王者起，必来取法。”1903年，章太炎被囚禁于上海西牢，写诗讥讽杨度，其中两句为“长策惟干禄，微言是借权”，就是嘲弄杨度操持帝王学，哭着喊着要报效清廷，其实打的全是个人的如意算盘。

民国初期，杨度将帝王学包装成光鲜无比的君主立宪论，孤注一掷，牵头成立筹安会，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杨度昧于时势，异想天开，

他认为袁世凯能够成为德皇威廉一世、日本明治天皇那样雄心勃勃的有为明君，他可以效仿铁血宰相俾斯麦、伊藤博文，成就一番伟业。为了捞足政治资本，杨度擅自在劝进书上代恩师签名。

王闳运年逾八旬，却并不糊涂，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他劝杨度不可犯下常识性错误：“若先劝进，则不可也。何也？总统系民立公仆，不可使仆为帝。”王闳运致信袁世凯，也婉言劝导后者打消称帝魔念：“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袁世凯正在乐颠颠地试穿龙袍，这种逆耳之言，哪里听得

进去。

王闳运崇尚风骨远胜过重视利禄，就算他要兜售帝王学的“老锅底”，也绝对不肯沿街叫卖。袁世凯得陇望蜀，欲壑难填，王翁视之一介鄙夫。后来，王闳运出任过国史馆馆长，不足一年，即自劾离任，挂印南归。

杨度是一位刚愎自用的政治操盘手，他走的是一条黑路，一条通往坟场的路，一条通往地狱的路。尽管这位虎禅师抱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道德勇气，但与地藏菩萨的宏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毫不相干，最终他沦

为了洪宪丑剧中的“扛尸人”，可哂复可悲。

诚然，帝王学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它代表不了先进文化的方向。有人说，这门昔日的显学早已过气；有人说，帝王学死而未僵。不管怎样，它要借尸还魂，绝对千难万难。

帝王术任用、敛财背后的目的

公元 755 年，唐朝发生了安史之乱，经过这场战乱，可纳税的人口数量减少，财政吃紧，为扭转财政亏损局面，需要另辟途径，寻找税收来源，所以唐玄宗就任用了第五琦，整顿财政。

为了驱散全国政治上的乌云，应急眼下战事所需的军费，第五琦全面垄断盐业，把食盐的生产、运输、销售全部收归朝廷，对私煮私卖食盐者进行定罪。

可是，盐价大涨，当然，客观上也增加了朝廷的收入。另外，官府垄断盐业，还造成各个环

节的腐败行为，使官营的盐业收入流入私囊，不能很成功地增加朝廷收入。

这个时候，国家又利用刘晏，制定新的盐法政策，与第五琦的盐法相比，由官收、官运、官卖，变成了官收、商运、商卖。食盐的生产、收购、储存等方面还是由官府把持，由官方掌握食盐价格，然后卖给商人，由商人们去运送和销售他处，如此就减少了食盐运销方面的官吏，减少了人力成本，相应地也就减少了政府在运输、销售方面的开支和费用。同时还减少了腐败行为，提高了效率。又由于利润的刺激，商人会把食盐行销到全国各地，甚至是较为边

远的地区，这样，朝廷便吸纳了更远边陲的利润，百川归流。

第五琦和刘晏的改革，都是为了把地方的钱财收归中央，可是，刘晏对盐法的改革，成效更好。

刘晏改革盐法的措施和效果都是超过第五琦的，也就是说，刘晏比第五琦的敛财本领更高明一些。刘晏高明在何处呢？他不过是把食盐的运销权放给了商人而已，但就是这么一放，财源就滚滚而来。

——这是一个顶划算的政治算术。

从刘晏改革盐法的道理中，可以看出是国家利用了商品市场关系，从而达到财政税收的目的，国家可以不直接介入市场，但经过商人这个中间环节，可以间接地控制市场，控制了市场也就等于控制了地方的财政，这是国家利用权力控制经济运行的表现，目的不外乎还是为了保证中央政权的稳固。

经过刘晏改革的盐法是比较成熟的食盐专利制度，为以后的朝廷所效仿。国家经营并操控市场，成为永远的赢家，只有到了把地方的财

力抽干榨尽，民不聊生之时，下层民众才会沸腾起来，进而把中央政权推翻，改变一个朝代的中央政权永远作为赢家的局面。

帝王术获取权力引开注意力

明朝第十代皇帝朱厚照无子，他临死时遗诏：
三个堂兄弟，谁先来到北京，谁就做皇帝。

这三兄弟，分别在山西、河南和湖北，在湖北的朱厚燄听到消息后，向算命先生问命，算命先生趁机献上一计。

朱厚燄依计而行。

他坐着快马拉的囚车，抄着近路，连夜飞奔京城。为了避开对手视线，掩人耳目，他选个替身，另派一批人马，声势浩大，从另外一条路

线赶往京城。

朱厚燄坐在囚车里，快马加鞭，先于其余两位皇兄到达京城，于是就捷足先登地继承了皇位。

他就是明朝的嘉靖帝。

我们是该感叹事情的荒谬呢，还是该赞叹嘉靖皇帝的谋略呢？

这段史实表明了争夺皇位的激烈，我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看待它。

按照一般的思路，谁都不会想到朱厚熜会坐上囚车，毕竟作为皇家人物，他太高贵了，但正是由于别人不会这么想，才不会有人怀疑“囚犯”的身份。

按照惯常的先例，把犯人押赴京城，也是常有的事情，由于犯罪情况的特殊，囚车飞速赶路，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朱厚熜正是借助了人们的惯常思路，避开对手和路人的视线，打破常规，畅通无阻地奔赴到了目的地。

帝王术不同时期用不同人做事

清太宗皇太极不仅是一个文武双全、智勇兼备的优秀君王，而且也是一位求贤若渴，善于惠政揽人、敢于大胆用人、能够充分信任和器重人才的卓越领导者。在他统治的 17 年里，他充分认识人才的重要作用，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广揽满、汉、蒙古（尤其汉族知识分子）各族人才，并委以重任，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政治舞台，从而为清兵入关夺取全国政权、代明而立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清太宗深知人才的重要性，他在建立“大清国”之后即实行开科取士，为兴盛大清畅通荐才渠

道。即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他也时刻不废渴求人才拳拳之心，并一再提醒部下：“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得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助力，其利赖宁有穷乎？”

为了从更大范围延揽天下英才而用之，明崇祯八年，后金（清）天聪九年，亦即 1635 年，他面向全国下达了不拘一格网罗天下英才的《荐贤诏》：朕惟图治以人才为本，人臣以荐贤为要。尔满、汉、蒙古各官果有深知灼见之人，即当悉行举荐。所举之人，无论旧归新附，及已仕未仕，但有居心公正、克服任使者，即

呈送吏部；有通晓文艺，居心公正、足备任使者，即呈送礼部。该部贝勒奏闻，朕将量才录用。天下才全德备之人，实不易得。但能公忠任事者，其速行举荐。

从清太宗的《荐贤诏》，我们可以看出皇太极用人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用人不拘一格。满、汉、蒙古不分区别，但凡有才之士，皆在举荐之列。不分旧归新附，也不论是否及仕任职，发现足可任事者，都可大胆启用。所揽人才，不论才能高低，不求全责备论之。能克胜任使者用，足备任使者亦

用，并不企求找到与任用完美无缺之人，颇具清醒而务实的用人之风。

二、用人标准明确。国家以人才为本，大臣以荐贤为要，君臣合心，通力延揽人才。在清太宗皇太极的眼里，他的总体标准是“贤”。具体而言，就是重视居心公正，要求忠诚官事，看重克胜任使。也就是说，他用人首重其德，次重其忠，更重其才，力求才堪任用，能够有助国事。

三、量才录用，信任器重。清太宗非常重视人才作用的发挥，尤其他深知在清兵入关、夺取

政权的道路上，知识分子尤其汉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帮助和作用丝毫也不能忽视。因此对汉族知识分子不管是举家投靠者还是单身投靠者，他都一律恩养厚待，并根据其德能表现，对其中杰出人才委以重任，充分信任，让他们参与机务，给他们提供活动舞台，让他们充分施展才华，助推大清国日渐强盛。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对范文程的使用。

范文程是宋代名臣范仲淹之后，胸怀文韬武略，腹有治世良谋。皇太极深知范文程是个难得的政治人才，因此对范文程特别器重和信任，任命他为内秘书院太学士、进世职二等甲

喇章京，凡事都注意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干：官员议政方案，征求他的意见；议政不决，与其议之；范文程参与议决的事情一律签署批准；范文程病，重大问题等待他裁决；范文程起草的重要文书“乃不复祥审”，悉信“当无谬也”。君臣信任之深，堪为历代典范。清太宗重视人才，重用人才，敢于大胆使用汉人，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可谓勇气、胆识、视野、胸襟、魄力、气度都令人赞叹。

帝王术夺权第一步是击倒政敌

权臣，是皇权时代的特有品种。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几乎不可能出现权臣这种人物，因为个人的政治权力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都是有限的，随时可以被收回，任何人都不可能一劳永逸、持续膨胀地长期掌握政治权力。

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常常是多面的，充满张力，二者既有对立，又有合作，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不断转换。权臣之兴起，必须得依托皇权的支持，权臣本人往往也一度对皇权的巩固和发展贡献不菲。但随着权臣势力的壮大，他会部分攫取、侵夺皇权，对皇权形成威胁，最终又被

皇权所清算。

有清一代，中央集权程度达到中国皇权时期的顶峰，故而并未出现太多权臣。史学家杨珍曾做了个统计，认为清代真正能达到权臣地位的人只有 7 个（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其中鳌拜是排名第一的强势人物。

鳌拜是满清镶黄旗贵族，三朝元勋。他以军功起家，在清军入关前的关键战役“松锦会战”中，他大败明军步军营，功劳卓越。明朝总督

洪承畴率 13 万大军来援，他随皇太极应战，“辄先陷阵，五战皆捷”。明军败遁，他率军追杀，大获全胜，“擒斩过半”。其后，他又随阿巴泰入长城，围攻北京，掠至山东、兖州、临清而返。

1644 年，清兵攻陷北京，多尔袞考核群臣功绩，鳌拜以“忠勤戮力，晋一等子”。稍后，鳌拜随阿济格征湖北，破李自成军；随豪格入四川，与张献忠战于川北西充，斩献忠于阵。在明清鼎革之际，鳌拜可说是战功赫赫，为清王朝贡献卓著。

1661年，顺治遗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四大臣。鳌拜军功最高，但因资历、威望等缘故，名列第四。他不甘于此，遂倾力施展诸种扩权、夺权手段。

夺权第一要义，是击倒政敌。先是，借圈地换地之争，鳌拜在索尼、遏必隆的附和之下，杀尚书苏纳海、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鳌拜就此成为四辅臣中政治实力第一的权臣。

等到1667年，康熙满14岁亲政，四辅臣的政制安排理应退出历史舞台。此时，索尼已死，苏克萨哈要求辞职，还政康熙。鳌拜不甘心退

出权力中心，遂裹挟遏必隆，对苏克萨哈发动致命攻击。他诬陷苏克萨哈请辞是“背负先帝”，“别怀异心”，更罗织二十四条罪状，要将苏克萨哈斩首抄家。康熙以“核议未当，不许所请”。鳌拜在殿前对康熙疾言厉色，恐吓要挟，刚亲政的康熙羽翼未丰，无法抗衡鳌拜，苏克萨哈遂被处绞刑。

苏克萨哈死后，鳌拜的权力达到顶峰。学者杨珍小结了鳌拜在权力顶峰的四个特征：一是蔑视皇帝，飞扬跋扈。他常在康熙面前对部臣高声喝问，还拒绝执行康熙的旨令。二是将朝廷治权私人化。一切政事，鳌拜先于私家议定，

然后施行。他常把各地奏折拿回家中与亲信议办，几视康熙为无物。三是部分掌握生杀大权。前面提到的诛杀尚书苏纳海等人，以及罗织辅臣元老苏克萨哈罪名致其死等，均是其擅权决杀的得意之作。四是部分掌握人事大权。“所喜者举荐，所恶者陷害”，大力培植私党，对不附己者严厉打击。行政权、司法权与人事权本是皇权至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却为鳌拜逐次侵占或部分侵占。

鳌拜的骄横在清代权臣中也是罕见的，或许只有雍正初期的年羹尧勉强可以比拟。在朝贺新年时，鳌拜竟身着黄袍（黄色是帝王之色，着

黄袍是相当跋扈的僭越之举)，仅帽结与康熙不同。不仅如此，他甚至可能暗藏谋杀康熙、发动政变的祸心。昭槁《嘯亭杂录》记，有次鳌拜称病在家，康熙去宅中探望。鳌拜卧于床上，席下悄置利刃一柄。康熙侍卫搜检出凶器，场面颇为紧张，康熙却于不动声色间消弭危机，他笑着说：刀不离身是满洲故俗，你们不必大惊小怪。

任何一个稍有抱负的帝王，都不可能容忍鳌拜这种权臣。康熙开始谋划铲除鳌拜。康熙八年（1669年），康熙与近臣索额图密谋，支开京城中鳌拜的亲信（主要是军队将领与警备骨干），

随后又安排自己的亲信掌握了京师卫戍部队的指挥权。在鳌拜入朝时，康熙密令庭前布库少年们（布库是满族的一种摔跤游戏）将之生擒下狱，并宣布鳌拜三十条罪状，本应处革职、斩立决，但康熙帝念其往日功勋，将其免死禁锢。

据法国传教士白晋记载，鳌拜被擒后，请求觐见康熙，露出其为救皇太极（康熙的祖父）而留下的累累伤疤，唤起康熙的怜悯之情，终于得保性命。不久，鳌拜在禁所死去，死因至今未有定论。

值得注意的是，鳌拜的覆灭，不是他一个人的覆灭。绝大多数权臣的周围，都会形成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利益集团。鳌拜的利益集团，势力盘根错节，深入政体骨髓，从军队到皇家侍卫，从中枢三院六部到地方督抚大员，均为其渗透乃至控制，所谓“文武各官，均出其门下”。

鳌拜被擒后，其党羽也或死或革。不过，鳌拜集团的覆灭，并没经过军事流血，也未引发社会重大骚动，故有人评论康熙处置鳌拜案说：“声色不动而除巨恶，信难能也。”

康熙固然是一代政治强人，但灭鳌拜集团而不

引发政体或社会巨变，也并非全因他的英明神武、雄才大略。当知，在皇权时代，不论某人如何位极人臣，他的权势都必须依靠皇权的庇护才能存在。权臣的合法权力来源，只能是经由皇权授予、确立和保障，即使权臣可以偶尔超出皇权的管辖和约束范围，但他终究还是不可能另立门户、改变江山的颜色。

如此看来，权臣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只是上层政治人物的角力游戏，它关涉到高层权力的再分配，是有中国特色的内阁重组，顺便也对民众进行公关教育，但对整个国家的走向、政体的变革、民众的福祉，并无太大影响。

那些被诛灭的权臣，本人既是皇权的支持者、既得利益者，又是皇权的偷窥者、僭越者，最终还成了皇权的专政对象。以此观之，当权臣在权力最炽热之时，其人生已带有某种不值得同情的悲剧意味。

帝王术最高境界“阳斥阴纳”

帝王权谋是中国古代谋略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家知道，在《贞观政要》中记载了中国古代杰出的帝王唐太宗李世民开明的治国谋略，陈述了李世民与他的谋士、武将的是如何商议治理国家的策略的，表现了太宗与他的大臣、武将们沟通无间、坦诚相待的亲密协和关系，他的“智囊团”对他几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君臣关系中是少有的。与唐太宗李世民相比，清代的著名皇帝雍正，却是完全不同的，他对于他的谋士、智囊保持着很深的城府，对臣下的策略、计谋，从不轻易表露出赞许，更不会表示

接受，反而经常训斥、敲打他们，既表示高高在上的帝王对他的“奴才”们的严厉要求，也表现自己的明智和贤良，可是，暗地里他又经常采纳他们的策略和建议。如果说，在奸诈的帝王面前，权臣们经常是阳奉阴违，那么，在臣下面前，雍正帝却是典型的“阳斥阴纳”。

早在他还是当皇子的时候，胤禛就比别的皇子有城府，在诸皇子中，可能只有皇八子胤禩的智谋能与他相比，胤禛的内心里特别想当皇位继承人，但在公开的场合却处处表现出不在乎的样子，似乎并不想继位。他的巧妙的伪装让很多的王公大臣对他的印象很好，也让其他皇

子对他缺少提防，而他却有计划有目的地筹划和行动着，盯紧了皇帝的宝座。

他的这一套高深的城府到当帝王时，依然没有改变，反而更老到。在雍正身边，也有一帮智囊，经常为他出谋划策，而面对着谋士们的筹划和建议，他常常是底气十足、义正辞严地板起脸孔大讲堂堂正正的话，在臣下面前时时刻刻保持着仁义圣人样子，他俨然成了圣贤的化身。这在清王朝讲究以孔孟之道治国的那档口，是很管用的，政出仁义，治之有道。但是，这当然是一种仁义妆扮起来的假象。在王权统治的古代权谋社会中，这装假很管用，有时能

欺世盗名，获得众多的支持。胤禛正是巧妙地假借儒家的王道名义，获得朝廷内外更多的支持者。

当时，在雍正的“智囊团”中有一个虽不是很出名，但却颇有谋略的人，他叫戴铎，早在雍正还是皇子的时候就跟随着他，这位谋士为主子接二连三地提出对策，上了“十启”，也就是献上了十条建议，为他夺取皇位出谋划策。对于戴铎的建议和对策，胤禛经常表现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义正词严地加以训斥，似乎对这位奴才的“歪点子”十分反感，但在背后却对其计策认真琢磨，悄悄地采纳。

比如，在康熙五十二年，当时正是各皇子争夺皇位继承权的关键时期，戴铎为胤禛献上了“第一启”，这位聪明的奴才当然不会忘记先向他的主子来些奉承拍马、大表忠心的话，然后把话转上了正题，他提出了四点重要的建议：一是劝胤禛要更亲近他父皇，要与其他皇子搞好关系，说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这样方能使父子、兄弟之间，相安相得，创造和谐气氛。二是劝胤禛要和臣僚、下属搞好关系，积累人脉资源，逐步扩展自己的势力。三是劝胤禛不要掺和是非，不要计较小利，要大处着眼，别纠缠于小

事。四是劝胤禛要多奖励有才干的人，收拢优秀人才，为自己的未来培养嫡系团队。

对于内心很想当皇帝的胤禛来说，这几条忠悬建议可谓是正中下怀，按理他该是喜出望外的，但胤禛听了却不露声色，表现出一副很淡漠的样子。他若无其事地作了批覆：你的这些建议听起来像是金石之言，可是对于我来说毫无用处，我若有继位之心，定不会按你说的这样去行事的，何况，当皇上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事，我避之惟恐不及，怎会去刻意追求呢？至于君臣利害、兄弟亲和、终身荣辱的紧要之处，根本就不在当不当皇上。我仅想无祸便是

福，始终尽责做事即是，别无它求，请你放心好了，像你这样的言语，有叵测之嫌，往后不可再有，请你往后务必谨慎！

胤禛的这一批复，表现出很高明的策略，首先，他以平淡的语言把自己紧盯皇位的野心很巧妙地掩盖起来，同时又以亲切而严正的话来教训了下属，显示其贤良正派，执意在下属面前竖起更高的威信；其次，君臣的这一对话，如果传到外面，还可让朝中大臣们看到他胤禛无意于皇位，是淡泊功利的仁义君子，甚至还可让他在他父皇面前，有好的印象，并还能让其他的皇子对他丧失警惕，这可谓有多利而无一

害。

再如，在康熙五十六年，戴铎上了“第七启”，这一“启”颇有朱升为明太祖建议“广积粮，高筑墙，缓称霸”的意味，戴铎认为，主子想成就大业，必需有屯粮之所，也许有练兵之地，臣愿去台湾，“替主子屯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

对于这个建议，胤禛心里窃喜，但表面上却大义凛然，对戴铎训斥一通，雍正说：“我以亲近的仕宦待你，你却比谩骂我更甚，你若存此心，若非灾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自为之，

多行正道，别惹麻烦。”看来，胤禛对戴铎这个折子颇不以为然，但在实际上，他难道不想给自己筹划未来吗？其实，胤禛早就在西北边陲安插了自己的亲信，他的第一心腹大将年羹尧，早就在那里实施为他掌兵了，你戴铎筹划的是对的，但已经用不着了。既然用不着，胤禛不如乘机一骂，既教训这奴才，又给自己的贤良形象进一步添光彩，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又如，康熙五十七年，这一年，胤禛的老爹康熙皇帝刚把宠臣李光地从福建召回，据传闻是为了商议立太子之事，忠诚的戴铎怕其他皇子

被确立为太子，仗着与李光地有一面之交，私下向李光地询问，并斗胆建言，夸自己的主子“聪明天纵，才德兼全，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并很气派地对李光地承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

事后，自鸣得意，胸有成竹的戴铎立马上奏雍正，上陈事由经过，有请功领赏之意，并借机分析了几个王爷之优劣好恶，推测他主子当皇帝的巨大可能性，他以奴才的尽忠，预祝主子早登大位，似乎对主子君临天下已是十拿九稳。可是，胤禛对此如何反应呢？

戴铎接到胤禔的批示是：“我在京时，此等言语，我何曾向你提过一句，你却在外大放阙词，居然敢如此大胆，你之死生，轻若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作为你之主子，想必有前世的冤孽。”

这一批示，依然是正气凛然，冠冕堂皇，仁至义尽，谁知道了，对雍王爷必是无不敬服的，可是，明眼人都知道，胤禔完全是装模作样的。他对戴铎的训斥，对戴铎的谩骂，看似正义凛然，胸怀坦荡，背地里确实居心叵测、深谋远虑。这时，胤禔对皇位已是势在必得，他能不喜欢戴铎对李光地的建议吗？聪明的胤禔不

会不知道，当时的李光地可是康熙帝的亲密重臣，李光地可以在不通报的情况下直入康熙书房，与康熙探讨儒家学说，胤禛对戴铎的“训斥”只不过是让自己的兄弟们、让那些窥视皇位的皇子们更加的放松警惕，同时也让他自己装扮得更像是康熙、李光地所喜欢的儒者形象，俨然是传统圣贤的那种仁义至上，不争名利的贤者，显然，其训斥何等微妙。实际上，胤禛，包括后来的雍正，很多方面是采纳着他的谋士戴铎的建议，“阳斥阴纳”！

雍正继位后，他特意让人把戴铎的“十启”连同他的批示成册示人，不难看出，雍正帝是想

告诉后人，有戴铎这样谋士的超常建议，他胤禛却屡屡对之训斥，显然我胤禛本来就不想继承皇位，我对自己的亲信骂得还不够吗？

雍正帝玩弄的权术何止这些，他有很多的“创造”：比如，杀戮不惧多的他，在康熙的晚年，为夺得皇位，居然很“虔诚”地“信奉”佛教，把自己弄得“神神道道”，俨然是佛祖在上，诚以感天动地。其实，这是一种巧妙的掩饰，迷惑众皇子，似乎他无意逐鹿皇位，这是在麻痹对手，大放烟幕弹，这是在欺骗他父皇，似乎他胤禛是天下最虔诚的人，惟佛是敬，菩萨心情。在他继位后，更是不仅拜了喇嘛高僧为

师，还自己选刊佛学书籍，一副始终虔诚的模样，但是，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他苛刻严酷，杀人不眨眼，连自己的创业亲信，如年羹尧等，也毫不留情。再如，他“始创”了清王朝最可怕的特务制度，把自己的亲信秘密派到权臣、武将的身边，秘密潜伏，定期通报信息，秘密监控文臣武将的动向，在雍正朝，大有武则天时期的恐怖气氛。又如，雍正朝大兴“文字狱”，镇压文化人士，其严酷与毒辣，远胜于他的老爹康熙。

如今看来，非常明显，不管是作皇子的胤禛，还是登上皇位的雍正，训斥是假，采纳是真，

贤良是假，狡诈是真；信佛是掩饰，残忍是真；慈悲是虚，杀戮是他作为帝王常干的事。不管是对谋士的“训斥”还是对佛学的“虔诚”，都是胤禛、雍正的一道假面具，是他炉火纯青的骗术。

当然，客观地说，雍正有他勤勉尽责的一面，有他励精图治的优点，但他的虚伪欺骗，假戏真做，“阳斥阴纳”，是阴谋而非阳谋，是必须谴责的！在他之后，乾隆朝“成就”了和珅那样“阳奉阴违”的大奸臣，不能不说与雍正帝的不良传统有关，毕竟，欺瞒是会有报应的，人在做，天在看，对于两面派，人们终究是会

看破的，虚伪的表演，没有好的未来。雍正及后来的和珅，后世被谴责批判，这一事实其实在告诉后来的政治家，玩阴谋代价太大，弄不好会“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帝王心术俎上冻鱼

雍正二年四月七日の上谕可以说是雍正正式向“八爷党”首领允禩“开刀”的一篇“檄文”。

在这篇上谕中雍正厉数允禩自康熙四十七年允禩被废以来结党乱政，希图夺嫡种种不法行为，有些是上不得“台面”的，现在说出来，真可谓言辞俱厉。在这篇上谕的后半部分，雍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尔诸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这句话表面上来看是句赌气话，就情理而言，这句话应该是在一时发雷霆之怒，口

不择言时说出来才合理。现在却出现在了明发全国的上谕中，就很不寻常，细细品来这句话当真深不可测。

首先，“尔诸大臣内”而不是“尔诸王公大臣内”，康熙末年所谓“九王夺嫡”，而今要么被圈禁，要么“本分”，要么年纪尚幼，其他王公估计站中间，也有被处理的，雍正元年三月十三日，以吴尔占、色尔图等“无知妄乱，不安本分”，遣往盛京居住，夺其属下佐领，谕称：“从前伊父获罪于皇考，贬其亲王之爵，伊等怨望，肆行诽谤。”“伊等希图王爵，互相倾害，陷伊宗嗣于死地。”（吴尔占，故安

亲王岳乐之子，色尔图，岳乐之孙），本年十二月，撤安亲王爵；“八爷党”允禩被发往西宁，允禩我在张家口，十四爷在景陵，此时有能力左右朝局的“王公”们都不在，“八爷党”大臣们群龙无首，允禩孤掌难鸣，雍正有恃无恐。这句话第一个意思，王公们没人能给允禩撑腰，也不会给你们这些“诸大臣”撑腰，你们好自为之。

“诸大臣内”分为三派，支持雍正的不论，中间派墙头草也不论，余下支持八爷十四爷的举几例，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将苏努之子勒什亨革职，发往西宁，跟随胤禩效力；其弟乌尔

陈因同情其兄，一并发往； 雍正元年四月初二日，命皇十四弟、贝子胤禵留遵化守陵，又命胤禵家人雅图、护卫孙泰、苏伯、常明等永远枷示，伊等之子年十六以上者皆枷；在四月七日这篇上谕发出之前，雍正已经处理了几个为首的八爷十四爷的亲信。这句“尔诸大臣内”的第二个意思，是雍正向这些八爷党“摊牌”，“领头”的都“处理”了，“剩下的”你们也请好自为之。

接着，“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这句话看似明确，因为只有这两种奏报方式，但实则模棱两可，含糊其词。密奏不用说，当然是不让

人知道，那就是说你奏的不论是什么，都“可以”不让人知道，方法很简单“留中”或者干脆烧了，反正是密奏，让不让人知道是皇帝说了算。至于明奏，康熙废太子后也曾说“一唯公议是从”还不是照样反悔，更何况此时明奏无异于强出头自找倒霉，想要大家一起“出头”想要众口一词，那就是“朋党”真正的犯了圣忌，恐怕当时就会使出雷霆手段，把允禩杀了以绝后患。因此不论是明奏，密奏，一人奏，百人奏，只要奏了就绝没有好果子吃。

在接下来，“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这篇上谕从头开始连篇累

榑“允禩素行阴狡，皇考所深知，降旨不可悉数。自朕即位，优封亲王，任以总理事务。乃不能输其诚悃以辅朕躬，怀挟私心，至今未已。凡事欲激朕怒以治其罪，加朕以不令之名。允禩在诸弟中颇有治事材，朕甚爱惜之，非允禔、允礽 我等可比，是以屡加教诲，令其改过，不但成朕友于之谊，亦全前三复教诲之理？朕一身上关宗庙社稷，不得不为？皇考慈爱之衷。朕果欲治其罪，岂有于防范。允禩在皇考时，恣意妄行，匪伊朝夕，朕可不念祖宗肇造鸿图，以永贻子孙之安乎？”说的就是着几句：“朕躬贤于允禩，允禩为人不足重，无益于社稷国家。”此时说来当然是反话。

最后，“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天子重器岂是说让就让的。这时情势不同于“禅让”，又不是“兄终弟及”，没有先例，也不可能有先例，即便是雍正“让了”，想想“烛影斧声”，他也不可能这么做。为什么雍正说了这么句不可能兑现的话，有三层意思。第一，朕与允禩势不两立，要么朕让位，要么朕杀了允禩，我们当中只有一个能当皇帝。第二，朕让以此“位”，不一定让以此“权”，毕竟此时掌握军权，治权的大部分人忠于雍正。让以此位，允禩敢接受那么他希图大位，意图谋反就证据确凿，我现在杀他名正

言顺。第三，这句话不会说第二遍，更不可能说第二遍，就是说你们表态的机会只此一次，下次再有人翻出这句话那就是让朕“不少迟疑”的砍你的脑袋。

这篇上谕说到这，雍正就完完全全的掌握了他对八爷党斗争的主动权，因为所有的道理都在他的手上，允禩完完全全的成了“俎上冻鱼”，因为不会有任何大臣王公再继续在道理上支持他了。资料上没写有没有人当真这么奏报没有，可以肯定没有人敢这么做。

雍正完全达到了他这篇上谕的目的，没有人敢

说，那么允禩就是奸诈之徒，雍正怎么处置都行。随后的两年里雍正斥责允禩越发严厉，手段越发的残酷，直到允禩“病死”于禁所。可以想见雍正在发出这篇上谕时，不会是完全的赌气无奈，更多的是成竹在胸，步步为营，真是可怕的帝王心术。

帝王术路上只有利益无亲情

雍正帝是在亲如兄弟的各皇子的猜忌中登上皇位的。由于康熙帝两次废立皇太子胤礽，原是四皇子的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与康熙的感情并不十分深厚，因此，雍正帝的继位最引人注目，引发出种种猜忌和不满。因此，胤禛登上皇位之后就大刀阔斧对康熙末年存在的一些弊端进行改革，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也就对亲兄弟进行残酷的迫害，对那些政敌也给予了严厉的打击。

首先，雍正在警惕朋党的同时，将矛头指向了诸位兄弟，势力庞大的八阿哥允祺集团首当其冲。雍正对付允祺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法。他先是任命允祺为总理事务四大臣之首，并将他封为廉亲王，隐住允祺，接着便进行指责和打击。雍正帝在谕旨中揭露八阿哥允祺、九阿哥允禔结党营私的往事，指使大臣发动了强大的舆论攻势。接着，雍正帝下令夺去允祺的黄带子，除去宗籍，逐出宗室。允祺的亲信大臣也都各自遭到了流放或是杀头的处罚。同年二月，雍正帝下令将允祺从亲王降为民王，交给他所在旗稽查。随后又将其囚禁在宗人府，不久便圈禁在高墙，只留两名太监随侍在身边。

三月，在雍正帝的授意下，允祺请求改名为“阿其那”，最终在幽禁中被害死了。

对于一直站在允祺身边的九阿哥允禔，雍正帝也没有放过。雍正帝下令将允禔发配西宁，并命令年羹尧监视，不准回京。雍正四年二月，雍正帝下令夺去允禔的黄带子。四月，雍正帝命人将允禔从青海押解至京城，罗列了他的二十八条罪状，并令其改名为“塞思黑”。六月，允禔被押往直隶监禁。夏季十分酷热，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允禔无法适应这种生活，很快疾病缠身，最终不省人事，病死在监禁中。

雍正帝的同母胞弟十四阿哥允禔也是雍正帝的劲敌，也是康熙最疼爱的皇子之一，允禔年幼时就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在平定西部葛尔丹作乱中立过赫赫战功。康熙帝死后，允禔奔丧回京，发现雍正即位，因与八阿哥感情甚好，内心感到不平，由此而受到雍正帝的迫害。雍正帝以他“狂妄无知，心高气傲”这样莫须有的罪名，除去他的爵位，同时将其派往遵化，为康熙帝守灵，变相地将其软禁。

至于其他阿哥，雍正帝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处罚：二阿哥允禔因事被革爵位；三阿哥允祉被革去爵位软禁起来。目睹了这些兄弟的下场七

阿哥允佑被吓得胆颤心惊，只求活命。十七阿哥允礼则依附雍正帝，被封为果亲王。

所谓兄弟本该亲如一家人，曹植在诗歌中这样写着：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真的伤害自己的亲兄弟，造成骨肉相残，是很残酷的。那么，雍正帝为何一登上皇位就大刀阔斧地残害自己的亲兄弟呢？究其根源，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继位不得人心，众兄弟和臣子都心怀猜忌，心存不满。这问题与我上文所写的雍正帝用了权谋登上皇位有关。

事实上，自从康熙帝两次对皇太子胤初进行废立之后，诸位皇子就为皇位之争进行骨肉相残，十分残酷。而原是四皇子胤禛的雍正帝为人很有心机，狡猾且奸诈，是个善于使用权谋的伪君子。

每个人都渴求权力和财富，胤禛也不例外，对于太子之位，他也窥视良久，志在必得。只是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不像其他皇子那样表现得过于明显，而是摆出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蒙骗了康熙帝。

当康熙宣布废立皇太子胤初，并将其遣送回

京，由胤禛负责看管。在众位皇子纷纷指责胤初时，胤禛却站出来为他说话，让康熙帝看到了他的兄弟“真情”，使得康熙帝对胤禛的好感又增加了一份，直夸他的深明大义，重视手足之情。后来康熙帝因为立皇太子的事身患重病，忧戚之情溢于言表，这些行为都让康熙帝感到很欣慰。对于康熙帝吩咐他做的事情，如处理敲诈官员的太监，查勘京通各仓放米弊端，胤禛都处理得十分得当，显示出卓越的政治才能，给康熙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只是，因为康熙帝对胤禛的感情不及胤初，关系也不是很亲厚。所以，对于一个心机高深莫

测的四皇子，随时随地都会运用权谋夺取皇位，因此，有人认为，在那样激烈的皇位争夺中，谁权谋高，谁能逢场作戏，谁会博取上下各种地位人物的好感，谁当皇帝就在情理之中。确实如此，四皇子夺取皇位的权谋如同《红楼梦》中的王熙凤般，手段毒辣且高明。

有人认为胤禛的皇位是通过偷改遗诏的方法得来的，也就是康熙帝本想把皇位传给十四皇子，胤禛在隆科多的帮助下，改动了遗诏，把“十”字改为“于”字，于是遗诏就变成“皇位传于四子”。这说法不科学，也只是猜测而已，因为大清的诏书多使用满文，况且在遗诏

上会写下皇子的名字，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

只是，雍正帝在诸多皇帝众兄弟的猜忌中登上皇位，在登基后曾亲自撰写上谕驳斥，不但收效甚微，反而给人以欲盖弥彰的感觉，导致众兄弟猜忌更重。确实如此，或许康熙帝根本来不及写下传位的遗诏，因为在康熙帝病重时，也就只有隆科多一人负责保卫安全，而隆科多与四皇子胤禛的关系非同一般，利用权谋夺位是大有可为的。

也只因为原是四皇子胤禛的雍正帝登上皇位引发诸多猜忌，众皇子也就是胤禛的亲兄弟心

中十分不满，雍正帝亲身经历了康熙年间皇子们为了太子之位明争暗斗，深知其害。也知道众兄弟对自己的继位心怀猜测，自己利用权谋登上皇位心中有鬼，因此，雍正帝一登上皇位之后就大刀阔斧地对所有亲兄弟进行残酷的迫害。确实是为了巩固他自己的统治地位，毫不顾及兄弟亲情，真的是一个善于运用权谋善于使用铁腕手段的残酷的大清皇帝！

结语：

学成帝王术，卖身帝王家

春秋战国是我国最灿烂的时代，那个时代人才
辈出，文学灿若星河，照亮了以后中国的道路，
那是一个另人无限遐想的时代。

千百年来，另人神往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四零三年）
蛭核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通鉴从这一年写起,在太史公眼里,一切的重大变故从这年开始,开始的标志是就是三家分智,晋分三卿,曾享受春秋五霸的晋重耳的那个辉煌的国家,被三分了,于是天下大乱.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

智果是个明白人,一眼看出继承人的重大具备

条件,当时对于敌我情况不明,用智去,能比别人高多少,贤,又贤于玩物,如来有条件去和别人斗.

其实智果要说的就是你根本的实力都不具备,最终只能失败.不光是你,是我,还有很多人,盲目的前进,自己拿什么和别人拼都不知道就光个脑袋上去拼,第一个挂的就是你,斗智要斗天道之谋,斗勇要斗地裂之狠.